

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

一九九三年三月王首道题



朱开铨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写在前面的话

把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的人和事如实地写出来，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是我多年的夙愿。

我出生于江西瑞金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只读过两年私塾。父亲的早逝，迫使我十六岁就挑起扶养家庭的重担，我那时经常为商人挑脚到福建和广东。受那里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一九二六年，我在瑞金参加了农民协会。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时，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没饭吃，没衣穿”，我立即接着说：“恨天下不公，在这个社会里，像我这样的穷人到处都受欺压。”我就是带着这种思想参加革命的。

我的家乡瑞金是中央苏区的首都，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都在这里，而且都在我担任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云集区。按当时的规定，中央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驻地党委领导，因此，我就有条件接触中央的领导同志，更能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云集区成功地进行了“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在毛主席的关心和培养下，我由一个党的基层干部，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我的许多职务都是毛主席亲自委派的。如长胜县、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陕甘省委常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省政府党团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省委常委，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省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等职。后来，由于毛主席与江青结合，我把江青与贺子珍同志比较后就更看不惯她，所以我到毛主席那里的次数就逐渐少了。尽管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几乎丧命，但是，我对毛主席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因为，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

他的过失。

在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的经历中，有六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的“左”倾肃反扩大化。第二次是长征过草地时，我的脚负伤感染化脓，硬是坚持走过来了。第三次是长征途中，因为一个瑞金人带枪逃跑，我受到株连，保卫局长邓发找我“谈话”。当时的情况是进了保卫局的人十有八九要枪毙，红军内部也经常有人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你去谈话”。逼得我没办法，只好提出毛主席可以证明我的历史，这才幸免一死。以后的三次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六次生命危险中，竟有五次是革命队伍内部造成的。现在想起那些在中央苏区、陕甘苏区被错杀的同志，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就令我心痛。党内“左”和右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给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六十多年来，我做到了忠诚党的事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兢兢业业工作。可以自慰的是：面对无数革命先烈，我心中无愧。

一 瑞金政权的初创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我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合龙乡松山村的一户贫农家庭。我的父亲叫朱广昭，母亲叫刘发娣。我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父亲以种田为业。母亲是童养媳，并且是小脚，只能在家操持家务，并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

松山村地处瑞金县城的东北部，距瑞金第二大城镇壬田镇只有十里路，合龙河从村子的西南面注入绵江后汇进赣江。我小时候，经常有从赣州来的船停泊在合龙河的小码头上，将赣州和外埠的商品运来，又将当地的粮食和土特产运走。松山村及周围一带属于丘陵地形，除了农田、道路、河塘，便是不太高的山冈，山冈上到处都是合抱粗的大松树、杉树和樟树，算得上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据说我的祖先原籍在安徽凤阳，明朝末年避战乱才迁到瑞金的。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公堂里听大人们议事，有人提出要回安徽认祖，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他们认为朱姓现在的生活非常平稳，回安徽认祖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件事就这样被否决了。

我家没有田地，当时耕种的二十五亩左右的田，都是从地主和公堂里租来的，每年仅租谷一项，便需缴纳三十多担，除此之外，每年还要交欠债利息二十多元，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由于劳累过度，又无钱医治，一九三〇年就亡故了。

我九岁以前在家帮助父母打柴、割猪草、捡粪。九岁时在我家附近的田心私塾读书一年，学费由母亲做手工活赚钱来交。十岁那年由于老师家里闹纠纷，老师没有来，我便休学一年，在家帮父亲种田，十一岁时又继续读书一年。这样，前后我共读过两年书，学的都是《三字经》《增广贤文》《说文解字》一类的古书。我现在仍记得那个老师的名字叫毛立森。

十二岁至十四岁这三年，迫于家中生活困难，我被送到合龙镇上一家地主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这家小店不是靠做生意赚钱的，主要是为老板从乡下来的时候提供吃住方便。这个老板实际上是一户地主，在乡下还有很多田，每逢当圩赶集，他都带上家里人来这里住一两天。我当学徒的主要事情是挑水、扫地、打扫店堂的卫生和做饭，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而上柜台卖货这样的事，是轮不到我做的。

十五岁时，我可以下田干活了，便回家乡种田。由于当时身体不好，父亲让我田里的事少做一点，主要管好家。母亲也向我交代，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以后，没有人来家里讨债，这个家就算我管好了。

当时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很严重，一般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种粮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布匹、煤油、食盐等生活用品，只能靠做点家庭手工，或养些猪和鸡之类的东西来换，一旦家中有人生病或是婚丧大事，就只能借债。迫于生计，每年十一月以后的农闲日子，我就从家里挑上一担米，到福建的长汀去卖，然后再从那里买几篓盐，挑到宁都、于都等地去卖，再从那里带几匹布到瑞金或者石城去卖。这样几个来回，比单纯卖一担米要多好几倍的收入，但人非常辛苦。就这样过了几年，我不仅还清了以前的欠债，还给家里人买了衣服，生活也明显比以前好了一些。

当时的瑞金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闭塞落后，所以封建色彩非常浓厚。境内祠堂、公堂林立，民风强悍好战，宗族之间的械斗不断，村界和房址的划分、斗争比较厉害，就连百姓的居住，也大多数是以姓氏为居住单位，一个村落就是一姓人，并以其房头的好坏（也就是人的数量）和经济势力来决定势力范围。如县城周围和合龙的杨姓、壬田的钟姓、云集的谢姓等等，但是无论势力多大，也只能在三十华里内有影响。这些村落中，每姓每房的负责人都由本姓本房推选，

一般都推选有一定文化、能写会讲之人，并按其年龄称之为老爷、相公。革命前的清朝统治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县以下的区、乡都不派人来管理，各地区实际上都处在封建割据的状态，一般是由当地一大姓中的劣绅出钱到县里捐个官，然后组织起民团，自任团总。各地区掌管大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团总，而那些有钱人则大多数都做他们的后台，并用钱买通民团为自己做事。

瑞金在革命以前农村中的很多事，实际上是由某姓、某房说话算数，那些人少势单的小姓，则只有通过与大姓结亲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因此在瑞金有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被宗族的剥削、压迫、欺凌所掩盖。

瑞金在成立党组织以前，就有不少社团在活动。这些社团有由富人们组成的，也有穷人自己的组织。比如在县城有“同善社”，其成员多半是当地有钱有势或有文化的人。“同善社”在县城有一所很大的房子，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招待从农村来的成员吃住。“同善社”主要是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维护反动统治。县城里还有一个叫“文会”的组织，其成员都是文秀才以上的有“功名”的名人绅士。瑞金县城并不大，但钟、刘、杨等几大姓基本上把县城分片瓜分了，外姓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这几大姓有钱有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盖祠堂、公堂和公馆。公馆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公堂则面向同姓同房的人。公堂还广置田产，属本姓本房公共所有，租给别人耕种，其租谷多半用于公益事业，比如对本姓中的读书人，按小学、中学、大学区别供给钱粮，当时称之为“学租”。但公堂中的收入也有一部分则给豪绅地主侵吞了。

在农村中，大多数村庄都有农民自己的组织，但名称不一样。比如我的家乡松山村的农民组织叫“田村会”，其他还有什么“鸭婆会”，等等。这些农民组织的主要作用，最早是协调农村中的用水问

题，也就是到了农田灌溉季节，哪些村先灌，哪些田先灌，要由他们决定。后来，这些农民组织都逐渐演变成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维护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

根据惯例，农民从地主和公堂租来田后，一般都是按每亩两担谷的地租交给地主和公堂。所以，每年交租的时候，这些组织便买上一些酒、米粉，杀上一头猪，然后议事，商量当年交几成租的事。一般都是交个七、八成，多则交九成，如果地主将田收回，但又不降租的话，除了原来租种这些田的人，别人谁都不能种，也没人敢再去种，因为“田村会”等组织会出面干涉，或者采用破坏的办法，使任何人都种不成。比如叶坪乡，有一年他们“议事”，决定只交五成租。地主来收租时，看见他们只交五成，就问：“为什么交五成？”回答：“天旱。”地主说：“四周都下雨，唯独旱叶坪，交租交五成。”农民们说：“租你要就挑去，不要我们就留下自己吃。”地主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挑去了五成租谷了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瑞金发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动员他们革命才会比较顺利。

瑞金县城共有两所中学，一所叫“象湖中学”，援用瑞金旧时名“象湖镇”。象湖中学的校长叫钟镇波，原名钟腾，壬田人，思想很反动，一九三一年左右被镇压了。副校长叫杨宪友。这两个人都是麻子，同学们以此常开他们的玩笑。另一所中学叫“绵江中学”，以流经瑞金县城的绵江为名，校长叫钟慰心。此人是无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同情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绵江中学在群众中影响较好，比较开通、进步、民主。这两所中学的办学资金，都是从瑞金的几所大公堂和“文会”集资来的。

早在一九二四年，瑞金就有党组织在活动，党员也有几十人；到了一九二五年，瑞金的党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赣南特委看到条件已基本成熟，就准备召开瑞金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建立瑞金县委。

赣南特委还派陈奇涵同志去瑞金指导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党代会原定代表二十人，在象湖中学召开大会，后因校方不同意，只好将会址改在绵江中学召开。开会的那天，校长钟慰心借故回家离开了学校。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阴历），瑞金县第一次党代会在绵江中学召开，原定代表二十名，结果只到了九名。陈奇涵同志说，原来决定瑞金县委是七名委员，选掉两名就不好了，现决定你们九人都是委员，从中选一名书记就行了。大家都一致推荐杨荣才同志为书记。这九名委员是：杨荣才、邓家宝、杨斗文、杨金山、杨寿宝、钟腾贤、朱玉山、杨泰帮、廖斌。

杨荣才是瑞金县城人，出身于中等资本家，家中在县城开有一间杂货店，本人是绵江中学的体育教员。邓家宝是瑞金安治人，家中小有钱财，本人在县城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杨斗文是瑞金高堂杨屋前人，本人是培英小学教员。杨金山是瑞金圳头人。杨寿宝是瑞金均田村人。钟腾贤是瑞金松山下人。朱玉山是瑞金壬田墟人。杨泰帮是瑞金墩心脑人。廖斌是瑞金大柏地墟人。

据我所知，瑞金党组织的建立，是与广东的革命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国民党三大以后，国共合作，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党组织发展比较快。陈奇涵同志就是一九二四年在广州黄埔军校加入党组织的，介绍人是陈赓同志。

瑞金县委建立以后，瑞金的革命形势很好。县委把发展农民运动当成大事来抓，农民协会纷纷成立，特别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受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瑞金县的各个隘基本上都建立了农民协会（隘是一种以地理形势所划分的区域，多半都在山区，地形比较险要，地主老财都不去）。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唤起农民阶级觉悟、领导农民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际，北伐军开进了瑞金，并经壬田向宁都方向前进。经过瑞金的这支队伍，领导人是许崇智。北伐军不拉夫，不抓丁，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结合北伐军的到来，瑞金党组织更积极地在群众中做工作，宣传北伐军进军是打倒军阀、驱逐列强，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北伐军到瑞金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协会的发展，农协活动由半秘密转为公开。

当时农协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这对我们这些恨天下不公的农民来说，是很欢迎的。那时经常有人来农村宣传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加入农会，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还讲授其他许多革命道理，如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等等。我们接受了这些宣传，不少人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大约在一九二六秋天，我由杨华昌介绍（杨华昌，中共党员，车断隘农协主席，是党组织派来搞农民运动的），在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任农协宣传委员。和我一起加入农民协会的骨干人员我记得有温时汉（红军五军团某连长，一九三三年攻打宜黄时牺牲）、谢桂柱（红军五军团某指导员，一九三三年攻打黎川时牺牲）、钟慰来（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后被敌人杀害）。

加入农会后不久，我又由杨华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我前后加入党组织的有温时汉、谢桂柱、钟慰来、刘殿英、杨荣志、李春芳、江春辉等十人，我们这些人编成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杨华昌。在我的记忆中，杨金山经常到我们支部来指导工作。当时我们的活动很多，最主要的是召开各种类型的集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集会通常都有几百人参加，大家在一起喊口号，几里路外都能听见。对那些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则抓来公审，然后推去杀掉。这样一来，不少豪绅地主都逃往赣州、南昌、广东。几千年受苦受难的农民，第一次

这样扬眉吐气。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叛变革命，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实行大屠杀。当地的反动地主和土豪劣绅也组织起反动武装靖卫团，对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农协主席杨华昌被靖卫团抓去，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农协因无人领导而停止了公开活动。由于我是农协宣传委员，也属于靖卫团逮捕的对象，所以暂时转移到山区去了。其他党员和农协骨干也都分别找偏远地带的亲戚朋友家住下，彼此间沟通联络非常少。因为靖卫团的团丁多半是本地的流氓地痞，和我们原来就认识，一旦隐蔽的地方暴露了，不仅自己有生命危险，还会给隐藏我们的群众带来危害。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人杨华昌被逮捕了，我们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再加上我们又缺少斗争经验和经费，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们的活动仅限于秘密串联，过一段时间大家互相碰碰头，彼此交流一下打听来的关于外面形势发展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暴动震动了全国。毛主席率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一九二八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瑞金也受到了影响。此时合龙乡党组织负责人是杨寿宝同志。他秘密地将我们从各地召回，向我们传达了革命形势及下一步的斗争任务，并重新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由于原党支部负责人杨华昌仍被敌人关押着，和我同一支部的其他党员到外地隐蔽还没有回来，而那时党员的身份又是秘密的，我在一九二六年入党的事一时无人能证明。出于斗争的需要，杨寿宝同志找我谈话，说：“目前的形势开始转变，党组织的活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你原来是这一带的骨干，但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事一时又查不清，我看你还是重新履行一次手续，加入到党组织中来，这样便于工作。”于是一九二八年的四五月份，我又由

杨寿宝、朱甫挺介绍重新入党，候补期三个月。

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深入群众，继续传播革命道理和宣传当时的斗争形势，并秘密地发展党组织和农协的力量。当时敌人的势力还很大，所以我们的活动还不敢公开，只能秘密串联，一个或几个党员分管一片，积蓄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

一九二九年春天，从福建过来的国民党金唤鼎部的七十一团、七十二团闹摩擦，双方在瑞金打了起来，死伤不少人，并丢弃了一些武器。我们乘机捡到了一部分，又从老百姓手中买了一些（枪七十元一条，子弹一元十粒）。由于手中有了武器，加上经过将近一年的宣传鼓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开始高涨。县委及时作出了创立红色暴动队的决定。我所在的暴动队是瑞金县第八大队，我任八大队五中队的中队长。我们中队只有两条枪，其余的都是鸟枪、梭镖、土炮。在我们瑞金，要组织起队伍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中等以上的村庄都有土炮，很多人家有鸟枪，家家都有梭镖。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与反动武装靖卫团相比，力量还是很弱的，仅合龙的靖卫团就有四十多条枪。所以，我们多在山区活动，同时对那些单独出来的靖卫团丁进行袭击，还经常下山去惩治土豪劣绅。由于我们频繁出击，就使得靖卫团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一部分土豪劣绅又纷纷逃往赣州、南昌、广东等地。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乡里就听说毛委员领着工农红军，从井冈山到我们赣南来了。这对我们家乡的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红军开辟赣南根据地时，蒋介石派了许多兵马尾随紧跟，妄图消灭红军。跟到瑞金县城附近，已经是一九二九年的春节了。年三十，在县城附近打了一仗。红军向黄柏方向前进，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红军到了大柏地的麻子沟，围住了敌军刘士毅的独立旅，消灭了其中的一个团，吓得刘士毅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往瑞金县城逃跑了。红军在大

柏地与当地群众一起过了一个胜利年。

大柏地战斗后不久，国民党派李文彬带一个团来瑞金清除共产党。那时我们都很麻痹，因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形势一直都比较好的，看不到危险，所以对李文彬带部队进瑞金没有什么防备，总认为他们住两天就会走，县委书记杨荣才同志仍留在县城，结果被李文彬抓去杀害了。这时，我们才看到形势严峻，于是都转移到离县城较远的山区去活动。杨荣才牺牲后，县委书记的职务由邓家宝代理。

红军在大柏地战斗后又攻下了宁都县城，然后部队回到瑞金的壬田住了几天，再东进长汀，去开辟闽西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军在长汀附近的马兰岭，消灭了汀州八县的土皇帝郭凤鸣独立旅的近四千人，并打死了郭凤鸣。红军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瑞金各地的暴动队和赤卫军的力量日益扩大，反动势力基本上都龟缩在县城和几个大的圩镇，而广大的农村则基本上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一九二九年冬天，赣南特委派蓝夏桥、杨子江来瑞金创建革命武装，在原来暴动队和赤卫军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红军第二十四纵队。蓝夏桥、杨子江是纵队负责人，杨衍波任秘书长（杨衍波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九三〇年肃反时被错杀），杨斗文任参谋长。红军第二十四纵队成立的时候，参加的人很多，在很短时期内就发展到两千多人。二十四纵队的发展壮大，带动了瑞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县委看到举行全县暴动，进而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将全县的赤卫军和暴动队都组织起来，于一九三〇年春天发动总暴动，一举攻占了瑞金县城。

从那时起，瑞金千百年来第一次真正得到了解放。过去，每逢过年，穷人就是过关。不少穷人由于借了债，年三十晚上也不敢在家里住，而是往山上和没人的地方跑，东躲西藏，一直到过了半夜十二点钟以后，逼债的人都走了，才敢回家。从那以后可就不同了，穷人们

高兴地唱着自己编的山歌：

一九二九年，毛委员来我县。
地主叫皇天，穷人出头天。
往年过年，
地主真香甜，穷人苦连天。
今年过年，
地主叫可怜，穷人笑连连。

在当时还流传一首歌，叫《东方红》，歌词是这样的：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后来我们唱的时候，觉得谋生存这样的要求太低了，就改成了谋幸福。这首歌和现在的《东方红》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第二段，并且是用我们当地的调子唱的，和现在的调子也不一样。那时我也经常唱这首歌，所以记得很清楚。

我们占领瑞金县城之后，就建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邓家宝。有了革命政权，我们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就开始把地主的田分给百姓。这次分田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的，每人一份，就连地主都分到了一份，让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田一分完就开始割禾了，老百姓第一次分得了胜利果实，都非常高兴，更加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一九三〇年夏天，瑞金县革命委员会改名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邓家宝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闽西特委派来的李柏任县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当时在中央苏区正开展清除“AB团”的肃反运动。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李柏思想“左”倾，非常不民主，

在“AB团”的问题上大搞扩大化，实行肉刑拷打。有一次，争论一个土地政策问题，因为说不服本地干部，他就以“AB团”为借口，迫害对方。那年十月，在县城一天就杀了二十八个人。这些人都是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部队营级干部，并且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纵队已改编为红军的一个师，杨斗文任师长，部队接到命令开出了瑞金。当时由于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反动势力便利用这一点来分化革命队伍，在苏维埃内部也发生了叛乱，瑞金九堡的豪绅地主勾结赣州的反动派，利用姓界的宗族观念分化革命队伍，他们用重金购置步枪、轻机枪等武器，组成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反水，重新插上青天白日旗，旋即又占领了瑞金县城。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响应，重新组织反动民团，向红色政权疯狂反扑。李柏在这种形势下吓得撒手不管，跑回了福建。整个瑞金县境内，除了安治、桃珠两个边远山区的乡和下州坝乡还是苏维埃政权外，其余全被敌人占领了。县委委员杨寿宝、钟腾贤被敌人抓住，钟腾贤的头被割下来示众，杨寿宝的心都被这些惨无人道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吃掉了。瑞金的革命又一次跌入了低潮。

那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毛主席带领红军正在宁都的黄陂、小布、龙冈等处与敌张辉瓒作战。我们看形势在瑞金待不下去了，大家一起到小布参加红军去。这样，一下子瑞金就跑出来了几百人，我与温时汗、谢桂柱、朱鸿（红一军团某部营长，一九三四年十月黄陂小布战斗中牺牲）等同志也结伴离开了瑞金，到宁都的黄陂、小布去找红军。当我们赶到那里之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已全歼了张辉瓒部，还活捉了张辉瓒，缴获各种枪支九千多条。

一天，我们正在宁都的连陂桥饭店吃饭，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快来看啊，红军来了！”我赶紧放下碗筷，跑出店外，挤进路旁的

人群。

红军由北向南，往宁都方向走去，战士们刚打过胜仗，每个人脸上都露着笑容，步伐也是雄赳赳的，我们真有说不出的羡慕。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地前进着，远远地夹在队伍中间有一匹白马，上面坐着个红军干部。顿时周围响起了一片声音：“那不是毛委员吗？”“毛委员来了！”只见毛委员穿一套灰色的红军制服，头上戴着中间有颗红星的五角帽，端庄地坐在马背上，手里拉着缰绳，并不时微笑着向两旁的群众打招呼。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打完张辉瓒后，毛主席看到瑞金跑出来三四百人，也知道了瑞金的情况，指示我们瑞金各乡来的同志要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回瑞金去，重新恢复政权。并在我们中间挑了一百多个打枪准头好的人，组成一支队伍，从缴获的枪支里批了一百支给我们（管枪的同志只给了九十多支），其他的同志则留在黄陂参加了红军。

我们拿着毛主席给的九十多条枪，可高兴了，由杨金山同志带队回到瑞金，第一仗就把大川的国民党民团部消灭掉了。接下来就计划打壬田。壬田是瑞金除县城外最大的集镇，有钱人比较多，这里的民团有一百多支枪，离我们占领的大川只有三十里路。攻打下壬田，就可以杀一杀敌人的威风，鼓舞我们的士气，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悄悄地运动到壬田镇的时候，敌人还不知道。远看我们这支队伍，一人一支枪。敌人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我们来得这样快，所以就打起了青天白日旗，还放起了鞭炮。待我们走近了，他们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一下子人都跑得无影无踪，有的连忙藏起来，有的跳墙跑了，搞得敌人鸡飞狗跳，青天白日旗丢在地上，鞭炮还在响。我们赶快冲进区民团部，团丁们都已经从后院跳墙跑光了，把团总钟腾伟丢下不管了。钟腾伟因为太胖跳不过墙，被我们抓

住了，捆他都要花力气，这家伙有二百多斤。当时瑞金县委已转移到安治乡去了，于是我们就把钟腾伟押送到安治乡去。半路上又抓住了一对收租回来的地主父子，地主叫杨家全，就把他们也一块带上，并通知他的家属拿钱来赎。这时年关又到了。抓住了钟腾伟，消灭了壬田的民团，瑞金的东面都解放了，我们就在安治乡的县委所在地过了年。

县里的敌人闻讯我们消灭了壬田的民团，抓住了钟腾伟，就派警卫队长钟文彰带了一百多条枪的队伍，下来清剿报复，并计划将接祖排等九个自然村烧掉。我们闻讯以后，便在半路上埋伏起来，准备打个伏击战。钟文彰带着队伍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指挥员杨金山一声令“打！”大家便一齐开火，当场打死近百人，逃跑的又在河里淹死了几十个，钟文彰也被打死了，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通过这一仗，我们又多了一百多条枪，力量更强大了，瑞金半个县很快就又回到了我们手中。以后，我们边打边建设红色政权，扩大革命势力。

瑞金第二次解放了，全县人民都欢天喜地，可是，杨斗文同志带领由二十四纵队改编的一个师，在攻打赣州未果之后，却被以肃“AB团”为名给杀了。消息传来，我很难过。杨斗文早年参加革命，是瑞金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胆识，机智过人，在瑞金的影响和号召力都很大。可是，他却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此外，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杨泰帮带领游击队在长汀附近打游击时被敌人俘虏了。瑞金的豪绅地主知道后，便联名向长汀告状，说他是土匪头子，这样，杨泰帮也被敌人杀害了，还把人头挂在罗汉岭的马路边示众。

说到瑞金解放，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我便会想起在瑞金合龙消灭国民党地方军赖世琮的那一仗。那一仗，打出了我们赤卫军的威风，

鼓舞了广大群众，对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合龙，地处瑞金县城东三十华里，四周环山，为石城县通往瑞金城必经之路。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夜，我率领壬田区合龙乡赤卫大队第三中队，按照县委指示，在预定时间赶到了伏击点老墟上，准备堵截从石城窜犯瑞金的赖世琮匪徒。

赖世琮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军在朱军长和毛委员的指挥下攻克宁都城，就曾将他俘虏。只由于他的胞兄赖世璜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的军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被熊式辉所杀，那时还算是革命的），所以为了争取赖世琮，红军教育了他一番，随即将他释放了。但他本性不改，继续站在与红军、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上，逃到了石城，网罗了一帮恶霸、地痞、流氓、赌棍组成靖卫团，自封为团长，在县城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这次被瑞金革命风暴吓得逃命石城的瑞金县的土豪劣绅不惜血本，筹措了五千光洋，妄图乘我主力红军进入闽西之际，请赖世琮率匪徒攻打瑞金城，并许诺打下县城后公推赖世琮当县长，他们共同做着一场反攻倒算、卷土重来的迷梦。瑞金县委根据敌情，立即召开了各区赤卫队长联席会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决定选择合龙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形，集中二十四纵队、壬田区游击队及壬田、合龙、沿岗、云集四个乡的赤卫队共计三千五百多人，由杨斗文同志担任总指挥，布置下一个口袋阵，诱敌深入，然后锁闭袋口，以优势兵力将敌人包围，打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七月十六日下午，赖世琮匪徒一行一千多人正耀武扬威、气势汹汹地朝瑞金城开来时，在沿岗突然遭到我游击队的袭击。匪兵们一下就溃散了，躲在路边的田埂、石头后面，顾头不顾屁股地朝天乱放枪。我沿岗游击队员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毫不畏惧，有计划、有步骤

地边打边退，诱敌深入。敌人打了一阵，弄清是小股游击武装，于是赖匪壮起胆子下令追击。从沿岗追到七星庙，又到兰莞、乌石水，待敌人被我游击队员引诱至合龙时，天已经黑了。

敌人开始钻入我们张开的口袋。赖匪小心翼翼地进驻脚陂、枫树下两村。他们把团部安在枫树下东南村沿的大院内，预备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向瑞金城发动攻击。这伙匪徒在村庄里看鸡就抓，见猪就宰，翻箱倒柜，摔盆砸碗，搞得两个村落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在杨斗文同志的指挥下，我二十四纵队及各县赤卫队分东、南、西、北四路于午夜准时在松山脑、均田村、岗内村一带集结完毕，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天快亮的时候，我各路部队悄悄运动，向脚陂、枫树下两村进逼。几位游击队员机智地摸掉了敌人的哨兵，解除了敌人的警戒。我南路部队顺利隐蔽行进到敌团部门前，在一块比人还高的芋苗地里架起四门土炮，摆开了阵势。与此同时，我东路部队在合龙沟沿岸一线展开队伍，切断敌人的退路；西路部队在枫树下西山、吴坊岗一带埋伏，堵住敌人进犯瑞金县城的通道；北路部队在岗内村东山、南山设下伏击圈。按原定战斗方案，我东、南、西三路部队向敌人发动攻击，将敌人赶到岗内村，在这里最后消灭敌人。

天蒙蒙亮，敌团部门前的小坪上，一片乱哄哄的叫嚷声。匪徒们正杀鸡做饭，准备酒足饭饱后攻打瑞金。

看见敌人将我群众的衣物财产、房屋家禽践踏得乱七八糟的情景，我游击队员强按住胸中的怒火。待敌人集中在小坪上抢鸡抢饭吃的时候，只听指挥员一声令：“打！”我们的土炮和枪弹便向匪徒们猛烈射去。众匪徒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打倒一大片。我东路部队听到南路部队打响后，也迅速冲过合龙河，朝村内猛扑过去。

敌人受到我东南两路部队的突然打击，被搅得，晕头转向，死伤

两百多人。这群乌合之众散掉了骨架，慌不择路地各自逃命，分别窜向西、西南方向。

赖世琮骑着大白马，带领两三百匪徒向西突围，妄图夺取进城要路吴坊岗，再而进犯瑞金。但没等爬上山冈，早就埋伏在岗地的我部队给了敌人一顿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匪徒鬼哭狼嚎，仓惶溃退，死伤近百人。在我勇敢的游击战士面前，赖匪只得放弃夺取吴坊岗的打算。

一部分向西南方向逃窜的匪徒，在西山遇到我伏击部队的沉重打击，余下的五十多名匪徒赶紧退回去与赖匪汇合。

我东南西三个方面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追击，敌人已毫无招架之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赖世琮见东南西三个方面难以突破，慌忙收拾残部，向北逃窜。

至此，匪徒们只剩下两三百人。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乖乖钻进了岗内村山坳仅一里多的杉背村。这时，正面有等待敌人多时的我北路队伍；两侧为我东西两路队伍牢牢控制；来路已被我紧紧追击的南路队伍切断，敌人已陷入我游击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四面包围之中。

全部、干净、彻底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总指挥杨斗文同志一声令下，我游击战士及群众立即向敌人冲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部分企图负隅顽抗的匪徒一踏进稻田就拔脚不起(当时稻田里灌满了水，群众收获一季稻后便利用稻田养鱼)，只有举手投降，匪徒赖世琮在战斗中被我游击队员击毙，得到他应有的下场。剩下的三十余名逃兵跑到桃子窝也被全部消灭了。

这场漂亮的歼灭战，全歼匪徒一千余人，缴获枪支四百多支，为保卫瑞金、发展苏区，巩固苏区的大好形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在红色故都的日日夜夜

一九三一年三月，瑞金重新恢复红色政权后，我在合龙乡政府任财经委员，主要分管经济和财政工作。当时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温时汗。那时瑞金县共分九个行政区：壬田、云集、武阳、九堡、渡头、瑞林、沿岗、黄柏、城关，全县共有人口三十三万多人。

这一年的三、四月份，闽西特委又派了个叫李添富的人来瑞金任县委书记。此人比前任书记李柏更“左”，杀人更多，肃反更扩大化。当时肃反的名称很多，我们瑞金叫肃社会民主党。那年的肃反，把杨金山同志（红军团长）、邓家宝同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斌、朱玉山同志（均为县委委员）都错杀了。

当时，李添富以开会为名，指挥红三十五军留下的一个连，抓了不少人。从三月到九月，全县被杀的没有一千，也有八九百。要不是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来制止，瑞金真不知还要乱杀多少人。

我记得邓小平同志来的时候，正是农历八月十五。

邓小平同志一到瑞金就定了措施，发布了命令：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的一律不抓（因为这些名字都是用刑讯逼供得来的，结果是越逼越多，越抓越多，抓都来不及）；第三，已在押的，凡是贫农、中农成分的一律先放掉；地主、富农能罚钱的，就罚一些钱，罚不到钱的，最后也都取保放掉。当时全县抓了很多人，在我们壬田区政府就关押了百把人，还杀掉了百把人。被杀的人，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有十几岁的青年人。

“杀人风”刹住了，全县人民都很高兴，都万分感谢邓小平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

邓小平同志还派了工作团，深入到各区帮助工作，他自己也亲自下来，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到过我们壬田区，并组织过我区的积

极分子会。我记得他到壬田来主要是解决把壬田划分为两个区，一个仍叫壬田区，一个叫云集区。那次开会的地方是在壬田的三石陂，我因有事去得较晚，走进会场后一看都坐满了，只有邓小平同志的身边还有空位子，我就走过去坐下。邓小平同志问我：“你是哪个乡来的？”我回答说：“合龙。”他说：“那你们以后归云集区管。”我说：“我不清楚这件事。”他说：“今天晚上就要宣布这个决定。”接着他又问我：“你是什么成分？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如实回答了他的提问。小平同志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我说：“我对这个社会制度不满。”小平同志说：“你这个同志很实在，思想也很进步嘛。”后来小平同志在瑞金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我也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一九三一年十月，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出席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李添富在瑞金搞错误肃反，瑞金人民对他不满，都说他是反革命，非杀不可。参加大会的代表一致说，不杀李添富不选代表。结果，在那次大会期间就杀了李添富。他的打手、壬田区委书记兰光照，还有钟家魁等人都逃跑了。

后来我才知道，发现肃反中的问题的是毛主席。那时，毛主席正在宁都、于都等地调查，那里也执行了立三路线，也错杀了不少同志，其中的大部分是早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同志，同时还发现在红军中也有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方法上，则存在大搞逼供讯。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肃反中的错误，在他们的努力下，肃反扩大化得到了纠正，但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了。

在此之前，我们在县城召开了一次三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会。大会结束后，上级来人传达中央指

示精神，决定在叶坪乡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指示叶坪乡和周围的几个乡在县委的指导下，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大会的召开。大会的筹备人员和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保证代表们吃好，还在我们乡订购了会议需要的各种食品。过了几天，上级又来人传达中央的决定，确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在叶坪召开，并规定大会的头三天为群众的祝贺日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非常高兴。瑞金在一九三〇年就已经建立了县政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取得了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之后，把赣南和闽西之间的白色据点完全消灭了，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粉碎敌人的围攻之后，也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还有十多万赤卫军，革命形势很好。随着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组织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当时我们都在议论：国民党有党和军队，我们也有党和军队；但国民党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则没有。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组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叫我们怎么能不兴奋呢？

为了表达我们对大会召开的喜悦心情，乡政府决定用最隆重的方式来祝贺，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祝贺行动。一方面，我抓紧落实大会筹备处在我乡订购的各类食品；另一方面，加紧组织祝贺队，采买各种器材。在乡政府研究怎样才能把这次祝贺行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大会增添光彩时，大家一致认为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次祝贺行动搞好，多花一点钱没关系。因为代表大会是晚上开会，白天讨论，所以群众到大会去祝贺都定在晚上。针对这

一情况，我特意去县城买来了很多铁丝，请了有名的扎花灯师傅到乡里来扎花灯和标语牌。此外，还从各家调了一百五十多盏马灯。为了使祝贺队伍整齐干净，还请了十多名裁缝师傅，为每个参加祝贺的人赶制了一套灰衣服，乡政府和保卫队的人都配了红五星和红领章。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铜鼓铜号队和唢呐队，并预习了几遍，直到祝贺队伍能做到整齐划一。

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乡的一幢大祠堂里开幕了。周围几个乡都派了祝贺队伍前去祝贺，我也带了四百人的祝贺队伍去祝贺大会。祝贺的队伍一进入会场会议就暂停一下，代表们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天晚上我又带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前去祝贺。到了第三天，也就是群众祝贺大会的最后一天，我准备把这天晚上的祝贺搞得更隆重些。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正和乡政府的人在筹划这次行动，妇女会的十几名女同志冲了进来，质问我们为什么前两次祝贺都没有妇女去，是不是轻视妇女。我连忙解释不是轻视你们，而是妇女代表会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就赶快去做准备，今天晚上去，但是小脚的妇女就不要去了。她们一听都非常高兴，马上回去准备，每人做了一套灰衣服和一个扇子灯，还赶排了几支歌。

天刚黑，我带着队伍出发了。十三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在会场外把队伍整顿了一下，就进了会场。我和警卫队的六十名队员走在最前面，队员们每人都背着枪，举着一块四尺多长三尺来宽的标语牌。这种标语牌是用铁丝扎成的，里面点上两盏灯，外面用彩色纸写上标语，既醒目又好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考虑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而瑞金话又不好懂，怕呼口号他们听不明白，所以才扎制了里面点灯的标语牌。走在最前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合龙乡政府庆祝大队”，后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庆祝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工农兵代表

大会开幕”“祝贺参加大会的代表身体健康”“预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等等。警卫队后面是少先队，他们在铜鼓铜号的伴奏下，也是每人手举一块写有标语的小灯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少先队后面是群众的锣鼓队，他们敲打着喜庆的曲子，提着一百五十多盏马灯进入会场，八支唢呐同时吹出欢快的乐曲，会场内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达到高潮。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名艺人，可以用鼻子吹唢呐，一口气能吹上好几分钟，让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最后面是妇女同志，和以前那种狂欢的节奏不同，她们每人手拿一个扇子灯，一边慢慢地走着舞步，一边唱着祝贺歌和歌唱男女平等的歌。歌是用山歌谱的曲，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表扬我们乡的祝贺队伍搞得好，既整齐又丰富多彩，说我们乡是富乡。

我之所以要把祝贺队伍搞得好，并连续三天都带人去祝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表达我们翻身的喜悦，二是想去多看一下瑞金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三是表达我们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临时中央政府的衷心祝贺。瑞金县的党组织建立较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县委。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受挫，但很快又有恢复和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领导全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夺取了政权。再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经过四年多的奋斗，无论是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都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当时作了比较，我们和国民党比，少的就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现在这个政权建立了，老百姓普遍感到与国民党斗争更加有力量了，对群众的革命信心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会期间，代表们晚上开会，白天则分散到周围的村庄进行讨论。讨论会一般都是围在晒谷场上进行的，我们乡政府还成立了服务小组，为代表送茶水和做一些其他的服务性工作。当时的大会非常民主，也不避开群众，大会秘书处还每天出一期简报。参加大会的代表大约有

六百多人，上级给我们乡也分配了一名代表名额，当时选举代表的时候我的票数最多。把名单报上去后，上级指示要选成分最过硬的，由于我是贫农，结果补选了一名雇农出身的同志为代表，大会结束时他还带回来一顶大会发的纪念品黑呢帽。

当时乡政府的职能和现在差不多，但还要兼管地方武装赤卫队。由于我们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同志，文化水平又不高，对一些政策的界限不是很清楚，有时处理问题就显得过于简单。

有一天，我上街去买办公用品，村民抓到一个偷青菜的，问温时汗主席如何处理，温时汗说：“杀掉。”结果就把那个人杀掉了。我回来后见杀了人，就问温时汗是哪个批准杀人的？温时汗说：“我。”我问：“为什么杀人？”他说：“他偷人家的青菜。”我说：“偷青菜就该杀吗？”温时汗说：“这样的人杀一个少一个。”我问：“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人吗？”“不知道。”“连名字都不知道就乱杀人，这样不对。再说杀人是件大事，要开个支委会，让大家研究一下。”温时汗说：“几个支委都不在，我去问哪个？人都捆来了我总要处理嘛。”话虽是这样说，但以后随意杀人的事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久，我们又抓到一个地主的狗腿子，这个人平时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大家都非常恨他。我们支委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他时，大部分人主张杀掉，我不同意。我认为杀人要有政策性，罪大恶极的才能杀，狗腿子是地主雇来的，应和地主有所区别。因为产生分歧，只好表决。表决时我是少数，结果还是杀掉了。但不管怎样，此事毕竟还是通过了组织研究作的决定，比以前那样随随便便杀人，还是有进步的。

其实，温时汗同志在对敌斗争方面是非常勇敢和坚定的，每次出现敌情时，总是扛着红旗走在最前面，说：“跟我来！”只是处理事情比较简单。

有一次，我们没收了地主的一批粮食，温时汗主张分给老百姓，我不同意，因为我们乡政权有给红军筹措给养的任务，我们还要留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如果红军路过此地，需要补充给养怎么办？”经过研究，后来还是按我的意见办。从当时的情况看，老百姓生活也非常困难，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分给农民，这样做本身没有错误。但我们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没有红军，就没有老百姓翻身的日子，而我们又怎么可以让红军饿着肚子去和白匪打仗呢？这个道理一讲，大家就都明白了。

不久，红军三十五军派了王保民、曾继珍同志来到我乡，要求拨给一千元钱作军需用。当时是温时汗同志接待他们，温时汗就说：

“现在哪里有钱啊？地主跑都跑掉了，土豪家连家都抄了，到哪里搞钱啊？”我翻了一下账册，的确没有这么多的钱，但是红军更困难，我们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我出了个主意，在每户富农处征三十元钱。因为当时富农不属打击对象，他们家的财产一般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通过这样派款，我们很快便征了一千多元，顺利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被选为新成立的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中央和全国苏维埃的各部门都陆续迁来瑞金，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设在我们云集区管辖的叶坪乡。那时瑞金县委书记是胡荣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崇奎。

到云集区任职后，摆在眼前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组织。当时党组织内部不纯洁，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随着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加入到党组织中的人的成分开始复杂起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的侵蚀也很严重。我们苏区各级政权，支援前线的各种勤务以及扩充红军的动员征兵工作都非常重，还要抓粮食生产，以保证红军和各级政权的给养。我所在的云集区又要比本县其他八个区的勤务和

动员工作要重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就驻在我们区，离我们区政府只有三里路，两万多人的粮食等给养全靠我们输送，当时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全靠肩挑背扛。这许许多多的事务性工作使得区里的领导都非常忙，忽视了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党团员的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红五月扩大红军时，全区扩大红军共下达三十名的指标都没有完成，只完成了九名。

由于支前的勤务工作和动员工作的局面非常被动，我很着急，整天都在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好。我想，工作被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不够；二是工作的分工计划性搞得不好，特别是在勤务工作上，经常是上面来了任务临时再派下去，带有很大的强迫性。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的心里就开始盘算了。

正好，过了几天，县政府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布置勤务工作。我在中央来的领导同志讲过之后，便站起来提了几条建议：一、三天后动身的勤务由县政府承担，三天内动身的勤务由各区轮流承担；二、一百人以上的勤务由县政府承担，一百人以内的勤务由各区轮流承担。我提这样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各级政权都要挑担子，并将职责分清，改变以前的忙乱现象。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刘开同志支持我的意见，县政府也采纳了我的提议。

回来后，我立即召开区干部会，传达县政府会议精神，针对本区的实际情况，为了使人人都明确职责，我提议：1. 地主富农不担任勤务。一来是我们对他们不放心，二来只让他们在家乡担负烈军属的勤务工作。2. 普通赤卫军只担负勤务，不担负当红军的任务。3. 赤卫军模范和少先队模范不担任勤务，但要担负当红军的义务（注：赤卫军是二十五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少先队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模范是指思想政治上进步的人）。4. 将普通赤卫军按乡、村编成连、排、班，轮流执行勤务。这样，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来了勤务临时指派，

但往往人数又不够，时间又超过的现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我的意见。

我把区政府的决定报区委研究，区委当时不同意，说上面并没有这样的决定，我说：“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红五月扩大红军，三十名指标只完成了九名，不解决问题如何向党交账啊！”后来，我的意见在区委获得了支持。从这以后，我们区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以前那种忙乱现象也渐渐地变得有秩序了。

在瑞金县云集区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莫过于为了王观澜和何叔衡同志的事情而进行的斗争。

王观澜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曾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和邓发、萧劲光等同志在闽西特委工作，中央苏区建立后任《红色中华》主编。王观澜同志任职期间，经常深入云集区的各个乡搞调查研究，指导我们的工作，和我区干部群众的关系都很好。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王观澜同志被冠以“托派”而被保卫局押起来了，云集区的党员、干部、群众都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信写报告向中央反映，要求释放王观澜同志。我为此事还亲自找过保卫局长邓发，为王观澜同志辩护。后来王观澜同志被放出来了，但被撤了职。这年的十月底，我们云集区党委收到中央机关总支委的一份报告，说王观澜同志有“托派嫌疑”，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要我们审批。我们都知道这是上海来的那些人蓄意打击的借口，但我们怎么可以充当他们的工具呢？为此事我们区委开过十几次会，都没有通过中央机关总支委的报告。为此，中央机关总支委多次派人下来催办，压我们赶快批下去。也就在要求开除王观澜同志党籍的报告报来不久，中央政府总支委又对何叔衡同志“开刀”了。

何叔衡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中央担任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部长、工农检察部部长。何老是一位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模

范共产党员，所以，王明路线的那些人将何老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迫害打击他。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央政府总支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因中央政府总支委在当时划归云集区委领导，所以总支委开会前通知云集区委派人出席指导。我们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后，区委先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也都知道这次开会是要斗争何老，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所以决定参加会议时表态要慎重，并决定由我去参加会议。

那天，到会的人数有三百人左右，头一个发言的是印刷厂厂长杨其兴。他说何叔衡同志观点右倾，思想顽固，作风官僚，不听群众的意见，并列举了唐仁达、毛庆生、赵宝成等的案子来说明。杨其兴最后说，应把何叔衡同志的最高法庭主席降为副主席，撤销其内务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的职务。第二个发言的是造币厂厂长陈祥生，他的意见和杨其兴基本上一致。随后，又有十多个同志发了言，他们的意见也都和杨其兴差不多。

最后，他们要求云集区委立即表态。我站起来说：“你们对何叔衡同志的批评意见我都听清楚了，我把总支委大会上发言同志的意见带回区委，我们将开会认真研究。”他们对我的讲话不满，非要我当场表态。我很生气，于是说：“党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像这样大的问题我个人不能做结论。”当时搞得非常紧张。后来，由司法部长梁柏台出来讲话，他说：“像这样大的问题区委由一个人做决定是有困难的，大家应该同意他把意见带回到区委会去讨论决定。”这样，才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我回来后，向区委传达了中央政府总支大会的情况，七个委员停了好久无人发言。后来，他们都说我当时没表态是对的，然后大家纷纷讲道：领导中央政府总支委是等于在身上背了千斤石，我们区委的

同志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也很低，怎么能领导中央政府总支委呢？有位同志讲：领导得了也好，领导不了也好，大包袱已经背到身上了，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王观澜和何叔衡同志的问题。有的同志讲，何老是没有大错误的，这是小题大做。有的同志讲，何老是坚持真理的，是实事求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区委对这件事，无论困难有多大都要坚持原则。第一次会议开到半夜后体会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云集区委会第二次讨论，谈到了在总支大会上杨其兴举的三个例子。大家都认为何老对那三个案子的处理是对的，何老不同意对知识分子过分打击。革命依靠工农群众是对的，但也要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三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

唐仁达是知识分子，中农成分，原在中央政府总务厅当保管科长。他工作积极负责，当时有人告发唐仁达浪费了两百多担纸。其实，他是按当时的总务厅长赵宝成批的条子发纸的，即使有浪费现象，也不能算是他的责任。何老兼任工农检察部长，办事应实事求是，公平合理。何老又兼内务部长，对处理政权干部应有明确的干部政策，所以，不逮捕唐仁达是正确的。

赵宝成担任总务厅长，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批领的办公用纸，都是在各部门报来的数字上批字后到保管科领出的，即使有浪费现象，也是对各部门报的数字没有核实，对各部门的用纸情况不了解。像这样的错误，何老不同意逮捕也是对的。

毛庆生是知识分子，普通群众，当初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妨碍了水利建设，但传他到工农检察部去后，他当时就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再阻碍水利建设，这在当时，不逮捕也是可以的。

把这三件事说成何老是官僚主义、“右倾”，要给他如此严重的处理，我们想不通。当时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会开了六个多小时才体会。

十二月九日，我们第三次开会讨论这件事。同志们认为，不管怎

么样，对中央政府总支委的意见总要批，想来想去只好勉强作出这样的批复：

1. 保留最高法庭主席；
2. 免去工农检察部部长；
3. 免去内务部部长。

我们把批复意见告诉了杨其兴、陈祥生、梁柏台、项英（项英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但他们都不满意我们的批复，坚持要将何老降为最高法庭副主席，撤销两个部长的职务。

基于上述原因，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再次开会研究这件事。我们认为：区委的批复意见已经是被迫的，可仍通不过，这不是区委领导总支，而是总支要把云集区委变成打击干部的工具，我们绝不能这样干。为了慎重，于是决定把九个乡的书记、乡苏维埃主席和区委区政府的部长都叫来，开一次区委扩大会，看是否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云集区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大家都同意区委的批复决定。我们当时分析，中央政府总支委开会斗争何老，有很多人是因为害怕不敢讲真心话。其实，问题的根子是何老没有很好地跟上海来的那帮人走而受到打击，这只不过是开场锣鼓而已。从宁都会议的精神看，将来不只是何老一个人的问题，还会有一些人像何老一样受打击的。现在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只不过不敢公开讲而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如处理不慎，也将要受打击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原则。后来，大家还是一致同意按区委的批复意见办。这次会议还再一次研究了王观澜同志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仅以“托派嫌疑”就要开除王观澜同志的党籍，这同样是打击正派干部的借口，区委绝不能妥协，决定对中央政府总支委的决定不予同意，并把处理意见报给瑞金县委。

我们把王观澜和何老的资料送到县委几天后，一天晚上半夜一点

来钟，项英副主席和梁柏台部长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区委把我叫起来，质问我为什么不按总支委的决定把王观澜和何叔衡的问题批下来。我说我们区委开了几次会都通不过，主要是我们水平低，怕处理不好，所以已送瑞金县委处理。他们听后非常生气，将我们每次会议的记录都逐一审查，临走时还用非常粗暴的语言责骂我。

瑞金县委也感到此事棘手，拖了半个多月也受到了批评。后来大约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又将材料报送到苏区中央局。这时中央已作出决定，中央机关党组织不再由地方党委领导。中央局就按照中央政府总支委的要求批准了他们的决定。何老由最高法庭主席降为副主席，主席由董必武同志担任。内务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的职务被撤销，内务部长由梁柏台兼任，工农检察部长由项英兼任。唐仁达被判处死刑，赵宝成同志在审判会上判了三年徒刑，王观澜同志则被开除了党籍。

后来，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同志将何老的处分决定写成通告，准备发往全国，他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请毛主席签发，毛主席当时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理谢秘书长，而是一个人走到屋外去看田里的庄稼。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从苏维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工作，当时正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何老连代表资格都没有。那天他正好碰到我，就买了两串荸荠，叫我一起吃。他对我说：“现在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也不方便到毛主席那里去。”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安慰他说：“何老你不要难过，毛主席还是了解你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我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都配了马和饲养员、公务员，何老却没有配。我去看何老，何老说：“组织上决定留我在根据地打游击，请你转告毛主席，我不怕苦，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到底。”我听了非常感动，含着眼泪向他告别。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才知道何老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已在福

建上杭的水口壮烈牺牲。我们长征时何老已经六十岁了，对江西的情况又不熟，留下来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只要给他一匹马，一个饲养员，他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到陕北，还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这时，我又想起在瑞金中央苏区的一件事。我任云集区苏维埃主席的时候，我们区要镇压一个反革命分子，我带着材料去见当时最高法庭主席何老。我先汇报说：“这个人是个秀才。”何老一听便很生气，他打断我的话，说：“我还是举人呢，你把我杀掉。”我知道自己说错了，于是赶快道歉，说：“我文化低，不会讲话，把次序颠倒了，现在重新汇报。”我将这个反革命的罪行汇报了，再没提他是秀才的事。何老问：“怎么，这个人不是秀才了？”我说：“是，但我不提了。其实在我们瑞金，许多豪绅、地主、恶霸都是秀才出身。”何老教育我说：“秀才并不是犯罪，秀才只是功名，和我们大家一样，关键要看他的表现。”后来，何老派人调查了这件事，并将这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何老的原则性是多么强，这样的好同志牺牲了，我是非常悲痛的。

三 毛主席领导我们开展查田运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上级让我兼任云集区的区委书记。在这之前，仅四月至十月，就换了四个区委书记。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是困难的，形势是复杂的。

为什么云集区的工作推不动呢？我到下面去开会摸情况，可人总是来不齐，就是来了也很少发言。后来，我下乡就不开会了，而是找些成分好、历史清楚、工作又积极的党团员个别谈话，慢慢地大家才把心里话讲给我听。原来大家对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一九三〇年六月那次分田，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到年底政权丧失后，穷人连分到的差田也失掉了。一九三一年三月政权重新恢复后，六月份又进行了一次分田，但群众反映还是和上次一样。我从积极分子那里还了解到，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混进了区、乡的党政组织，掌握了一部分大权。那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还经常写诬告信，对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打击陷害。这些人自己有文化，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写状子，有的人还出钱雇人写，写好状子，他们又利用同族同姓收买拉拢一些人，在状纸上签名盖章。更可恨的是，有些富人还私刻了很多别人的图章，然后盖在状纸上，有很多老表被他们私刻图章盖在状纸上，本人还不知道。当时中央工农检察部有个控告局，局长是陈紫峰，在苏区设了很多控告箱。控告局接到状子，认为这是“民意”，不做调查就乱处理，使一些积极分子受到迫害。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就是因为得罪了地主富农，一个被冤杀了，一个被撤职查办了。当时我还了解到有些地主富农，正在策划写信控告叶坪乡新任乡主席朱先祺。在这种情况下积

极分子和群众不敢讲话，不敢做事，动荡不安。

我感到这些问题很严重，应该立即解决，而自己又无法解决，于是我便到县委去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云集区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又很着急，觉得这样下去不知又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积极分子遭到迫害。怎么办呢？最后，我想到去找毛主席。

那时，毛主席在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后，有一段时间住在长汀。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有个与毛主席住同村的积极分子告诉我，毛主席已从长汀回到了叶坪乡陂坞村。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心想，这回可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可又一想，怎样才能见到毛主席呢？毛主席能够见我一个普通的区干部吗？能够听我讲一个区的情况吗？去找毛主席下边的人会不会把我挡回来？这一连串的问题又产生了。想来想去，感到要解决问题非找毛主席不可。于是决定先写封信试试看。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我到云集区当苏维埃主席已经十个月了，什么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分田不合理，干部队伍不纯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我想向毛主席写个书面报告，但是，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想向您作口头汇报，不知毛主席有没有时间，这样做是否方便，请批示。

此致

敬礼！

信写好后交给通讯员小曾，让他送去。他听说是送给毛主席的，就瞪大眼睛问我：“这样高的领导，我怎么见他呢？”是啊，信怎么送呢？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到中央政府总务厅找袁科长，请他带你去。”

毛主席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区政府只有三里多路，小曾走后没有多久就回来了。我急忙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说：“没有。听袁科长讲，毛主席昨天晚上工作了一夜，正在休息，信由他转交。”会不会有回信呢？什么时间才能回信呢？这些问题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看积极分子送来的材料，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报告。我急忙起身开门，进来一位红军战士，送来了毛主席给我的回信（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红军战士就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我真是喜出望外！毛主席约我第二天下午三点到他办公室去。我真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快就回了信，还要马上听汇报，这下云集区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二月十五日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快步来到陂坞村。毛主席住在一幢村堂里，我走进房间时，主席正埋头看文件。我见他身穿一套灰布干部服，脚穿一双黑布鞋，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一把木制靠背椅和几条长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堆满书籍的书架，几个书箱和两个铁制文件箱。我的脚步声惊动了毛主席，他见我来了，放下文件站起了身。我赶紧站直身体向毛主席敬了个礼，然后跨前两步，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您好！”

毛主席连声答“好，好！”然后让我坐下。

我坐下后，望着毛主席，此时此刻有多少要说的话一下子都卡住了。毛主席看出我有些紧张，便不慌不忙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一边划火柴，一边先开口说：“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吧？”“收到了。”毛主席轻松随便的态度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我说话才渐渐自然了。我接着说：“我文化低，不会写报告，想做口头汇报。”

毛主席说：“可以，可以。”

我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云集区的概况。云集区东西长四十华里，南北宽三十华里，有九个乡，四千一百多户，两万八千多人，其中地

主九十户，富农一百三十户。我还把土地、物产、群众生活情况一一做了汇报。

毛主席问我：“为什么工作开展不起来？”

我说：“群众反映三〇年六月分田不合理，穷人分得少，离村远，大多是三等田；而隐瞒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分得田多，离村近，还是好田。三一年六月第二次分田与三〇年分田一样不合理，群众意见较大，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我还汇报了有些能说会写的地主富农混进党支部、乡政府、贫农团、赤卫军，并且还掌了权，这是群众发动不起来、工作不好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问：“你们云集区的区委书记是谁？”

“从三二年四月以来，云集区共换了五个区委书记。他们是杨衍槐、曾海堂、谢仁良、钟吉林，从三二年十一月起由我兼任区委书记。”

毛主席又问：“云集区九个乡，哪个乡的工作最难开展？”

“叶坪乡最难开展。”我回答说：“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第一任叫刘善隆，被人控告，后来以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第二任乡主席刘某某，也被控告乱打土豪，结果被撤职查办了。第三任乡主席就是现在的朱先祺，是个雇农，人比较好，因为害怕控告不敢大胆工作。”

毛主席问：“控告的都是什么人？都往哪里控告？”

“控告的多是地主、高利贷者的亲友，或者是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公开的地主、富农不出面控告。他们多数都告到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陈紫峰那里。”

毛主席又问：“各乡是否都有积极分子小组？都有多少积极分子？”

“各乡都有积极分子小组。一、二、三乡各有五个积极分子，四、五、六、七、八、九乡各有四个，共有积极分子三十九人。”

毛主席问：“叶坪乡有哪几个积极分子？”

“叶坪乡的积极分子是朱先祺、谢标、朱先和曾守辉四人。”

毛主席还问到云集区有哪些剥削形式、如何划分地主等等。对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火吸烟，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毛主席听完我的汇报后，肯定我的汇报有调查、有分析，也提出了问题。最后，他把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分子隐藏下来，有的还混进了党、政、群众团体中来，混进贫农、中农队伍中来，造成阶级阵线不清，干部队伍不纯。毛主席气愤地说，阶级敌人控告积极分子，就是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毛主席最后表示：这些严重问题必须解决。并要我回去把三十九名积极分子召集起来，第二天下午六点钟他要亲自到我们区政府听他们的汇报。我听了后高兴地说：“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

在回区政府的路上，我感到心胸舒畅多了，三步并做两步走。到区政府后，我连饭都顾不上吃，急忙找了几位可靠的同志，让他们马上到各乡去通知积极分子，第二天到区里来开会。

二月十六日，我们区委区政府研究了如何开好这次积极分子会。为了做好准备工作，我们派了专人整理汇报材料和布置会场，开会的厅堂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被擦拭一新，连主席要经过的街道也扫了一遍。下午五点多钟，各乡的积极分子都已到齐，大家聚集在区政府门口欢迎毛主席。我则准备到陂坞村去接毛主席。刚走出一里路就看见毛主席已经迎面走来了，后面跟着几位战士，还有王观澜同志。待他们走近后，我给毛主席敬了个礼，和王观澜同志握了手。毛主席微笑着问我：“开会的同志都到了吗？”我说：“都到了。”毛主席

说：“好！我们快些走吧。”等在区门口的同志们见主席过来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一边向大家鼓掌招手，一边笑着问同志们好。

汇报会由我主持。我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我们区来检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这时，大家又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对毛主席的欢迎和爱戴。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要大家坐下。

第一乡的谢世煌、朱开机两人先汇报。他们说已查出该乡有三家漏划地主，还有八九家需要进一步调查，他们感到积极分子太少，而有些坏人很猖狂，私刻很多图章，向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诬告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已经查出云集区原区委书记杨衍槐、共产党员杨省三等入就私刻了一百多人的图章。

第二乡的胡会湛汇报已查出有三户是漏划的地主、富农，还有十户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个乡有个叫黄道文的地主分子混入党内，与一乡的杨省三经常在一起干坏事。

第三乡的宋自发、钟文波汇报说，该乡的乡文书谢瑞兰就是个地主，还可能是国民党员，他对我们是个大障碍、大威胁，积极分子队伍难建立，群众工作难开展。

听到这里毛主席插话说：“混进党政机构里的坏人不少，工作开展不起来的障碍就在这里。有些人可以先撤销他们的职务，查清他们做的坏事之后再作处理。诬告积极分子就是反革命破坏活动，该逮捕的逮捕，该法办的法办。”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其他各乡的积极分子发言更积极了。有的揭发了区政府教育部长朱云龙是地主，有的揭发区工农检察部长刘麟三有问题。这些人在下面破坏区委的领导，谩骂积极分子是“流氓小组”，还去找陈紫峰共同打击积极分子。有的还揭发少共区委书记周帮仁也是地主。这些乡也都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

会议从下午六点钟一直开到深夜两点。毛主席认真地听了大家的

汇报，感到满意。毛主席对隐藏在区、乡党政组织中的坏人的调查情况特别重视，对叶坪乡的情况询问得最详细。最后毛主席讲了话，肯定了大家情况了解得很具体，汇报得也很好。他要求我们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要扩大和组织积极分子队伍，每个乡要从现有的四五人扩大到二三十人，这样，就可以带动全乡的群众；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已经查清楚的，要整理好材料，还不太清楚的，要抓紧调查核实；第三，要做好广泛发动群众工作，要让群众自己起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毛主席说，你们先搞十天，过十天我再来听你们的汇报，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出成绩。

会议虽然开得很晚，但到会的同志没有丝毫倦意。当大家起身送毛主席的时候，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可大家还是坚持送出一里多路才止步。我们望着毛主席那高大的身躯在马灯亮光的照耀下远远离去……回来后大家谁也不想睡觉，又不约而同地回到区委，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的三点指示。散会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会后，我们区委派了一些可靠的同志到各乡去帮助工作。各乡的积极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情绪很高，劲头很足，他们说：“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积极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调查分田中存在的合理现象，揭露坏人的罪行。仅四五天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乡积极分子队伍一般都达到十人左右，有些漏划的地主、富农得到了核实，他们的嚣张气焰也有所收敛。有些地主分子害怕了，给积极分子送礼，但都遭到了拒绝。控告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事情少了，形势很好。

在毛主席听取汇报后的第六天，我第二次向他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毛主席听过后高兴地点点头，并让我提醒大家，要警惕阶级敌人

的破坏活动。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大的斗争还在后面。”

二月二十六日傍晚，毛主席在检查完其他区的工作后，第二次来到我们区政府。街道两旁早已聚集了欢迎的群众，有些老年人说：

“这么高级的领导人会来到我们这里，真是想不到啊！”

在会场上，毛主席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摆情况、提问题，到会的积极分子比上次多了五六倍，很是高兴。毛主席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时而插话，时而记录，最后又作了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这次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他解释说：“查田不是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不管这些人是混进乡苏维埃里，还是混进区、县苏维埃里，都要查出来。要搞清楚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他们的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毛主席还说：

“真正打倒封建势力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还要打破房界、姓界，要反对包庇坏人，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只有斗争取得了胜利，才能做到合理分田。”毛主席还指出，要把查田运动、检举运动搞好，就要组织革命力量，要依靠积极分子，要依靠贫农团。现在各乡都有十几、二十来个积极分子，这很好，还要在斗争中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毛主席针对积极分子初步发动起来后出现的某些过激情绪指出，有些人偶然有点剥削，不能算富农。一九三〇年以前连续剥削三年以上者，算剥削者。管祠堂和公堂时间在一年左右的，不算剥削。我们要团结中农，对中小工商业者要注意保护。毛主席还指出，消灭地主，是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剥削，不是消灭人。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地主也要分给田地，让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毛主席肯定我们已经做了的四件事。第一，初步发动了群众；第二，扩大了积极分子队伍；第三，各乡都初步调查清楚了一些漏划的地主、富农，叶坪乡查清十五户，其他各乡也有十来户；第四，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开始压下去了。毛主席赞扬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成绩，并要我们继续努力，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公开地开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斗争，要把封建势力、半封建势力斗倒。毛主席还要求我们在合理分田的基础上把生产搞好，把工作搞好，纯洁党团组织，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要争取把我们各个乡都变成模范乡。

毛主席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力，说得大家眉开眼笑，虽然会开得比上次还晚，却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最后，毛主席宣布自己要亲自在我们云集区叶坪乡搞查田运动试点，并且要组织些力量来帮助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争取三月份搞完，不影响春耕。会场上顿时情绪沸腾，叶坪乡的积极分子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其他乡的积极分子都说：“叶坪乡享福了，毛主席亲自蹲点。”

散会后，积极分子们还有好多话向毛主席倾吐，恋恋不舍。毛主席越走越远，照路的灯火也越来越小。但是，毛主席点燃在人们心中的革命火种，却越烧越旺，越烧越明。

二月二十八日，我到毛主席办公室汇报工作，毛主席告诉我，从三月二日起，派罗境瑞同志带领七十多个人的工作团到云集区一、二乡帮助开展查田运动，他和王观澜同志到第四乡，区委组织力量到第三乡，其他五个乡由我负责先搞，待一、二、三、四乡搞得差不多了，再抽调力量帮助我搞。为了把情况搞确实，把材料搞准确，以便更好地掌握政策，区委决定各乡要成立查田委员会。乡查田委员会可以划定地主、富农的成分，但要报经区委批准后才能公布。逮捕人也要由查田委员会决定，报区委批准后执行。查田委员会由七至十一人组成，

成员在积极分子中选拔。毛主席对我们区委的这些意见表示同意。

三月初，各乡的积极分子把调查核实的漏划地主、富农材料在群众中公布，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斗争。工作团的同志在运动中注意打消红军与白军交错的边缘地带中某些群众存在的顾虑，动员那些借了钱和债的贫苦农民克服房界、姓界的落后意识，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剥削罪行，与他们作斗争。各乡在斗争中逐渐扩大积极分子队伍，逐渐形成以贫农团为骨干的斗争力量，并都相继选举产生了查田委员会。一个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和检举运动，在云集区全面展开了。

毛主席在叶坪乡亲自到陂坞村、庙背村、细山堂等自然村找群众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把各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对一些重要问题随时给予指示，我又及时把这些指示传达贯彻到各乡工作中去。这期间，我几乎两三天都能见到一次毛主席，亲耳聆听他的教导。我时常见到毛主席通宵达旦地工作，直到天明后才稍事休息。他的脸比较清瘦但精神很好。

毛主席要我们及时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的过“左”情绪，要我们注意教育和引导，不要轻视这一倾向。他打个比方说，张三是中农，群众要划他富农。李四的情况和张三一样，划了张三那么李四也就害怕了。毛主席说：“一定要注意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我们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让地主、富农混入贫农团是有害的，把自己人划到敌人方面去同样是有害的。”对于地主兼中小工商业者，毛主席主张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反对把工商业都一概没收的做法。他说，我们当干部的就是要随时了解情况和注意掌握政策。在群众对党的政策有某些不理解的时候，一方面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做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接受并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这样，

查田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毛主席对各乡在查田运动中，对在纯洁组织的基础上发挥贫农团的作用很重视，我们各个乡都很注意把优秀的积极分子安排为贫农团骨干，查封地主的房屋财产要盖贫农团的印，逮捕人也是由贫农团出面执行，到后来，查田委员会的一些工作都逐渐地由贫农团代替了。毛主席肯定这样做很好。他本人在叶坪乡蹲点，就是在查田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把积极分子逐步充实到党、政、赤卫军、少先队组织中去，使贫农团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健全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传达到各乡以后，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叶坪乡只用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全区的运动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顺利完成了。查田运动纯洁了党、政、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敢于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骨干力量，全区的积极分子最后达到三百六十多人。这些积极分子斗争坚决，懂政策，守纪律。他们在查田斗争中不包庇地主富农，旗帜鲜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严格按政策办事，对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浮财不入个人腰包，大公无私，合理分配。他们有革命的觉悟，懂得斗争的艺术，后来很多人被毛主席推荐到苏维埃大学去学习了，更多的人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输送了新生力量。

经过清查，叶坪乡查出了二十八家地主富农，连同原来的四家共三十二家；一乡的积极分子查出原云集区区委书记杨衍槐是地主；二乡查出乡干部黄道文是地主；三乡查出乡文书谢瑞兰是地主，查出区教育部长朱云龙是地主，同时，还查出他们利用职权包庇其他地主的罪行。全区共查出地主九十一家，富农二十三家，没收地主土地二百一十亩，征收富农土地四十多亩，准备分给一九三一年分田分得不合理的贫农。全区共逮捕了六十多人，一乡杀了十八个反动地主分子和赌棍，二乡杀了一个反动地主分子，其他各乡都没有杀人。

当毛主席知道了全区查田运动的这些成果后，非常高兴。他问到：“为什么一乡杀了十八个人？”我说：“一乡的查田运动主要是罗境瑞在那里主持，据说被杀的人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一乡的反动地主分子私刻了一百六十多人的印章，诬告了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是这次查田运动使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救了。”

毛主席又问：“被杀的人经过批准没有？群众反映如何？”

我说：“是经过乡查田委员会报到区委，区委批准后才能捕人，是由贫农团执行的。要杀的人，由区裁判部报县裁判部，再报中央最高法庭批准的，群众都说杀得好。”

毛主席说：“那就好了。”

通过查田运动，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革命的热情大大激发出来了。有这样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四月的一天，毛主席派通讯员（吴吉清同志）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有事商量。我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主席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现在库存的粮食不多，吃不到新粮下来，让我们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云集区两万八千多人，就可以节约八百四十多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我回到区里后马上进行了传达动员。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家家捐献，人人出粮，三天之内共捐出一千多担，超过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县其他八个区，二十八万人民（地主、富农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在其内）在短时间内就捐出九千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三升米运动”。

再一件事，是每年的“红五月”都要扩大红军。在快到五月的时候，毛主席把我找到他那里去（这时主席已搬到沙洲坝去住了），主席问：“去年云集区红五月只扩大了九名红军，今年红五月能扩大多少？”

我们区委已经有个估计，我把动员和估计的情况做了汇报，我说“四百人有把握。”

毛主席说，四百人数字不算小啦，要做好思想工作。他还说，瑞金县要动员两千五百人，县政府负责人说动员不到这么多。

在县政府召开的扩红动员会上，有的区连一百名的扩红指标也不敢承担。毛主席让我讲了云集区动员扩红的情况，然后主席在会上讲了扩大红军对于打败敌人反革命“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他说，瑞金要扩大两千五百名红军，云集区承担了四百名，你们别的区承担二百名行不行？

又过了几天，我把云集区经过动员后可以扩大红军八百名的数字报到县里，县裁判部长说：“不要讲大话。”我说：“你们还不了解查田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结果，云集区实际上共扩大红军一千零二十名。

毛主席亲自对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做了总结，指出这个运动的成绩很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培养了三百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纯洁了党、政、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划清了阶级阵线，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解决了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分田不合理的现象，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毛主席还说，查田运动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扩大了红军。毛主席还对云集区查田运动中的政策、方法、经验做了总结，并称赞云集区成了模范区。

谈到查田运动，我要特别提到王观澜同志。还是我在乡政府担任财政委员的时候，就和王观澜同志认识了。他是一九三一年秋天，我们瑞金和闽西特委脱钩，转归江西省委领导以后，从闽西特委调到中央工作的，任《红色中华》的主编。当时中央政府驻地离我们乡不远，每次区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我都是发言比较多的人，而王观澜同志经

常参加我们的会，对我印象比较深。为此，他经常找我谈话，了解情况，探讨问题，我们很快就很熟悉了。有一段时期也没见到王观澜同志，后来又听说他被保卫局扣押起来了，一打听，是因为有人告他在苏联留学时参加了“托派”。我觉得非常奇怪，很为他抱不平，于是就到中央保卫局去找局长邓发。邓发见我来了，便问：“小鬼，什么事？”

我说：“听说王观澜同志被押起来了？”

“对。”

“为什么？”

“有人控告他是托派。”

我故意问：“什么托派？怎么个托法啊？”

“这件事你不懂，不要管。”

我说：“他是个好同志，有能力，工作又非常好，我知道。”

结果，第二天王观澜同志就放出来了，但被撤销了职务，被安排到中央土地部当秘书，我仍然经常去找他。不久，他又调到中央人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工作。在我当选为区主席后，王观澜同志频繁地来我们区，参加各种会议，并代表中央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当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向主席提到过王观澜同志，并介绍了他对我们区的情况比较熟，同时还把他的现状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后来，毛主席决定在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并让王观澜同志作为他的助手指导我们开展查田运动。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四乡的查田工作时，因为工作忙，所以那里的查田工作，主要是由王观澜同志在负责，主席也经常深入调查和过问这件事。在查田运动的那些日子里，王观澜同志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给我的帮助非常大。

为了把云集区的查田运动经验推向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叶坪乡相继召开两个大会。一个是八县查田运动大

会，一个是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的指导员都是王观澜同志。出席前一个大会的是石城、宁化、长汀、会昌、瑞金、于都、宁都、胜利八个县的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特派员，约四百人；出席后一个会的是八县贫农团骨干近千人。在这两个大会上，毛主席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云集区查田运动的情况、成果和经验，肯定了查田运动的伟大意义，讲清了查田运动的政策、方法，布置了在八县开展查田运动的任务。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查田运动的开展对于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保证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说明我们应走符合我国国情的武装割据道路时，他很风趣地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那套做法给予讽刺，使大家深受教育。这两次会上，毛主席都让我坐在主席台上，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在八县贫农团代表会结束的那天下午，在叶坪召开了有几万群众参加的庆贺云集区查田运动的胜利和在八县开展查田运动的誓师大会。会上，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讲了话。

会后，中央组织了五六百人的工作团，到其他七个县开展查田运动，从云集区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本县其他八个区开展查田运动。一个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高潮迅速在中央苏区形成。

四 毛主席派我去长胜

一九三三年四月，毛主席给我发了委任书，委任我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六月，开完查田运动大会后，毛主席又派我到长胜县去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是个新成立的县，由宁都、瑞金各一部分组成，县政府设在长胜，辖固村、长胜、赖坊、田头、香坊、莫石坎、瑞林、葛廷八个区，人口十一万，面积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石城县这么大。

七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他在沙洲坝的办公室里，给我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我到长胜县之后，抓紧发动群众，抓紧发展生产，要重视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毛主席还要当时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带我去那里，并要他在长胜县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待会议结束后再回去。

到长胜后，我总结了以前工作的几点体会：一是相信群众，要以贫雇农为主体；二是要抓阶级斗争，镇压反革命，巩固和发展工农兵政权；三是要抓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开源节流，整顿财政收入，节约开支；四是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

我从来都没有搞过一个县的工作，心想，毛主席这样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努力把工作搞好。

一个新成立县的工作是比较难开展的，管理的方面大了，机构多了，地方也不熟悉，再加上当时的干部又少，各个方面都很紧张，尤

其是大规模的扩红后，许多组织都不健全了，整顿和建设工作的显得尤为迫切。从哪里下手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应该着重抓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抓整顿各级组织等几项工作。

我在长胜县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先后开了两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一次是长胜县成立时召开的，由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主持。第二次是半年后开的，主要是总结和布置工作。还开了一次文教会，一次经济会，一次土地会。

文教会主要是提倡男女平等，开办列宁小学，动员学龄前儿童上学，发展教育事业。全县虽有几所列宁小学，但在校学生不多，老师也缺乏。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也只得一百多名学生，我去的那段时间还停办了。七月份开的会，要求九月割完禾后开学，扩红走了的老师要尽快补齐。那时苏区课本统一由中央编印，各地不能自己搞。由于教育经费很少，这项工作困难很多，但考虑到培养教育一代新人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县里抓得很紧。老师从当地进步的知识分子里挑选，每年给一定的谷子作为报酬。学生的桌子、凳子都是从家里带来的，政府没花什么钱就办成了这件事。九月各个学校都开始上课了。

经济会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整顿财政收入。当时的税收很轻，杀一头猪收四角钱，杀一头牛收八角钱，买卖小猪和耕牛不收税，粮、豆、油买卖也不收税，烟酒不收税，木材只收卖到赣州方面的税，按木排计，税也不重。在农业方面收累进税，当时不收公粮，按每人的平均口粮计算，八百斤起算收百分之五，但最多也仅收到百分之十，平均口粮不到五百斤不收税，平均口粮五百斤至八百斤的象征性地收一点税。收税的标准是按每户的人口和田亩。田分一、二、三等，一等田的产量按每亩四百斤计算，二等田按三百斤，三等田按二百斤，多收和歉收都按这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本身留的余地就非常大。

其次是抓水利建设。那时苏区的主要任务是防旱，很少要防涝，

因为我们管辖的地区都是河流的上游。我们鼓励筑坝、挖池塘，但这样的事阻力也很大，主要是封建迷信在作怪。比如，水如果从房子后面流过，就说当地有龙，后面是龙头，前面是水口，开了水利就会斩断龙颈，所以就不同意，甚至发生械斗。还是我在瑞金当区政府主席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件事。瑞金的白莲寺有个坡，有条河从那里流过，两边是山，口子蛮好，只要用松树拦个四、五尺高的水坝，就能灌千亩来田。区政府带人在那里筑坝，可是当地却来了一百多人，手里拿着梭镖、土炮，不让筑，还威胁筑坝的群众。见到这种情形，我们只好回来了。回来后，我赶紧到中央工农检察部去找何叔衡同志，向他汇报了这件事。何老带了两个人、两支枪到那里，传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人回检察部，教育了一顿，讲通了，才把他们放掉。这样，才算解决了事情。

经济会还要做的一件事是帮助农民调剂耕牛。那时每头牛要耕三四家的田，牛不是每家都有，所以需要调剂，特别是当养牛户的牛死后，政府还要调剂钱来帮老百姓重新买牛，以防影响农业生产。

土地会议主要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因为以前的基础就比较差，贫农团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群众对土地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意见很大。我原想把云集区的查田运动经验在这里推广，但由于基础差，条件不成熟，所以在我的任期之内，这个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我就离开了长胜县。

那时上面没有给我们拨经费，好在支出少，最大的开支就要算是教育经费了。我们也没有办医院，靠接管跑掉了的反革命分子的药铺，加上合作社的几个中医，就算是成立医院了。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也不发服装，公家只给饭钱。当时我们苏区干部的作风是很好的，不管是中央的、省里的，还是县里的干部到乡里去，都不在群众家吃饭，而是在乡政府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一般有个鸡蛋、豆腐什么的就蛮

好了。

我刚到长胜县的时候，工作的确不好开展。本地的干部能用的我尽量都用了。由于前一个红五月扩大红军，当地的党员和区乡积极分子都参加红军了。上任后我到各乡了解情况，发现有不少地方的工作都基本上瘫痪了。下面的同志反映，积极分子都走了，我们的工作现在开展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提议并由县政府决定，机关干部下到各区去健全各乡的党、政、赤卫军、农会等组织，并把秋收秋种工作搞好。列宁小学要开始上课，要尽量早地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一九三三年八月，长胜县委的同志也都来了，正式成立了中共长胜县委员会。我是县委成员之一，县委书记是洪明贵。洪明贵一到也不先听我介绍情况和汇报工作，下马伊始便开始布置工作，一开口就要扩大红军三千人（当时县户口人数只有十一万）。我当时吓了一跳。根据长胜县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工作秩序，整顿好各级组织，对赤卫军进行训练。长胜县是新成立的，各方面的基础也很薄弱，下达这样大的扩红任务，是没有什么可靠依据的。于是，我表示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

由于出现了分歧，扩红计划在县委会上表决。县委班子里的人除我之外都是洪明贵带来的，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最终以六比一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扩红计划。根据我的估计，不要说扩大红军三千人，就是三百人可能都困难。作为党员，我只好表示服从决议。但我提出不负责动员和送兵，只负责接待和后勤给养。

决议形成之后，县委马上写了一份报道给中央办的刊物《红色中华》，说是要在一个月內扩大红军三千人。这件事被少共中央知道了，他们批评了长胜县委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他们说大话，并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旁边配有一幅漫画，画着一把斧头砍向长胜县三个字，讽刺他们吹牛。结果，后来只扩大了不到一百人，其中大多数还是强

迫来的，在县保卫队七十多人全副武装送兵的途中，这些不情愿参军的人趁着天黑下来住宿的机会都跑光了。

这件事使我非常难过。我在云集区的时候，扩大红军一千人，我们只派了几个人带队护送，到目的地时一个不少，这主要是靠群众的觉悟，要靠他们自愿。不看环境条件，好大喜功，不做细致的实际工作，只靠命令主义是行不通的。考虑到我的观点和洪明贵等人的观点相差太远了，勉强在一起对工作不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王观澜同志，把我的处境和县委的做法都如实地反映了。王观澜同志向毛主席和中央政府作了汇报，最后由中央政府调我到苏维埃大学去学习。

当时苏维埃大学的校长是毛主席。大学主要是为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培养一批干部，以便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入学后我编在二大队。按学校的规定，学员每人都要参加一项体育活动，有篮球、乒乓球、爬山、走路等项，我报了走路，每天早上从沙洲坝到县城来回走一趟（有十四里路），才回去吃早饭。

毛主席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到学校来看望大家。我入学半个月后，毛主席就找我谈话，要我到二大队当指导员，我推辞干不了，毛主席就开导我，让我边干边学。后来，他见我面有难色，就微笑着问我还有什么困难，我吞吞吐吐的半天都不敢说，最后才半露半吐地说：“总支委开会我不习惯。”毛主席问：“是不是同志审判会？”说着，脸色就变得严峻了。

说起这个“同志审判会”，又是王明路线从苏联搬来的。王明路线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从苏联搬来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不少是非常“左”的。他们使党内民主生活全被践踏，没有一点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热情帮助，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同志审判会”，会上就可以判其一至三年的徒刑，不开除党籍，没有津贴，只管饭，干重的、艰苦的体力活。

后来，我还是接受了毛主席给我分配的任务，当了二大队的指导员。当时，我的思想非常活跃，喜欢从各方面思考问题，有时竟大胆地提出与权威人物也不一致的观点。

有一次，洛甫（张闻天）来苏维埃大学演讲，主要内容是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他在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殖民地的道路，一条是苏维埃的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苏维埃的道路。

会后讨论的时候，我站起来发言，我说：殖民地道路我们是坚决不走的，但是苏维埃的道路又非常远，我看目前不见得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比如前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建立生产大众党，并主动要求和我们联合，如果我们和他们联合起来，蒋介石就不可能那样快把他们镇压下去，我们的苏区也就能更加扩大和巩固，这样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加有利。许多学员都不同意我的发言，和我进行辩论。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毛主席。主席听了以后对我说，你发言积极、敢讲心里话是好的，但是你不太懂的东西就不要去讲，懂的东西可以多讲一点，你就讲你在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嘛，那是绝不会错的。事后很久我方明白，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搞思想禁锢，如果说话行事稍不慎重，很可能要受到他们的打击或迫害。

在苏维埃大学学习期间，我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去得多了，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熟了，尤其是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吴吉清两位同志。那时主席已和贺子珍同志结了婚并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大约三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吴吉清同志经常带着他，我也经常逗他玩。但和贺子珍同志却没见过面，因为她的工作也很忙，经常都不在家。贺子珍同志是江西永新人，在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人非常能干，和她熟悉是一九三四年我到主席团工作的时候。主席的这个

孩子在我们长征时被送到长汀去了。

在苏维埃大学学习了两个多月以后，我们就毕业了。这一期的毕业生有几百人，都分配了。就在我们毕业后不久，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上六点多钟，中央领导先检阅了红军大学的学员。参加检阅的还有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学校（炮兵学校），中央军委警卫连等部队。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那时，重大的纪念日或大会前，都要检阅部队。下午，大会正式开幕。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宣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主席致了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特立等同志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到会代表七百多人，列席代表一千五百多人，我是列席代表。

第二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毛主席号召全体军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问题。

二月一日，大会闭幕，毛主席作了闭幕词。闭幕会上散发了毛主席写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个文件。大会选举毛主席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二苏大会的会场我听说是钱壮飞等人设计，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总

务厅长袁福清负责施工的，门多，散会马上能离开。会场有两层，楼下是代表席，楼上是列席代表席。楼不高，楼上第一排离主席台作报告的地方只有六七米。主席台比代表席高几尺，能坐几十人，楼又比主席台高两三尺，楼上楼下各坐七八百人，场内有很多柱子。会场设计得蛮好，现在沙洲坝重建的我看了，不像原样。

会场的后面还有一个防空洞，洞有一人高。说是防空洞，实际上是挖条大沟，上面盖上松树、竹片，再盖上土。过去的炸弹最大的只有三十多斤，直接命中也不要紧。防空洞能容纳一千多人。

毛主席本来想要瑞金县选我为代表的，当时主持瑞金工作的中央某部负责人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没有选我。毛主席对我说，我叫他们提名选你，他们不选。我说没选更好，选了我就要留在瑞金工作了，我更愿意跟着主席工作。如果那时要真的选了，我还不能跟毛主席长征呢。

早在一九三二年，王明路线的党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这才转来中央苏区的。八月的“宁都会议”，夺去了毛主席红军总政委职务。这次大会又夺去了毛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这是王明路线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就决定了的。

还是在云集区的时候，我就感到苏区中央局下来的有些人作风不好，言行不一致，那些人都“左”得很。“宁都会议”后，我们就看出毛主席受了排挤。特别是五中全会前后的那段时间，这种打击和排挤就更为明显。我参加了几次中央机关总支委会议，当时非常不理解，以后回想起来，归纳为：六届五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打击毛主席的行为到了顶点。

王明路线给我们党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我把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分几个方面来谈谈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主席与他们的斗争。

社会政策：

毛主席的政策对地主是消灭地主阶级，取消剥削制度，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对富农是征收多余的土地，对高利贷者也一样，给他们有吃有住有出路，让他们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王明路线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我记得有个地主叫谢光镒，还是个知识分子，瑞金第一次解放时，把他的田没收了，留了一份给他，也不让他雇工，他就自己上山砍柴，下田劳动。一九三一年分田时，不分给他田了，他就拼命了，到处造共产党的谣，鼓动一些人的不满情绪，结果把他杀了。那时有很多地主、富农都逃出了苏区，最多是逃到赣州，还有逃到南昌、广东等地的，没逃走的就捣乱，跟我们拼命，杀害、陷害我们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那时，放火、投毒的事都时有发生，并且都是这些人干的。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了，他们怎么会不反抗呢？

干部政策：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教育干部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对干部总是表扬、鼓励，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对培养得好的同志就提拔，鼓励干部的积极性，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文化和理论学习。对犯错误的同志则强调教育和帮助，还有就是耐心等待。对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本人，只要承认了错误，改了就行。

而王明路线则相反，他们搞宗派主义，以小团体画线，对不跟他们走的人就不择手段地打击。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们就打击“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开斗争会时说他们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江西的罗明路线，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何叔衡和王观澜也是这样。

王明路线是用打击人、惩罚人来推动工作的。他们那时到云集区来，也是专找缺点，加以扩大。王明路线搞任人唯亲，不是根据干部的德才，凡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凡是跟他们走的，不管是

否有能力、有经验，都超级提拔重用。王明路线还到处派中央代表，许多省、地区都派有这类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可以代表党中央指挥一切，凡是不听他们指挥的，就可以报中央搞掉。

肃反政策：

肃反本身是正确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掌握政策。把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来，这样才可以纯洁革命队伍。毛主席还提出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记得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讲到过去的肃反时，毛主席很难过，说：“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纠正，唯有错杀了人则不能纠正，因为人都死了。”

王明路线的肃反就是疑神疑鬼，搞扩大化，凡是不跟他合作的就说是反革命，而不是以一个人的革命经历、对革命的贡献和投身革命的热情来做依据。在方法上采用逼、供、讯及肉刑拷打那一套。被拷打的人受刑不过只好乱讲，讲了就信，信了就抓，抓来再打，打了又讲，讲了又抓。结果是越抓越多，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真不知什么时候会从天上降下祸来，整天精神都是紧张的。而那些被拷打的人，不讲是不罢休的，实在讲不出的，还会指名问供，一直打到对方说“是”才罢休。

我的家乡壬田镇，每逢农历的四、九当墟，周围的老百姓挑上自己的农副产品去卖。一九三〇年肃“AB团”时，这里负责肃反的人连“AB团”是怎么个组织都搞不清楚，但他们又不甘落后，就把街上卖椽子的几个农民抓起来。因为椽子很长，老百姓就把两捆椽子的顶端用绳子扎起来，中间再穿上一根扁担，这样一副椽子担就像是一个大写的“A”字，于是，这几个卖椽子的农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成了“AB团”。审问当然问不出什么名堂，后来都推出去杀掉了。

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就更严重了，那时叫肃社会民主党。我们都怕到上面去开会，因为有很多次的抓人都是在开会时进行的。

开会还有这样一个规定，即参加会议的人都必须带介绍信去，报到的时候介绍信随之收走，散会时再发还给你，会没开完是不可以提前走的，即使你发现参加的这个会是肃反抓人的会，你也不敢中途退出。记得一次我和乡里的另外两个人到壬田区参加会议，一进场就被叫出来站队。参加会议的人被要求站成两排，我站在其中的一排队伍中，和我同来的那两个人被叫到另外一排队伍中去了。站完队后，那一队人被带走并被关了起来，说他们有问题要审查，剩下的人接着开会。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谁知道明天又将会怎样呢？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并尽力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如果你起早了并且有惊慌的表现，则可能也要被抓起来审查。上午开完会后我去拿介绍信，区里通知说中午会餐，叫我吃了饭再走。我哪有什么心情去吃饭，拿了介绍信就往回走，走还不能走得太快，走快了又怕引起怀疑。待离区委远了以后，我拔腿就跑。原来我们乡政府有各级工作人员五六十人，由于肃反扩大化，大家都又紧张又害怕，最后跑得只剩下乡主席温时汗、我、两个通讯员和一个大师傅。

肃反中的错误是毛主席发现的。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晚上把人吊起来搞肉刑拷打的情形。毛主席发现逼供讯很严重，马上派人进行了制止。从那以后，毛主席一再强调严禁逼供讯。以后到了延安，毛主席还多次在中央大礼堂作报告时强调要严禁逼供讯，提出审查干部（当时称之为抢救）要领导同群众相结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重证据。毛主席说，要重证据，逼供讯就是拷打，你一打他就招，招了就抓，就扩大化了。

财经政策：

王明路线搞得是苏区一建立，市场就萧条，国民党军队在外面封锁我们，不让商人带货进来，王明路线在苏区里自我封锁，外面的商人不让进，里面的商人不让出，怕商人来往走漏了军事消息。

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担任中央苏区领导工作期间，群众生活很好，商人可以自由进出，买卖照常，物价也非常平稳。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以后，情况就开始不好了，特别是一九三四年，情况更紧张了，尤其是盐、布匹、药品很困难。苏区的农产品和土产品价格下跌，粮食一元钱可以买回十多斤，一担谷（一百斤）卖不到两元钱，猪肉一元钱九斤，牛肉和鱼是一元钱十七八斤。土产也非常便宜，木材根本卖不出去，自己又用不了。过去苏区的牲畜、大米、糖、油、木材这五项产品是大量出口，盐、布、药品是大量进口，到后来是出不去也进不来了。毛主席领导的时候，是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红军到哪里，中小商人都不怕。王明路线的时候，中小商人都纷纷停业，一是害怕财产被没收或亏本，二是也没什么生意可做了。

中央苏区的区域是很大的，各种物产也很丰富。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这是个路线问题。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是路线下的政策问题。

王明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给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就拿五次反“围剿”来说吧，前三次反“围剿”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都顺利地打败了敌人。第四次反“围剿”毛主席没有亲自指挥，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存在于红军指战员心中。在宜黄、宁都打了几仗，把敌人的两个师长，一个叫李明、一个叫陈时骥的都抓住了。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完全排斥毛主席的领导，又不按毛主席的作战原则战斗，所以第五次“围剿”没能粉碎。毛主席的作战原则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大兵团伏击。总之，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王明路线则是采取硬碰硬的阵地战，以碉堡对碉堡，和敌人硬拼实力。那时我们和敌人的力量相比，悬殊十分大，敌人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兵力、物资供给等，都比我们优越得多，并且还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大城市作依托，所以，

这样才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这些问题，越到后面是看得越加清楚了。

五 毛主席派我当巡视员

在苏维埃大学的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土地委员会工作，任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没多久，也就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刚结束，毛主席又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当巡视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下设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为立法机关，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毛主席任主席团主席，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我担心自己文化低，理论水平不高，掌握不好政策，能力不够，但又不敢说不去，于是就一直住在中央土地部，迟迟不到主席团去。

不久，毛主席又派人把我叫去，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主要是文化低。”主席说：“边干边学嘛！”我问毛主席：“巡视员都做些什么事情？”毛主席说：“帮我了解情况，调查问题，检查各级政府执行政策的情况，看看干部作风如何，是不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注意群众生活。”

我又问毛主席：“还有谁是巡视员？”

毛主席说：“还有王首道和周月林同志。”我一听王首道的名字就更不安了，人家王首道同志以前还是湘赣省的省委书记呢。还有周月林同志，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我和他们比肯定差远了。于是，就把我的顾虑说了出来。

毛主席听完后笑了笑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长处，工农干

部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是本地人，对这里的情况、风土民情都非常熟悉，并且有基层工作经验，这些我都很需要，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工作，革命斗争是人增长聪明才智的途径。”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原来的顾虑也都消失了。于是，我立即到主席团报到，就任主席团巡视员。

主席团设在沙洲坝一幢普通的农村房屋里，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天井，四周有四间房子。毛主席用两间，一间是办公兼会客用，一间是寝室。谢觉哉秘书长一间，王首道同志一间。在这幢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幢小一些的房子，共有两间，我和周月林同志各住一间。当时沙洲坝的住房非常紧张，按规定部长级的干部才能一人一间房，我有点不安了，就向毛主席提出：“我还是和哪位同志共住一间吧。”毛主席说：“还是按规定的待遇来办吧，随随便便不好。”这样我才住了那间房子。

我那间房子离毛主席的办公室最近，只有两米左右距离，中间隔了条巷子。毛主席的房子门朝南，窗朝北，我的房子是门朝西，窗朝南，窗户和毛主席的窗户正相对，而我住的房子地势略为高一些，所以平常各人都在房间里时，我能看见毛主席的腿，毛主席能看见我的身子。

我在那里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住到四月，在毛主席身边生活和工作了难忘的四个月的时间。

在主席团任巡视员，饭都由炊事员送来吃，我和周月林住的这幢房子里还有一间小堂屋，当中摆了一张长条桌，一般都是接待群众用的。我吃饭是一个人在房里吃，主席吃饭也是在自己的房里，而贺子珍、周月林和另一位女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则喜欢在这间小堂屋的长桌上吃。她们在一起非常热闹，边吃边说笑。后来周月林就叫我也出来吃，说是桌子四方坐了三方，现在还空着一方，老朱你来凑个

数吧。我不好扫她们的兴，于是就把自己家里制作的豆腐乳、甜酒泡鱼、腊肉香肠、豆豉都拿出来请她们品尝，她们都赞不绝口。周月林特别喜欢说笑，谈天论地讲故事说笑话，非常热闹。我带来的东西吃完后，她就对我说：“老朱，你怎么不回家？你回去一趟嘛。”言下之意是再带一点特产来吃。贺子珍同志就插话说：“开铨同志现在是巡视员，是个高级干部，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说走就走呢？就是要回家也要向主席请假。”子珍同志平常话不多，讲话非常慎重，待人很有礼貌，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主席也非常尊重。她还经常找我谈话，跟我讲如何才能做好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些什么。并告诫我到基层去调查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的政权还不稳固，在根据地里还有隐藏的敌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也有混进来的敌人，要我千万不要大意。对我的工作她也总是给予鼓励，说我组织观念强，对革命事业非常忠诚，善于接近群众和调查研究。我感到子珍同志对人非常和蔼亲切，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讲，并经常征求她对我的意见。以后到了延安，我去看主席的时候，也经常去看望她。一九三八年她去苏联养病后，我在延安就没有再见到她了。全国解放后，一九六一年我在庐山疗养，正好贺子珍同志也住在山上，我住的房子和她住的房子相距只有十几米，她几乎天天都到我这里来坐，经常在我这里吃饭。她很喜欢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也都很爱她，亲切地称之为贺妈妈，子珍同志非常高兴。后来贺子珍同志在南昌住了几年，仍经常到我家里来，我也经常去看她。

在我任巡视员的时候，毛主席每次去瑞金开会都带我去，因为我是本地人，情况比较熟。

记得有一次在县政府连开了三晚的会都是晚上六点到深夜两点多钟才结束。大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瑞金县一年来的工作总检查，还有一个是解决县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矛盾问题。

每次开会都有几十个人参加，毛主席坐在桌子旁，边听边做笔记，我坐在毛主席的背后。第二天晚上会开到一点多钟，我困了，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身体向前一倒，头撞在毛主席的背上。毛主席还在作笔记，头也没回就问了一句：“谁在打瞌睡？”我赶紧回答：“我。”心里非常紧张，脸上直发烧。谁知毛主席并没做声。会接着又开了十几分钟，毛主席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下午六点钟在这里继续开。我相信今天不只是朱开铨同志要打瞌睡，可能还有不少人要打瞌睡。”

那时，毛主席都是吃完晚饭从沙洲坝走到县城开会，开完会又走回沙洲坝，单程一趟有七里路。回来的路上，我跟在毛主席身后走着，望着毛主席的身影，我心里想：毛主席真伟大，这样教育我，比批评还厉害，会都少开了半个多小时。

第二天晚上，我又跟着毛主席去开会了。开会前，我搬了把椅子坐到毛主席对面去了。主席见我换了地方，笑着说：“怎么，今天不来碰我的背了？”毛主席教育干部，从不使用刺激的批评使人难受，而总是从爱护出发，启发干部自己来认识。

有一次，毛主席派我到于都县去巡视工作，规定了时间和任务，主要是看看群众春耕生产的积极性，群众对保护既得利益的斗争性如何，还要了解干部作风、群众要求、存在的争议等。接受任务后我马上就出发了。到那后跑了一些地方，看见群众积极性都很高，都在田里搞肥料，有的准备浸种。那里的干部对生产抓得也很紧。我还到了离于都县二十里路的古田区，发现区里的干部都在讨论毛主席的两句话，很热烈。这两句话就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认为这个现象很重要，就着重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毛主席并没有交待这个任务，汇报时我提出来了。我说于

都县对这两句话讨论得很热烈，毛主席问我检查了没有，我说当第一位的工作来检查，要是各级干部能按毛主席说的去做，其他的就好办了。毛主席笑着说，你还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了。我说，这次我还顺便到登贤县去了一次（登贤县也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县，在都的南面）。县委书记张振芳很注意这两句话，他们的工作比于都还要好。毛主席说，我不是只给你规定了十五天的时间，你来得及吗？我说，我走得快，一百里一天就到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在任巡视员的时候，我在瑞金县走得最多，有时也去别的县。有一次，毛主席叫我会到会昌去检查一下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看看肥料是否充分，红军家属是否做好了春耕的准备。

那时中央苏区普遍都搞了互助组、互助社，人少的家庭互相帮助，互相换工、变工，比如割禾就是四个人一套，哪家的禾先熟了就割哪家的，不耽误时间。

到会昌后，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当地群众有个争论，就是水稻一年种一季还是种两季。当时县委开会布置是统一一种两季，群众接受不了，就来找毛主席的巡视员，要我解答。我自己种过田，再说在中央土地部任委员时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过去受封建统治的影响，很多地方都没有种两季，主要是因为水利问题是个关键，灌溉和排涝都成问题，如果碰上干旱或水灾，晚稻的收成就保不住。如果种一季早稻、一季大豆或是红薯，即使碰上旱年也还有一点收成。

于是我对他们讲，两季稻有好处，县委这样号召是对的，但还要实事求是，看当地的情况，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气候，要暖得早的地方；二是人口与劳动力，种一季都吃不了，就可以种一季，劳动力不足，一季都种不好，两季就更不行了；三是水利的排灌条件具备；四是肥料充分；五要土质适应。群众都说劳动力不够，平均每人有两三亩田，一个劳动力要种十多亩田，种两季吃不消。我就对县委的同

志说，根据群众要求和实际情况，不要强迫命令，就种一季为好。我这么一讲，县委都说有道理，于是决定还是种一季。

我回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完笑了，说我胆子大，敢否定县委的决定。

毛主席从来没说过“很好”，也没说过“不好”，总是说“相当好”。我想，“很好”这个讲法是不是就是到了顶的意思，没有发展余地了，毛主席才不用它呢。

毛主席还亲自到瑞金的武阳镇去进行了一次调查，回来后没写总结。那次我没去，所以不知道是怎样调查的，都调查了些什么。毛主席对武阳很感兴趣，对那里的工作很满意。后来他又叫我去那里去搞调查，让我去看看他们的具体做法，并让我办一所托儿所。我想这可能是要考察我的工作能力和观察事物的能力。

武阳在瑞金的南部。我们瑞金有种现象，沙洲坝以北的女人都是小脚，从武阳到会昌都是大脚。武阳的妇女同志十分能干，女劳动力超过了男劳动力，那里都是种两季水稻，群众生活很好。我深入农村了解，发现这里工作之所以好，最根本是打破了姓界和房界，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阶级斗争深入了，反革命的活动也镇压下去了。特别是武阳区的下洲坝村，这里有千把人，一九三〇年，四周其他的区都被敌人占了，只有这个村子坚持斗争，敌人一直不敢来，他们就一直坚持到红军回来。这里的村子是在平地上，坚持斗争就更不容易了，每逢暴动或是打仗的时候，只要一号召，男女都来，声势很大。

我动身前，毛主席就对我说：“女同志是大脚的地方，她们要下田，我们要创办托儿所，小孩白天放在那里，晚上领回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决定选下洲坝村办托儿所，我向他们宣传，是毛主席要我们组织托儿所的，并把办托儿所的好处向他们讲清楚，这里的人都很欢迎。这样，就办起了全苏区第一所托儿所。

一开始有六十多个小孩入托，以后更多了，从一岁到五岁左右的都收。管理人员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医，负责孩子的健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教孩子们认几个字；还有几个妇女负责洗洗东西，打扫卫生，孩子们都在家中吃睡。办托儿所没用多少钱，这几个人如家中有什么事，大家就帮助他家劳动一下。不过他们也没有提什么要求，那时讲究表扬，表扬一下，也就高兴了。

我回去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问我，办托儿所群众喜欢不喜欢，我说群众都很高兴。毛主席又说，这是政权的一种建设。过去我们都没有认识到办托儿所是一种政权建设，以后到了延安，机关都办了保育院。

不久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中央土地部争论在农村栽种一季稻和两季稻的问题，争得相当厉害，最后解决不了问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问土地部长，你们作了什么调查没有？土地部长说没有。毛主席说，没有调查，根据什么来争论？哪里打来的报告，就到哪里去调查嘛！争论的中心在哪里？坚持一季的理由在哪里？坚持两季的理由又在哪里？毛主席最后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以后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是经常强调的。

随后，毛主席就派我去调查，叫我去看一看一季和两季各有什么依据。我提出到瑞金的九堡去，毛主席同意了，并给了我五天时间。

四天以后，我就回来了。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九堡那里普遍种两季，他们有这样迫切的要求。原因是：一、土地少，平均一人不到一亩，而且妇女都是大脚，劳动力多，不种两季不够吃；二、那里水利条件好，旱涝保收；三、其他经济作物多，姜、辣椒、烟叶、酸菜全县都很有名，肥料也比较充足；四、气候条件好。所以，那里种两季也就是很平常的事。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满意，说：“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具备，

种两季就蛮好。但是，你还要到反对种两季的地区去调查，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这样，我又选择了瑞金的沿冈区。那里强迫群众种两季，群众都不种。

从沿冈调查回来后，我向毛主席汇报：“那里和九堡不同：一是气候冷不适宜种两季，要种的话也只能‘压禾’，就是早禾还没有割，就到了插晚稻秧的季节，根本没法种。二是那里山货多，出茶油、杉木、竹子、棕、桐油、樟木、柿子、金钱橘，还造纸养蜂，他们粮食不够吃就去买，靠山吃山，完全没有必要种两季。”通过上述几次调查，毛主席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说我能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工作。毛主席告诉我，解决矛盾，要因地制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主席还派我到古城去调查，因为那里有反映，说是农民之间互相斗争得厉害，还有把佃农当地主的“狗腿子”来斗争的问题。古城离沙洲坝有四十里路，离瑞金县城三十多里，离长汀五十里，属福建长汀管。这个地方是瑞金去长汀的必经之路。毛主席那时经常去长汀工作，所以多次路过，对那里比较熟，了解的情况也多。长汀县以前曾几次派人去发动阶级斗争，都没有取得成效。我向毛主席提出：“我去一趟，那里我熟，我祖母的家就在那里。”主席问我要多少天，我说快则三天，慢则五天。后来主席给了我三天时间。临行前主席对我说，佃农反对佃农不好，要批判，要用合理调整的办法，保证大家都有饭吃、有田种。毛主席还说，你把情况搞清楚就好办了，长汀派了几次人，就是情况没搞清楚。

古城街上有几百家小店，大多数都是卖竹、木手工艺制品的。这里主要有两条主要街道，一条叫横街，一条叫上街，都有三四里路长，周围则有十多个村子。

那里的情况全国都少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田是江西地主的，这些地主都住在瑞金县内，只是收租时才去一下。当地的人不是佃户、

小手工艺者，就是做小买卖的。买卖又做不大，都是几百元钱的成本，上千元的很少。当时按规定，只打击封建势力，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商店，所以做小买卖的人都不愿参加斗争。红军解放那里后，分田不是按人口分，而是谁耕种了多少地，谁就得多少地。对地主也没有进行斗争，有些佃农是想斗争的，但他们又不愿到瑞金来斗。有些佃户还留恋地主，因为地主不敢来收租，地就是这些佃户的了。地主留下来的房子，楼上仍是地主的谷仓，楼下住佃户，给他们看门。有些地主还帮佃户买牛，将自己的田都隐藏在那些佃户的名下，这些佃户就成了隐田户。所以，有段时间当地还将这些佃户当做地主的“狗腿子”来斗争。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用调剂的办法，不用查田运动那样激烈的斗争方式，进行了以优待红军家属为原则的调剂和教育工作，合理地解决了那里存在的问题，使大家都有田种。我们走的时候，也向长汀来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佃户都是被剥削阶级，他们中间占了便宜的，要用调剂的办法来解决，不要用对待地主一样的斗争办法。

在毛主席那里当巡视员，进步是很快的，能经常直接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

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出去有什么困难，我说：“我文化低，对民主集中制还不太清楚，下面的同志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不上来。”毛主席说，这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原则，什么叫民主？开会大家发言，有什么想法，意见都可以讲；集中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你提出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定了，可以保留，你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可以在下次会上重新提出来，但言语行动一定要服从，要执行多数人的意见和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多数人通过了，就是集中，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再坚持就要犯错

误了。

现在回想起毛主席在“宁都会议”以后不久讲这样的话，就更使人感动了。

还有一次，我问毛主席，怎样才叫艰苦奋斗？毛主席说，艰苦奋斗就是不管环境怎样，不管是冷啊、热啊、敌人啊，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地去完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有斗争，甚至有战争。艰苦奋斗好比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为了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怎么苦也要坚持。有条件时，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也是必要的、合理的。没有条件强调吃好穿好，那就不行了。

毛主席还跟我讲过联系群众的问题。毛主席说，联系群众不是要你天天到群众家里去，而是看你的政策和方法。比如计划是不是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是不是与群众利益有矛盾。联系群众是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注意群众长远利益的，就是无产阶级立场。比如你是一个指挥员，指挥一场战斗，仗打不打，关系着群众的生命。仗打得无益，就不打，硬打就侵犯群众利益了。但能打的仗不打，也是违背群众利益的，群众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毛主席还说，你是一个指挥员，群众把生命都交给了你，你不好好侦察，不好好分析问题，怎么能当好指挥员呢？当指挥员不是要你去挖工事，去送信，是要你分析了解敌情。敌情清楚了，才好下决心。有胜利把握的仗不打，犯右倾错误；没有胜利条件的仗去硬打，就要犯“左”倾错误。毛主席还教导我，要尊重别人，特别对下级要尊重和关心，到哪里都不要摆架子。

当时我听了这些话，总以为是对我个人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到，这同时也是对王明路线的批判。那时王明路线搞了很多看上去很“左”，实质上是侵犯群众长远利益的事情。在瑞金就有这样的事，他们在县城组织工人斗争资本家，结果工业资本家破产关了门，工人

没活干，失了业。商业资本家见状害怕逃走了，店里的货被群众搬光了，店员也失了业，搞得影响很坏。

毛主席还经常鼓励我学文化，说文化提高了，才能懂马列主义理论，才能进步得更快。他还多次亲自教我学理论，学文化。有一次，我把《列宁主义概论》这本书上看不懂的句子抄了一些下来，拿去请教别人，不愿打扰毛主席。后来毛主席看见了我抄的文章，指着问我懂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就给我讲解了一遍，一直到我真正弄懂了为止。主席见我抄句子没有把标点符号抄下来，便对我说要学字，还要学标点符号。随后就拿出纸和笔，边写边教我。主席说，一句话没有说完要停顿的，就打一个逗号，一句话说完了，就打一个句号。接着又耐心地把每种标点符号的用途都教了我一遍，教完之后对我说，标点符号很要紧，每个标点符号都算是一个字。毛主席还经常给我讲作风问题。他在我这么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毛主席有时还有意识地考我，看看我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有一次有人到毛主席那里告状，说瑞金黄柏区的苏维埃主席是地主。毛主席就把有关的材料给我看，问我应该定什么成分。我说是富裕中农，主席说，就是中农。随后又将它们之间的界限给我讲了一遍。

主席跟我谈话，大都是在他办公室里烤火时进行的。按规定，主席团只有主席才有火烤。我因住在主席对面，毛主席办完公，有时看见我冷得在房里走来走去，就叫我过去烤火，我又想多得到主席的教导和帮助，所以主席一喊我就赶快过去了。

毛主席还经常问我瑞金人民的生活情况，有哪些习惯，平常都吃什么。自从瑞金革命成功以后，贫雇农都分到了田，又不用交租，生活是很好的。于是我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并举我家的例子给毛主席听。我家原来每年要交三十担谷的租，现在只要交两担谷的土地税。毛主席“噢”了一句，问道：“你家还要交税？”我说：“要。”

毛主席又问我家有多少田。我说二十二亩。主席又问能割多少禾，我说湿谷一百来担，晒干后只有七十多担。主席又问：“你出来了，谁在家里种田？”我说家里大大小小的有九口人，他们种，秋天还有花生、红薯、豆子，现在生活好多了。我还告诉毛主席，过去交租的时候，还要办酒席请地主吃，租了几个地主的田，就要请几次酒。

跟毛主席谈话，我总是觉得心里暖烘烘的。毛主席没有一点架子。过去，谁看得起我们种田的老表呢？至今，我只要回想起这些情景，仍会感到温暖和幸福。

毛主席是那样伟大，又是那样的谦虚，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他总是不耻下问。有一次，也是在烤火时，毛主席又问我瑞金的械斗是怎样产生的。我说，这多半是劣绅和流氓挑起的，他们喜欢械斗，并可以从中捞到利益。流氓游手好闲，要打架就要请他们，先给他们钱，让他们大吃大喝一番。他们吃了十元钱就说吃了一百元，劣绅出面写状子，打官司，用了十元钱，也说用了一百元，都要找事主和公堂要，公堂就按田亩摊。同姓的贫雇农不仅要出钱，年满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参加械斗，所以死伤的大都是贫雇农。

我举了两个例子给毛主席听。一个是革命前的刘、谢两姓的械斗。瑞金黄柏一个姓刘的人给一家姓谢的地主做零工，工钱是八十个麻钱一天，做了五天，得了四百个麻钱。姓刘的发现里面四个麻钱是小钱。就对姓谢的地主说，老爷，这四个不好用，给换一下吧。地主说，钱又不是我做的，也是卖东西收来的。姓刘的说，你拿出去买得到东西，我买不到。这时，谢姓地主村上的流氓说，你还敢骂我们老爷，就把他打了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刘姓的人当然不服气，要报仇。当时是姓刘的人多，姓谢的钱多，双方都到了千把人，大打了几场并且都有死伤。姓谢的死得多些，死了四十多人。就是为了这四个麻钱，死了几十条人命。

毛主席问为什么能动员到这么多人？我说，那次也是按规矩，豪绅先出钱到县里打官司，流氓出钱杀了两头猪，买了几百斤米粉，几百斤酒，在祠堂里把人叫来吃了一顿，然后在圩场上贴出了挑战书，上面写着：姓谢的，我们某天在某地答复（就是打架），不来是乌龟王八蛋。打的那天，还要吃几顿，在祠堂里边吃边议事：第一，被打死的多少钱一个（一般是一千块钱一个）；第二，残废的如何处理（一般养到老）；第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都要参加。不去不行，不去就“占乌印子”。所谓“占乌印子”，就是用墨将这个人的姓名在族谱里盖掉，等于将他开除出此姓。一般群众都怕“占乌印子”。械斗打起来以流氓为主，又是买硝，又是买武器，而流氓在械斗中又死得少，因为他们是组织者，死伤的多数都是贫苦农民。

我还给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七堡欧阳姓有个人是沙洲坝杨姓人的外甥，被九堡钟姓人打了。欧阳姓因是小姓不敢出面，沙洲坝杨姓的人就趁九堡钟姓人去县城路过沙洲坝的机会，打了钟姓人。结果杨、钟两姓也打了几场大仗，双方都死了三十多人，杨姓人死得多些。

毛主席听完之后说：噢，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姓界、房界不容易打破。我说，还有一个不好是祠堂，他们不劳动也有吃，而且就是靠这个封建堡垒赚吃的。

在主席团时候，我还记得一件这样的事：毛主席到中央苏区的边界与十九路军谈判，主席办公室的两位女同志为了主席能穿上合身的衣服，就亲自到被服厂去为毛主席做了一套。做好后叫人去拿，但却空着手回来了，说要毛主席自己写条子。毛主席说，我不要，也不开条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明路线排斥毛主席，并且在很多方面人为地制造一些难题，但毛主席却不以为然，照样做工作。

我们三个巡视员，毛主席对我的教育比较多一些。王首道同志当巡视员不久，就调到中央总动员部去了。周月林是梁柏台同志的爱人，

她很少到基层去，一般都留在家中，她还是主席团的成员之一。

毛主席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吃饭只有一菜一汤，总是素菜多。要说好的菜，就要算农村中常有的鸡蛋、豆腐或者河虾。

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很高，特别是在普通群众中。这威望不是靠职位和权力得来的，而是主席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解决切身利益而树立起来的。即使主席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群众对待主席仍是一如既往。有一次，一位福建长汀柞田的老农民来找主席。周月林因为不懂他的话，就让我来接待。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只是想来看一下毛主席，他以前没有见过。我问他：“这样远的路，你有路费吗？”他说：“我是带着米走来的。”我很感动，这个农民这样大的年龄，步行两百多里路，只是想看一下毛主席，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特别是在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挤毛主席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就更难能可贵了。可我又很作难，主席这样忙，昨天晚上又是一个通宵没有睡，现在正在办公，怎么好打扰他呢？后来我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主席不假思索，立刻让我把这位农民带进他的办公室，并谈了半个多钟头才送他出来，还特别嘱咐我告诉总务厅的同志好好招待他，并发给他一些回家的路费。

一九三四年四月，毛主席到福建去视察，我没有去。后来洛甫同志找我，要调我到粤赣省去工作。由于原粤赣省土地部长胡魁元被撤了职，而土地部的工作又很重要，所以决定派我到那里去，还没有等毛主席回来就催促我赶快去报到。这样，我便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毛主席，到粤赣省去工作了。

说到张闻天（洛甫）同志，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张闻天同志对人态度亲切和蔼，关心同志，并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我很喜欢听他讲话作报告。还是一九三三年在苏维埃大学学习时，张闻天同志来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到主席团当巡视员后，和他的来

往就多起来了。张闻天同志当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长，所以我接受了毛主席下达的外出检查工作的任务后，总是在行前也向张闻天同志通告一下。检查回来后，除了向毛主席汇报外，我还把检查的情况主动向张闻天作简要的汇报。因为我虽是主席团的巡视员，但我了解调查的对象都是各级苏维埃政权，所以把我掌握的情况及时地告诉一下张闻天同志，对于改变苏区干部作风，促进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有好处。毛主席也赞同我的这一做法。张闻天同志待人很和气，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的工作总是表扬和鼓励，说我工作能吃苦，善于调查研究，有时主动果断地解决问题，对党和群众有利的事能主动去做。张闻天同志的工作也很忙，但只要有空，总喜欢和我谈谈话，问我的家庭情况及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并经常鼓励我学习文化。他对我说：“文化低要重视，要努力学习和提高。文化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你的工作水平的提高，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张闻天同志还经常询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并辅导我的文化和理论学习。在我的印象中，从上海临时中央到苏区来的人，张闻天同志对毛主席的态度是最好的。在毛主席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时，他仍和毛主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来看望毛主席，而且和主席很谈得来。长征时在离开苏区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他也经常和主席一起走。我对张闻天同志很敬重，以后到了延安还经常去看望他。

六 战斗在苏区的南大门

一九三四年四月，我调往粤赣省政府担任土地部长，同时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省政府驻在会昌县城东五里远的彭迳松山排，省委在文武坝。

那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王明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北面吃紧，南面也一样。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队伍已经占领了寻乌、安远，会昌县成了苏区的南大门。

在安远县和会昌县城之间，有个高排镇，离会昌县城六十里，离安远县城一百里，是苏区与白区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又是三个区的交界处，有二十多个乡，四万多人。

高排在我们手中，名义上是苏区，实际上已成为游击区。我们在那里驻了一个独立营，有四百多人；三个游击队，有两百多人；还有一个保卫队，五六十人。

离高排只有二十里路的地方，就是敌人一个两百多人的民团，离高排四十里路的天心镇，还驻有四个民团六百多人和一个广东军阀的正规团。

安远县城内，驻有陈济棠的一个旅部。他们装备比红军好得多，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下辖两个团，一个在天心与高排对峙，一个在筠门岭，同在罗田的红二十二师对峙，互成犄角。

天心的广东团经常纠合民团进攻高排，三个月连续包围了三次。我独立营和游击队因为驻扎在山上，没受什么损失。驻在高排街上的机关和保卫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省保卫局很有意见，因为成立保卫队不容易，枪支、弹药在红军中都是最好的，人也大部分是党团员。

敌人三次占了高排，都只住了几个小时就撤走了。原来国民党军队中派系众多，他们都要各保实力。陈济棠出兵江西，主要是为了保卫广东外围，所以派兵占了寻乌、安远等地就满足了，不大想跟红军硬拼实力。一九三四年四月又占领了筠门岭这么个大镇子，高排这边就想先消灭独立营后再占领。

我去粤赣省工作时，正是高排第三次遭受损失。省委正在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准备派个部长去那里，组成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委员会的名称定为中共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简称为中共会安工作委员会。

那时的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省军区司令员是何长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钟世斌。省苏维埃共有五个部，经济部长是欧阳崇庭，裁判部长是刘辛庭，财政部长谢炳煌，内务部长肖连登，土地部长是我。

欧阳崇庭、刘辛庭和谢炳煌的都是知识分子，很会说，在打击人的会上凶得很，把瑞金县的原县委书记胡荣佳整得抬不起头来，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省委决定在他们三人中选一个去高排领导工作。因为他们三人在粤赣工作时间长，情况熟悉一些。谁知，这三人都说没有经验，没打过仗，不愿去。开了几次会都没有结果。

正在这时，毛主席到粤赣省了。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好高兴。毛主席当时住在文武坝，离土地部有两三里路。

我哪里会想到，一天，毛主席一个人走路来看我，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又紧张又高兴。我把毛主席让进屋里，泡了一杯茶给他喝。毛主席进屋后，环视了一下我的住房，问我：“你住的房子朝什么方

向？”

我因刚住不久，又没有注意，一时回答不出，只好说：“靠左手的方向出太阳。”毛主席说：“左手出太阳就是朝南，领导干部要懂得这个常识。”

毛主席坐下之后问我这里的阶级斗争发动得怎么样。我说不普遍，生产热情倒还好。后来就谈到高排的事了。毛主席问我知道不知道那里三次被敌人包围了，豪绅地主跑光了，甚至跟他们沾亲的群众也都跑了。我说知道，我去过那里，现在那里还有部队，就是没有人指挥他们。毛主席说，省委书记告诉我，从三个部长中选一个去，已经开了几次会，没有一个愿去，都说没有经验。我说，平常开会，他们都是长篇大论的。经验从哪里来，是在斗争中得来的嘛。毛主席又问我，你看怎么办？我看得出主席的意思是想让我去，于是我说，让我去，你信任不信任？毛主席连声说，信任！信任！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下次开会你可以报名。

以后又开会时，那三个人还是强调没有经验，我就说：“从娘肚子里出来是不会有经验的，斗争才会有经验。”三个人的眼睛都瞪着我。我说：“省委如果同意的话，我去。”省委很高兴，就决定派我去了。那时，我还兼任了会昌县的县主席，因调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工作，所以会昌县的各个区直接归省政府管。

我离开会昌前的一个晚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工作，毛主席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先谈了高排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如果高排丢了，敌人占领高排后的第一步就是占麻洲。如果敌人占了麻洲，会昌就紧张了，敌人还会马上去占领右水。这样，红军二十二师的后路就会被敌人切断，就会被敌人前后夹攻了（麻洲到中央所在地只有一百来里，到会昌二十里；右水到会昌四十里，是会昌到红军二十二师的必经之路）。会昌要是一丢失的话，省委就危险了，并且又会严重

影响中央。

因为我一直都是搞地方政权建设工作的，对军事和指挥打仗不熟，而会安工作委员会是党、政、军一齐抓，所以毛主席详尽地给我讲了有关的军事知识，具体地教导我应该怎样武装斗争。毛主席说，你去的第一件事，还是调查研究，要调查敌情，敌人有多少，什么部队，是新的还是老的，有什么武器弹药，有多少。还要调查社会情况，群众情绪怎样，有什么谣言，生活怎么样。情况明白了，就要下决心，能不能打，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打仗要对群众负责，群众的命都交给你们了。

毛主席还具体规定我们应该打游击战、伏击战，不要打正规战。毛主席说，在有力量的情况下，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像你们那样的队伍，打游击战最好，能大量伤亡敌人，自己不伤亡，或少伤亡。

毛主席还说，那里敌人的反动气焰很高，要压倒敌人的气焰，提高自己的士气，给群众一个好印象，就要团结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到那里去，困难很多，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不能侵犯群众利益。

毛主席还给我分析了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毛主席说，敌人的长处第一是兵多，武器好；第二有钱，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援；第三是交通工具好；第四是军队训练很正规。敌人的短处是：第一，脱离群众；第二，官兵上下有矛盾；第三，不能吃苦。我们的长处是：第一，有群众支援；第二，指战员上下团结一致；第三，部队能吃苦；第四，晚上特别能战斗；第五，对敌情侦察得比较充分详细。我们的短处是：第一，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不在一起，各根据地都不大，人也不多，只有三百来万，兵源就在这些人中，不可能多动员；第二，我们的财政和经济还有很多困难，敌人的封锁使这些困难加重，医疗条件也差，交通又不便，全靠人力肩挑背扛。最后毛主席一再嘱咐我，

要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要打伏击战、袭击战，要打有胜利把握的仗，没有胜利把握就不打。

毛主席这次来会昌，心情是不愉快的。王明路线在广昌一线，正准备与敌人对垒，搞堡垒战，完全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到南线来，是找红军二十二师的同志开会，他们那里也搞了堡垒。这种堡垒里面有五十多平方米的面积，能住一个排。堡垒的前面插了些树干做障碍，敌人就用大炮轰，飞机炸，一天前进个半里一里的。这种仗，跟以前四次反“围剿”是多么不同啊。运用毛主席的运动战，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歼敌九千，第二次反“围剿”歼敌三万，第三次反“围剿”也是三万，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个三万多。而这次，眼看着中央苏区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小，敌人一天比一天气焰高，谁心里不难过啊。

其实，毛主席这次来粤赣指挥作战，也是王明路线蓄意安排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央根据地已危在旦夕。此时，王明路线已萌发了放弃中央根据地，准备西撤湖南的意图，并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他们知道毛主席肯定会据理力争，所以在会议召开前夕，派毛主席到南线去主持军事，在毛主席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撤离中央根据地的计划。主席来土地部看我时，我曾问他这次来粤赣主要是做什么，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叫我不要多问。后来在长征途中，他才告诉了我上述情况。

我到高排一看，情况确实严重，对面的敌人枪支、弹药都比我们好，也比我们多，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我们这边群众情绪不高，对我们采取应付的办法，连本地干部也是这样，有些动摇的干部还暗中与豪绅有关系，不良分子纷纷反水，杀害我们的干部，把枪和人往民团那边拉。

我们不但缺弹药，而且没钱没粮，生活很困难，连买盐的钱都没

有，几个月来一直都是这样。报告一个接着一个往省里打，省政府也没有粮米，无奈，只好向群众借，借了又没有粮还给人家。地主、富农、商人都逃光了，也筹不到款，于是就割地主的禾。

我一到高排，就按毛主席的指示调查了前三次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发现敌人都是在阴历十五、十六的晚上，有月亮的时候来的，一个月一次，民团在前面带路，广东兵在后面压阵。

我去不久，又是月中了，我们就做准备，机关上山，独立营、游击队、保卫队合起来，在一条很陡的敌人必经之路的两旁埋伏起来，还砍了好多棵大松树，砍去枝，锯成几百斤一段的圆木，用藤条把它们绑在必经之路两旁的树上、陡壁上、山坡上。十五那天的下半夜，敌人果然又来了，月光照得大地通亮，很远就能看见人。他们偷袭了三次，胆子也大了，走起路来耀武扬威的。待敌人走近了，我一声令下，战士们就用快刀同时砍断藤条，大松树一棵棵就势滚下去，只听见敌人队伍中一声声惨叫，走在后面的广东兵吓得不敢前来，架起机枪，朝山上乱扫射。这时，我们听到敌人方面有人向参谋长报告：

“参谋长，团长被压倒倒了。”那个参谋长喊：“混蛋，快派人去把团长拖出来，快去！”接着就是一片混乱的声音。又听见那人在大声叫：

“参谋长，团长已被压死了。”“压死了把尸体带回来，警卫连快去帮忙。”接着就听见从来路的后面跑来不少人。我立即命令：“砍！”

又是一排大松树滚了下去，又听见一片哭爹喊娘的嚎声。敌人的机枪向山上更加猛烈地扫射。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在山坡上挖了很多壕沟，人躲在里面很安全，敌人又不敢上来，但我们也不能从壕沟里出来，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天刚亮时，敌人机枪不响了。我们下去一看，满地都是血迹，枪和尸体都被敌人拖走了，地上丢了很多子弹。我们高兴极了，因为子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缺乏的，士兵每人只有几发子弹。这一次战斗不只是补充了我们极为缺乏的弹药，更重要的

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了一个胜仗，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的信心。这次战斗之后，我们把路修得更陡了，大松树砍得更多了，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

我到高排后的第二个月，由于筠门岭的敌人突不破红二十二师的防线，就把驻在天心的广东正规团也调到那里去了，四个民团也去了，只留下一个正规排和一个民团排。敌人刚走，我们就侦察到了，当天晚上就开会，布置袭击敌人的任务。我说，我们去打个袭击战吧，这样可以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我们的士气，给群众一个好影响，还可以解决物质和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我们晚上九点钟出发，四十里路。天未亮就可以进圩。独立营长同意我的意见，政委说你这是冒险，你知道敌人就不会搞鬼？并问我是哪个大学的。我说，我是苏维埃大学的，校长是毛主席。他问我学什么，我说学政治、土地政策，也学军事。这样磨嘴皮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后我宣布撤掉他的政委职务，由我兼任，就率领队伍出发了。

队伍快接近天心圩时，天已大亮了。那两个排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全逃跑了。结果，我们只在敌人的团部搞到一些不好的枪，一些子弹，在团部军需处搞到几千斤盐，万把斤米。我们还捉了些土豪，罚了几百块钱，对街上的赌摊也罚了几百块钱。除此之外，还搞到了一些布匹和药品。我们组织人挑回高排，一直到太阳下山才挑完。

这下可好了，我们除还了借群众的米外，还剩下不少粮食。更宝贵的是那几千斤盐，当时因为敌人的封锁，苏区的盐很缺乏，价格很高。我们在高排开了个贸易货栈，用盐跟群众交换米、油、豆子、猪、鸡、蛋之类的食品。安远一些群众也千辛万苦地在晚上跑来，卖盐给我们。在白区，盐是一块钱五斤多，他们卖给我们是一块钱两斤半。所以尽管国民党规定卖盐给我们抓到后以通匪论处，但群众不惜杀头也卖给我们。这盐在苏区，一块钱只能买到二三两，四十五斤大米只

能换到一斤盐，双方都很高兴这样的买卖。

在高排的时候，有一次我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份，我刚到高排不久，毛主席第二次来会昌不久的事。

我刚到高排，看到一无粮、二无钱、三无筹款对象、四无子弹，一支枪只有两三发子弹。保卫队最强，也只有十五六排子弹。我们三次派人去省军区要子弹，省军区说问敌人要。向省政府要粮，省政府说在当地筹取。当地都是穷人，哪里有粮食？再说就是有粮食，我们也没钱买。再加上有的干部不听指挥，我想想很难过，就跑回会昌，去向毛主席汇报。天一亮就动身，六十里路下午三四点钟就到了。毛主席看见我很高兴，要我晚上八点钟到他那里去汇报。

晚上八点钟，我到毛主席的住处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仔细听完了我的汇报，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答复。毛主席知道我们那里很困难，给我作了具体指示，也讲了鼓励的话。毛主席也知道省里有困难，没有钱，没有粮，也没有子弹。

讲完后，毛主席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了。随后，毛主席问我：“是谁叫你回来的？”我说：“我自己决定回来的。”毛主席又严肃地问道：“假如那里今天晚上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停了一下后，毛主席耐心地教导我说：“你是那里的主要负责人，省委同意了才能回来；不同意，就不能回来。你有困难我知道，你不会写个报告派人送来给我？还要自己跑回来吗？那里的安危，乃至整个苏区的安危，都集于你一身，责任重大啊！”毛主席的这番话，把我浑身的汗都说出来了。过去，我只知道有困难找上级。这次，毛主席教育了我，才知道一个负责同志没有得到上级同意，是不能离开岗位的。我原打算第二天早上回去的，听毛主席一批评，天没亮我就往回跑，一到高排就写了一份报告，派人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之后，在

上面批了字：过去你不懂得上级批准了才能离开工作岗位，现在你懂了，就好了。

我们在高排的第二次战斗后，完全改变了以前的那种被动状况，情况开始好转了。

边界斗争危险性是非常大的，敌我之间的态势发展也经常发生变化。一个指挥员如果不及时掌握这种态势的变化，不经常深入前方和基层掌握情况，那将和瞎子一样，就会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就会时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我到高排任职的前夕，主席也和我讲过这个问题，并特别提出要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要调查敌我双方的情况。我到高排后的两次胜仗，使群众和部队的情绪又开始高涨起来，特别是随着物质生活上的好转，使群众对我们产生了信赖和信心，他们主动给我们送来各种情报和消息，并在危险关头主动帮助我们。

一次，我带着一个随员（钟桂华）和一个警卫员（朱开铭）到和白区交界的一个村庄去检查工作，这次检查是上次开会时确定的日期，我按时前往。大约离村口还有两三里路远的地方，一个老婆婆赶紧从路边的树丛中迎面走出来，一边向我摆手，一边对我说：“参加同志（当地群众对干部的一种称呼），去不得了，那个自卫队长带着队伍都叛变了，还说要抓你带到那边去。”说完，她抄小路回村了。

我一听这个消息，正准备离开，就看见村子里闹嚷嚷的出来了百把人，我估计是来抓我们的。四周一看，除了路边一个二十几米高的小山坡，没有任何隐藏的地方，周围都是稻田，于是我低声命令赶快上山，迅速爬上那个山坡，伏在一片两尺多高的茅草里。那群人吵吵闹闹的来到土坡靠村子的一头，只听见那个自卫队长说：“不要吵了，朱主任肯定今天会来的，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他来时大家要装得没事一样，等捉住了他再带过去，还可以多得些赏钱呢。”又听到另一个人说：“搞不好还有官做哩。”“不要忘记我们大家哟。”听到他们

这样放肆的议论，我气得快要忍不住了。可是敌人有一百来人，我们只有三支短枪，再加上地形又不好，村庄四周都是开阔地，没有隐蔽的地方，暴露了目标只有死路一条。我向另外两位使了个眼色，让他们稳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下边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有人说：“还是快走吧，等下红军来了不得了。”又有人说：“肯定出了问题，还是早走好。”于是乱哄哄的都吵着要走。只听那个队长说：“等等，你到坡上去看一下，我带人先走，如果他们来了就赶快打招呼。”说完带着人就往回走。我的警卫员慢慢地把枪抽出来，我赶紧使了个眼色，做了个拿刀杀的手势。那个随员从绑腿中抽出了一把匕首。等那个家伙一出现在山坡上，我从侧面扑上去把他按倒了，警卫员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他一声“哟”都没喊完，匕首就插入了他的心脏，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随后，我们从山坡的另一面赶紧下去，利用这个小山和村庄的死角，赶紧撤回去了。这次危险，要不是那位老婆婆主动来报告，并在半路等着我们，搞不好我的命在那一次就丢掉了。可见，军民鱼水之情对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省委组织部长谢炳煌来高排检查工作，我正好到天心一带检查工作去了。谢炳煌在高排等了一天没等到我，第二天就让安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东带他到前线来找我。走到水东，那里有一条河，谢炳煌指着河对岸的房子问：“那是什么地方？”钟东回答：“河对岸是敌人，那是他们住的房子。”谢炳煌一听马上跳起来说：“啊！你怎么带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快带我回去。”

回到高排后，他就一直在等我。我回来后，机要员朱开铭告诉我说谢部长来了，我顾不上休息就赶快去见他。我说：“谢部长来了？”他黑着脸不理我。过了一会他大声训斥道：“你只要前线，不要后方啊！我都来了几天了。”我心里想，没有前线哪来的后方呢？

但又不好顶撞他，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你会来，这里又没有电话，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我知道上面来了人，一般都要开个会，于是我问谢炳煌，要不要开个会，看看什么人来参加，是否工作委员会的人都参加？谢炳煌说：“都来，全部来。”这样，独立营的领导、游击队的负责人、三个区的书记和区主席以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都来了。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我们为了表示对谢炳煌的敬意，还特意买了猪肉、豆腐、豆干等食品，改善了一下伙食。

会一开始，谢炳煌就斥责我：“朱开铨在这里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骄傲起来了，了不起了。”我是主持人，我还没有将他介绍给同志们，他就先声夺人地指责我。但我忍住气，还是和往常一样说：“这是省委组织部长谢炳煌同志，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现在请谢部长作指示。”大家鼓掌欢迎。谢炳煌一开始讲话就指责我，说我只要前线不要后方，他来几天都找不到我，说我目中无人，等等。他讲了一通后，独立营长站起来发言，他说自朱主任到这里来之后，这里变了样，打了两个大胜仗。谢炳煌一听就跳起来说，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营长不做声了。政委（原被我撤职，战斗后又恢复职务）接着说，朱主任很细心，到这里之后先详细地了解情况，第一仗没打枪，用松树从山上滚下去就打败了敌人，缴到不少子弹，第二仗打到敌人团部去了，缴到了枪，还解决了粮食、盐、布等给养，改变了以前那种被动状况。后来，大家纷纷发言，基本上都是与谢唱的反调。高排的区委书记讲，谢部长来了，你很辛苦，我们朱主任到外面检查工作，一般都是哪里有武装力量，哪里斗争激烈，就到哪里去。边界斗争有其特殊性，不经常摸情况，不观察敌人的动静，就会有危险。不要说看见敌人的房子，有时还要看敌人的行动。

谢炳煌听到这里，沉不住气了，用手拍桌子，说我们围攻他。我

打定主意不发言，因为我要是一讲，肯定会火上浇油。后来又有人站起来发言，说我们以前连饭都搞不到吃，朱主任来后，不仅有饭吃，而且还开展了贸易，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改善了，群众更拥护我们了。谢炳煌非常气愤，当天下午就回省委去了。

第二天，省委管武装的一个大队长代表省委来高排，他对我说，谢部长在这里的会议上丢了脸，把省委的名誉都丢光了，这是你造成的，你要作检查。我说，怎么能怪我呢？会是谢部长同意开的，他发脾气，我连声都没有做、更没有发言，能怪我么？随后，我把会议的记录员找来，让他把笔记本给省委来的同志看。他看过之后没说什么，下午就走了。过了一天，省委宣传部长戴元淮来了，也是叫我作检查。我问，检查什么？他说，你把省委的影响搞坏了。我把当时的情况介绍给他听，并把记录本给他看。他也没说什么，下午就走了。又过了一天，省委书记刘晓来了，说我丢了省委的脸，闹得影响不好，谢部长下不了台，让我作检查。我很生气，批评刘晓同志的这种做法不对。我把钟东找来，向刘晓说，是他带谢部长去找我的，情况你问他。钟东说，谢炳煌不能当这个部长，看到敌人的房子都害怕，我们朱主任经常在那样的地方走来走去，是他不对嘛。然后我又把记录给刘晓看。刘晓也没有说什么。临走前，刘晓宣布，中央来了电报，要调朱开铨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我问刘晓同志，我的工作交给谁，他说交给会昌县委书记林辛彬同志。

三天后，林辛彬同志来上任了。我交代了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提出特别是农历的月中十四、十五、十六的下半夜要注意，不能睡觉；另外，敌情要了解清楚，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谁知，我走后一个星期，高排就丢了。好在敌人是试探性进攻，在那里吃了两餐饭后就撤走了。

半个多月以后，我便随红军长征了。

七 踏上长征路

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在粤赣省的会安工作委员会接到命令，让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我把工作移交给前来接替我的会昌县委书记林辛彬同志，随后便到省委报到。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又留我搞了半个月的动员工作，等工作结束后，我才到中央去报到。那时的战局已经很紧张了，敌人的飞机还经常往瑞金城丢炸弹。这时的瑞金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主席是杨世珠同志。

我刚走进中央机关，防空警报就响了。在防空洞里，我无意间站在博古的身边。他戴着眼镜，粗声粗气地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从粤赣省来的，他就不做声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中央机关。第二天，组织部的同志便送我到中央党校。当时党校的人很少，比我先去的还有两位同志，一个是从部队来的，叫朱明；另一个是女同志，叫邓六金。我问朱明：“我们不是来学习的吧？”朱明说：“不是，看情形是把我们分到红军中去。”不久，中央总动员部部长亚金（金维映）请我们去吃饭。这时，我才发现机关已经很紧张了，箱子、木制家具等都送给了老百姓。文件、书籍一担一担地烧，跟烧纸钱一样，走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在烧，一看就知道将有一次大行动。总动员部在云石山旁边几里路的梅坑，

王首道副部长给了我一顶帽子，一本书，说是奖励我在粤赣的动员工作做得好。

又过了两天，组织部通知我去一下。当时的组织部长是罗迈（李维汉），他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红军中去工作，到部队后，你的警卫员和马都要取消，具体工作是中革军委第五局任特派员。我说好。过了两天，组织部有个同志来问我还缺什么。我说过几天粤赣的行李就送来了，他们说，行李可能收不到了，部队明天就要出发了。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就给了我两双草鞋，一把纸伞，两套单衣，一个挎包，一块包袱布。由于粤赣的行李没有到，我让中央机关的收发代收一下，算是送给他。他给了我一块银元，一块油布，一套衣服。就这么些东西，我踏上了长征的漫长道路。后来我才知道，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和红军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当时的长征是秘密和仓促的，故通知我的时候说是到中央党校去学习。

这天下午，我到第五局报到，见到局长宋裕和和总兵部部长杨立三同志正坐在一起吃饭，见我进来后也没说什么。由于我对这里的工作心中无数，第二天我便找到罗迈。我问他，我到第五局做什么工作啊？罗迈说，你是中央工作团的干事，第五局的特派员到那里后，第一，监督执行政策；第二，打土豪收集资财，供应红军；第三，做群众工作。明确了我的工作职责之后，我回到了第五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晚，我们便和中央直属机关一起，离开了瑞金云石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走了四十里路到麻地，天亮了，不能走了。那时红军都是白天宿营，晚上行军，为的是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和轰炸。

十六日晚我们到了于都的古田，这里离于都城二十里。那时快到重阳节了，老百姓都在炸米果，部队奉命在那里停留两三天。我听说

毛主席在于都城里，十八日下午，我向宋裕和同志请了假，便到于都县城去了。

毛主席看到我来了，便说：“你来了？”我说是。毛主席说：“今天晚上要过于都河，吃了晚饭就走。”（还有一种说法，把十月十八日过于都河算是长征的开始。）我说，那我到河边去看看。主席说，还在搭浮桥呢。我到河边一看，桥已经基本上搭好了。我就走上桥去看，浮桥是将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我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都不会响，扎得蛮结实。

看完桥后，我又回到毛主席那里。我对毛主席说，桥搭得蛮结实。毛主席说，这里的工会很负责。我问毛主席的身体好不好，主席说还好。接着毛主席问我在会昌斗争了几个月有什么经验，我就把高排会安工作委员会两次作战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非常仔细，听完之后笑着说，你指挥的这两次战斗，第一次的作战方法古代就有，用礮石滚木打敌人嘛，你运用得很好。第二次战斗也很好，情况摸得清楚，决心也大，解决了不少困难。看来你还是善于动脑筋的。毛主席又问，你们以后吃饭的钱呢？我又把开贸易货栈的事说了。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那么困难还能搞成这样，搞得相当好。毛主席还关切地问，以后被敌人围攻过吗？我说没有了，我们还收复了两个乡，几个月没有开小差的，没有重大伤亡，连我在内只有三个带轻伤的，侦察工作也比较严密。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好，什么都要有胜利信心，不怕困难，迎击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你走的时候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就放心。当时那里是粤赣的一个门户，也是苏区的门户，坚持斗争很要紧。我问毛主席，红军这是要到哪里去？做什么？毛主席说，你就别问了，就跟我们走吧。我说好。毛主席又问我，给你工作了没有？我说分在军委第五局，归宋裕和领导。毛主席问我，要你做什么？我说，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收集资财。毛主席说，这个

工作很重要，将来红军要扩大，你们要打土豪，宣传鼓动群众，积极筹粮筹款。你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经验，这个工作是很吃苦的。我说，请毛主席放心。

那天下午，我在主席那里坐了几个小时。晚上吃完晚饭，大约七八点钟，我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起过了浮桥。

队伍一列一列地过了于都河。毛主席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过了桥。两个警卫员提着马灯给他照路，我有个手电筒。在桥两头站岗的红军战士看见毛主席走近了，都敬礼致意。

我原来认为此行是一般的军事行动，还会回来的，那时，王明路线提出了个口号，叫做“反攻”，说是敌人打到我们家来，我们就要打到敌人家去。出了苏区，以后越走越远了，这才知道是长征了。

过了于都河才走了四十里路，天就快要亮了，队伍停在于都的新田，在这里住了几天，等红军主力到前面打开一条通道以后我们再走。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要走还忙着打仗，还抬着机器等笨重的东西，走也走不快。毛主席看见我，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我要主席骑马，主席说走走好。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设在信丰古陂的第一道封锁线。这里已经是苏区的外面了。过古陂街时，前面的部队把盐堆在路边，我装了一杯子，毛主席看见了，笑着说，现在有盐吃了。

过古陂后，我们又经过了安远的板石，这个地方我任会安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

十月二十七日，红军又突破大余河（又称章水），我们紧跟着开路的红军过了河。群众都站在路的两旁，默默地看着我们行军。

十一月三日，我们在湘、粤、赣边境的汝城和城口一带，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带群众的生活非常苦，再说前边经过了大部队，留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我们的伙食都非常差。那段日

子，夜行昼宿，但行军速度非常慢。听说撤离苏区的时候连机器等东西都带上了，像是大搬家一样，怎么能走得快呢？中央机关的队伍行军，总是博古带着警卫员走在前面，毛主席在他们后面。毛主席每次见到我，总要先问我累不累。那时，我们也无法做群众工作，只是跟着队伍前进。

十一月十五日，我们通过宜章进入了湖南。宜章有七八十万人口，县城就有几万人，是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亦称为粤汉铁路封锁线，守军是湖南军阀的兵。过宜章后，我患了疟疾，每天天一黑就打摆子，半夜就发高烧，一直烧到天亮。有一天晚上，我发烧烧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地上睡下了。不久，毛主席路过这里，听到我在草堆里的呻吟声，就问：“这是谁？”我说：“是我。”毛主席听出了我的声音：“是朱开铨同志吗？”我说：“是。”毛主席问我：“你得了什么病？”我说：“打摆子。”毛主席说：“这里不能睡，再苦一点也要跟上。”然后，就派人到第五局给我要来一副担架把我抬上。接着毛主席又问我：“每天什么时候开始打摆子？”我说：“天黑的时候。”毛主席说：“好，明天开始发作前给你打针。”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让傅连璋同志给我看病，接着又派了他的卫生员钟光同志来给我打针。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连打了四天针，这才算是好了，以后又给我吃药。

这以后有十多天，毛主席一看见我，就问我怎么样了。我说，好了，不要紧，能走路了。虽然那时我很瘦，身体很弱，但我心里想，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上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那场摆子是要送命的。

进入湖南后，红军连克临武、嘉禾、兰山、江华等县。我们在兰山住了几天。这个县在全湖南算是生活比较差的县，我们五局跟那里的群众（商会）商量好了，部队在这里先用苏区通币付款，然后卖主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兑换银元，他们都同意了，商人也都纷纷拿出东西

来卖了。由于部队纪律严明，不拉夫，不抓丁，不调戏妇女，公买公卖，所以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县里的群众和商人看见毛主席都很高兴，他们都知道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这里的群众懂得红军的政策，没受反动派的骗，没有跑，做买卖的还是做买卖，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在兰山，我们还以中革军委五局的名义贴出了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政策，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完整、自由、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很多群众都围在那里看。还贴了很多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建立自由、独立、完整的新中国”等等。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过了潇水。潇水是湘江的上游，过了潇水之后，红军就向湘江前进。

由于红军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急忙重新布防，调了四十万兵马组成三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路是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及部分湖南军阀的部队，组成一个纵队，担任中路，负责在红军后面追击。又由湖南军阀何键驻兵零陵、东安、全县等处，沿湘江一线布防，不让红军过湘江。一路为白崇禧的部队，布防在灌阳、兴安一线。几路合击，妄图在湘江一带将红军消灭。

自从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采取退却。“左”倾机会主义将反“围剿”中的堡垒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甬道式的方法，把中央机关放在中间，四周都是红军部队掩护，仓促转移。过湘江时，也是如此。

决战前夕，李宗仁、白崇禧怕红军进入他的老巢，怕红军打桂林，所以又自动撤离了兴安、灌阳这条防线，把防线南移至富川、恭城、贺县一带。

红军到达湘江之后，八军团负责搭浮桥，其他军团则与敌人在广西全县以南的湘江东岸激战了一个星期。

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险的。我虽和中央机关在一起，但这种危机感很强。我只听见敌人的重机枪声一天比一天近，但又不知现在的情况如何，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突然大声喊道：“主席！”毛主席对我的思想波动有所察觉，他说：“怎么？你有思想问题？”“有。前几天，我听到敌人的重机枪声还离得很远，现在已离得很近了。”说到这我说不下去了，就停了下来。我的意思很明白，自从离开苏区以后，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敌人的力量非常大，又有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如果我们仍这样死打硬拼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主席说：“是的，我们要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去，打几个胜仗，让部队休整一下。”

湘江是突破了，但红军也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一个星期之内损失了几万人，这在红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就对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越来越不满。到了湘江战役，这种心情达到了顶点。毛主席那段时期心里也非常难过。

过湘江的时候，我是和毛主席一起走的，也是晚上过的浮桥。桥是用好几层竹子搭起的，用棕绳、竹皮绳和皮绳绑得很结实。桥有一米多宽，警卫员提着马灯照路。看得出来，毛主席正在想事情。平常的时候，毛主席总是边走边讲话，那时一句话也没说。大家都低着头，看着桥下的流水过了桥。

因为夺去了毛主席军事上的指挥权，所以湘江激战时，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离战场有十多里路。那里仍然听得见枪炮声。毛主席非常关心战场的情况，经常向从战场上下来的同志了解情况。

过了湘江后，毛主席见了部队的负责干部就主动找他们谈话，做工作，不管是哪个军团的，都找他们谈。毛主席还经常和王稼祥、张

闻天同志在一起商量，分析目前的形势，研究以后红军的出路。

十二月上旬，红军攻占了湖南边境通道城。中革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了会议，毛主席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左”倾机会主义提出红军在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打回江西去。毛主席极力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主席问他们，会合以后又怎么办？毛主席主张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毛主席的英明主张最后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拥护。

这时，蒋介石为了防止我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又调来了各路重兵，前堵后追。若不放弃原计划，势必与五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决战。长征以来，“左”倾机会主义采取的是逃跑主义的办法，处处极端被动，硬拼硬打，夺路突围，损失很大，战斗力空前减弱，又得不到休整，要是再去跟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敌人正面硬顶，和他们打硬仗，那是很危险的。

过了通道城，红军进入了广西。尽管伤亡很大，但战士们还是非常乐观的。红军当时有首歌，其中有句词是：“红军真正确，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湘江是敌人临时的设防，贵州就没设防，所以我们的行动也顺利多了。

不久，我们就到了老山界。

老山界上山四十里，下山四十里，一共八十里。那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饭就上山了，因为我们当天必须翻过这座山。山上路倒是有，不过时而平缓些，时而艰险些，有时还有几级石阶，山上长满了绿树和翠竹。我一直在毛主席身后走着，我们红星纵队后面是红章纵队，他们有几百副担子，主要是银行等机关。这些包袱，影响了红军前进的速度。后来到了遵义，红军进行了整编，取消了红章的番号，进行了精简。

过最险的一段山路时，队伍的速度就更慢了。毛主席的担架员为

了主席的安全，让主席坐担架，主席不坐，于是便拿出担架的两根棍子，两个担架员一前一后，一人抓住两头，让毛主席站在棍子中间，两边用手扶住棍子走，这样就安全些了。

走了个把小时后，我就累得出汗了，衣服扣子也解开来了。我看着主席还没穿棉衣，单军装里面只有一件夹衣，戴着帽子，只是微微地喘着气。毛主席很瘦，但精神愉快多了。快到山顶时，毛主席停住了脚步，朝四处看了一下，便坐下来休息了，部队也都停下来休息了。

我们坐的地方是块微微倾斜的空地，散着一些大石头。毛主席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着烟，看上去心情愉快多了。这时，不远处有敌人的两架飞机，正沿着山下的一条大沟飞过来，飞得还没有我们坐的地方高。山上树这么多，敌人能看见什么呢？毛主席抽着烟，扭头先看了会下方敌人的飞机，然后回过头笑着对我说：“我们要打几个胜仗了。”主席虽然是用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但给我的感觉几乎是语落石崩。我看得出主席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几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主席这么愉快，毛主席的话更增添了我们胜利的信心。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红军一直都是被动的。如今，毛主席说我们要打胜仗了。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讲出的这番话，不能不使我感到振奋。毛主席还说，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了。我告诉毛主席，红军战士都要求打胜仗，都需要好好休整一下。主席说，是的，这是指战员们的迫切要求。我又提到了过湘江时打了那么多的仗，还是那么被动。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要开展新的局面，要创造大好形势，我听了非常激动。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胜利就是我们的。

过了老山界，不远便是贵州境地了。从这里到遵义还要过几个县。通道城会议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毛主席实际上已经开始领导红军了。

十二月十四日，红军进入贵州后的第一个县城——黎平县。中央

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接受了毛主席的英明主张，决定继续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省前进。毛主席也出席了这个会。部队在黎平进行了小规模整编，中革军委五局改编为中革军委四局还开了一个干部“同乐茶话会”，大约一百多人参加。座谈会还备有冰糖、姜糖和糕点。朱总司令参加了茶话会并讲了话，他讲话的中心意思大致是，红军已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我们要西进，要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去。

离开黎平以后，红军继续行进在贵州境内，并先后攻下了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

到剑河以后，我接到了命令，调我到红章纵队。红章主要是中央和红军的后勤部队，以及中央苏区的银行，四五百名挑夫挑着几百担银元，还有其他辎重。当时红章纵队的司令员是罗迈同志，政委是毛泽民同志，参谋长是刘晓同志，政治部主任是王首道同志，宣传部长是陆定一同志，地方工作部长是蔡畅同志。我就分在地方工作部，在那里工作的还有罗梓铭同志、谢维俊同志。红章纵队的管理员是原中央政府的总务厅长袁福清同志。这些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都认识，有的还非常熟悉。

罗迈同志见到我非常高兴，说，你来就好了，我们现在伙食非常差，你来后就有办法了。袁福清同志一见到我也非常高兴，说，你来了就好了。我问他好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很苦，吃得又不好，挑夫跑了一些，银元也丢了很多，这样下去不行。

我去以后，领导把整顿挑夫和改善伙食的任务交给了我。为了搞清楚情况，我下到几个连队作了一番调查，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伙食不好，而挑夫的体力消耗又很大，身体吃不消；二是担子太重，每副担子连同行李八九十斤，挑着这样重的东西行军，翻山越岭，的确非常难；三是从苏区出发时，征用的挑夫大多是当地的富农，并

与他们讲好征用三个月，但现在又超过了三个月，这些人思想不稳定。摸清情况之后，我便采取措施：一、改善伙食，争取每人每天有肉吃，增加体力。毛泽民同志当时不同意，他说，你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用钱这样大方？我说，红军的钱红军用，现在又打不到土豪，筹不到款，买肉吃一是恢复体力，二是减轻挑夫的困难，有什么不好？后来，大家都同意了我的这条措施。二、清理担子，每担由原来的八九十斤减少到六十斤左右，使挑夫的负担符合行军的要求。三、清理挑夫，把那不愿意留下的、身体不好的都辞掉，另外用钱请一些短期挑夫。由于我们的价钱公道，所以请挑夫的事也解决了。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的伙食大为改善，担子也轻了很多，从领导到群众都非常高兴，就连罗迈那样严肃的人都笑着夸我：“朱开铨同志很会办事。”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在瓮安的猴场召开了会议，毛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桐梓的作战计划。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我们顺利渡过乌江。

我记得我们行军到乌江南岸离江边只有一里来路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妇女在那里哭，我走过去一看，才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小煤矿，因为发生了塌方，矿工都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连挖都挖不出来。开矿的矿主又不管工人的死活，连抚恤费都不给那些家属一点。我们由于要执行抢渡乌江的任务，只好每个家属给了几块银元。她们都对我们非常感谢，说我们是天下最好的军队。这件事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乌江称之为天险是毫不夸张的。这里水非常深，水流也很急。一月一日的白天，我红军先遣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渡口进行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后在上游偷渡未成。晚上，我们扎了三只双层竹筏进行偷渡，终因天黑水急，第一只竹筏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们顺利渡过乌江，并在敌人眼皮底下埋伏起来），第二、三只竹筏只好半途而回。

一月二日，我军接到情报，尾追我们的薛岳部队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下决心强渡。强渡部队在昨夜已偷渡过江的同志的掩护下，迅速占领了渡口，并在我红军炮兵仅四发炮弹的火力支援下，打垮了敌人的疯狂反扑，牢牢占领了滩头阵地。红军工兵营迅速架好了浮桥，仅两天时间，我红军全部人马便通过了乌江，并烧毁了浮桥，使追敌薛岳部队只能望江兴叹。

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影响非常大。当时就流传这样一首歌：红军将士喜洋洋，打进贵州过乌江；连战黔北数十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八 遵义革命委员会

渡过乌江后，我于一月九日随红章纵队进入遵义城。遵义是一月七日被我军占领的。这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进遵义后，我的印象是街道宽阔，商店林立，人口密集，商品丰富。黄澄澄的橘子，金灿灿的蛋糕，以及烟、酒、猪肉等，街上都有卖。我们长期在山区行军打仗，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一直在黔北的大山里走，一进城市，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这里的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进城的时候，许多群众站在街道两旁举着小旗欢迎我们。这种热烈的场面，自长征以来是没有遇到过的。

进遵义后，毛主席住在老城，我住在新城。十日早晨，我去老城看望毛主席。主席看见我来心里很高兴，问了我到红章后的工作情况，然后对我说：“我们要建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并以此为根据地，把影响造出去，赤化整个云、贵、川。”

当天，由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参加者基本上都是军队的干部。李富春同志说，遵义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运动，群众基础薄弱，工作比较难做，大家要深入群众，做好政治工作。同时也讲了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最后还说了我们要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遵义

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还要在会上讲话，等等。

在这个会议上，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我们七个红军干部作为参加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但我们这七个同志每人都接到了通知，同时也事先知道，有一名地方的同志要作为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会议，他就是第二天会议上任命的任移同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在一个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我们七个参加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主席台是用木板搭成的，主席讲话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我们这些人只有凳子，没有桌子。主席台上头横竹竿上贴着的标语是：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还在四周贴了一些小条条标语。会议是等毛主席到会后才开始的。当时到会的有几千群众。在主席台前面坐的都是红军，后面都是群众。大会由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主持。毛主席一到会场，大家就热烈鼓起掌来，待毛主席一登上主席台，就宣布大会开始。会上，毛主席讲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话，他痛斥了蒋介石阻截红军抗日救国的无耻行径，讲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等等，很激动人心。毛主席讲过话之后，由总政治部的同志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宣读了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念到一个，我们就站起来一个。这七个委员的是：罗梓铭、丁伯霖、周兴、朱开铨、毛泽民、任移、陈云州。

吃过午饭后，县革命委员会的七名委员由罗梓铭召集，开了一个会，讨论了委员会的任务和委员的分工。由于我们几个军队代表对遵义的情况不够熟悉，因此许多问题都要向任移同志了解，甚至要些什么委员、干事，也要任移同志提供。当时的委员、干事都没有薪水，只管伙食，另外每人仅发一块钱的鞋袜费。经过研究，我们七个人是这样分工的：

罗梓铭同志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主持全面工作；

丁伯霖同志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兴同志任人民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开铨同志任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
毛泽民同志任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移同志任文化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云州同志任劳动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

每个委员会少则三人，多则九人，超过的就不能叫委员了，而是称干事。当时的“土地”、“文化”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数量最多，他们执行着宣传和打地主土豪分粮食的任务。

当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有特殊意义的，它除了作为地方红色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保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全，保证中央开好会。

我们这六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人民武装委员会要保证有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丁伯霖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他手中有六十多支短枪，一个排的长枪，在遵义会议期间，安排了必要的岗哨，在遵义街上巡逻，对付隐藏和公开的敌人。因此，当时的秩序搞得挺好，一切都井然有序，也不拥挤，跟中央苏区的秩序差不多。

周兴同志负责的人民肃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侦察潜伏的反革命。后来因为抓了军阀王家烈派到遵义潜伏在商人中的几个反革命分子，其余的反革命就闻风而逃了。直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四十多人全部撤出为止的十天间，遵义城没有发生过任何反革命的暴乱事件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

由我负责的土地人民委员会，有十几个成员。除了个别的是农民外，其余的大都是学生，其中还有一位女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

证驻遵义的机关、部队以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尽量好的给养。当时，我们搞到了不少的猪、鸡、蛋之类的食品。同时，我们还要打土豪，查收国民党官僚的资本，给群众散发粮食和物品。我们在遵义就没收了国民党三四个粮仓的谷子，也不是发，基本上是让群众自己去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打土豪分财物我们都在晚上八九点钟进行，有的群众都是来自十几里之外，他们分到财物后就自己挑回去。

毛泽民同志负责的财政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大量筹款，收集物质，搞公买公卖。当时遵义是国民党的行署，管辖十来个县，我们的财源大都是来自查收反革命及国民党官僚的财产，以及查收到的一大批烟土。供给是长征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毛泽民同志的工作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

由任移同志负责的文化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宣传红军有严明的纪律，公买公卖，不拉夫抓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当时，这个委员会显得最为活跃。那时候任移同志只有二十几岁，中等身材，稍胖，穿得还算讲究，话说得很利索，很直爽、泼辣。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没有下过乡，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天天见面，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也记得最牢。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发动了很多学生，出了很多力，影响也很大。后来，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里，就有四十多个学生参加了红军，跟红军北上了。

由陈云州同志负责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做工人运动工作。

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邓云山同志，是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有三四天后的某天上午，由陈云州同志介绍来的。那天，陈云州同志到罗梓铭那里，介绍了邓云山的情况，并推荐邓云山同志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罗梓铭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但我补充说，八个

委员不好，最好再增设一个委员，搞一个办公室主任，红色政权的委员都是逢单的。同时，我还说，开一个全体委员会通过一下，报中央批准为好。当时因时间关系，会没开成，但后来人们都称他为副主席。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所创造、积累的有关建党、建政经验的恢复和发扬。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了保障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不是一般群众一哄而上所能奏效的，这是红军最高统帅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事前做了安排的一次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的建政活动。

一月十七日遵义会议结束，一月十九日中央比我们提前两天离开遵义。走前，毛主席曾派人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通知我们后天撤离，并说中央向桐梓方向前进，要我们跟上中央机关。但由于懒板凳方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掩护的三军团的同志提前到了遵义，我们问清情况之后，立即打点行李提前一天离开遵义。事实上。遵义红色政权差不多只维持到元月二十日。过三四天后，我们在行军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批示：遵义革命委员会暂告一段落。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从而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遵义会议伟大胜利的深远影响，也是和遵义人民以及当时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出色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分不开的。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部队损失很大，在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按照中央的决定，在遵义进行了一次整编。红军开始

长征时号称十万实有八万多兵力，到遵义后只剩下了三万多人，所以，整编势在必行，并在整编期间休整了十天，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整编期间，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宣传和鼓动工作，动员了一部分贫苦群众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扩大了红军。

遵义会议使全军振奋，从此，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改变了以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迂回曲折，来往穿插于敌人围追堵截的部队之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九 转战川、滇、黔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往桐梓、松坎到土城。由于敌人尾追我军，在土城毛主席主持了中央会议，决定以运动战消灭刘湘匪军教导师的三个旅。毛主席亲自指挥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从土城带领中央红军向赤水北进，经过一天的激战，打败了敌军的阻击，胜利渡过了赤水河。

我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从遵义撤出时比中央机关晚了两天，已跟不上中央机关了。为此，我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便和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一起长征。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北上，行军在川、滇、黔边区，所向无敌，同时继续扩军、筹款和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声威大震。当我们占领了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后，蒋介石为了阻击我军北渡长江，急忙调动川、滇、黔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沿江筑防。毛主席果断率领中央红军再渡赤水，东进娄山关，于二月二十七日重占遵义，牵制敌军，打垮了敌薛岳、吴奇伟、王家烈的近二十个团，并消灭了薛岳、吴奇伟的两个师。这一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仗。

重占遵义后，敌人的中央军和地方军迅速集结，从东、南、西、

北四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实施包围，企图把我们消灭于此地。我们只休息了两天，便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攻打遵义之西鲁班场的守敌，并打算从这里冲出敌人的包围。鲁班场守敌是薛岳部的“老虎团”，这是敌人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他们占据有利地形修建了牢固的工事。我红三军团集结优势兵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实行局部小包围，将“老虎团”包围起来，双方在此地激战了一天，最终我们消灭了“老虎团”，歼敌两千余人，但我们也损失了两三百人，在鲁班场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和薛岳的反动气焰。

歼灭“老虎团”的时候，我虽在后方，但听见枪声如此激烈，也坐不住了，就跑到前线去了。担任主攻的十二团政委苏振华见到我就说：“你到前沿来干什么？我们要指挥战斗，不来是不行的。你赶快回去，准备点好的饭菜。”我看确实也插不上手，就赶快回来准备饭菜了。

那时，我已从三军团地方工作部调到十二团地方工作组担任主任。十二团地方工作组的主任以前是李华楷同志，李华楷调三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后由杨庆伟接任，杨庆伟后来又调军团的地方工作部，我便接任了这个职务。还是红军到云南扎西的时候，正好是刘少奇同志担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天他碰到我，说：“喂，开铨同志，你也来了？”我与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认识，于是我说：“来了，我是带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二十多位同志来的。”他说：“好，本地人来好，你要认真负责，把他们这些年轻人带好。”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我谈话，说三军团现在已没有师的建制了，地方工作部目前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准备调我到十二团地方工作组去。那时由于形势需要，三军团把师建制取消了，整编为四个团。我当时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少奇同志又说：“到十二团后，要把团里的供给工作搞好。

现在很困难，要使部队有战斗力，一定要让战士们吃好，休息好。”就这样，我从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调到了十二团地方工作组担任主任。十二团是三军团的模范团，以善打硬仗而著称。团长谢嵩，政委是苏振华（以前为钟赤兵）。鲁班场的战斗，十二团是主力。

三月十八日，中央红军又转攻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敌人认为我们要渡江北上，赶忙调兵堵截，结果敌人虚惊一场。毛主席用兵如神，率部由川南折回贵州。三月二十一日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这样，我们已把敌人远远甩开。毛主席以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的方法，大大调动着敌人，使红军主力选择了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向南进逼乌江。

三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毛主席亲率中央红军主力从枫香霸强渡乌江，向贵阳挺进，佯攻贵阳。另一支小部队佯作东进湖南姿态。蒋介石见我军去而复来，以为我们要在贵州建立根据地，重与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兵遣将，并亲自坐镇贵阳督战。谁知，这乃是毛主席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战术，主要目的是将滇军从云南调出来。蒋介石就像是毛主席手中下棋子，想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竟乖乖地听从调遣。中央红军在贵阳附近虚晃一枪，乘虚疾进，直插云南，向西南挺进，并一举攻克定番（惠水）、长顺（长寨）、广顺和紫云等县。

这期间，我们地方工作组忙于行军打仗，群众工作做得较少。在川南的天潭霸，我看见部队停下来了，便和地方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外出打土豪。走不多远迎面碰到了彭德怀同志，彭总那时任三军团司令员。平时听别人讲彭总对人要求严格，非常严肃。彭总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是哪里的？”我回答：“十二团地方工作组的。”彭总说：“你们不要往前面走了，前面要打仗了。以后，你们要跟着我们走，不要走到我们前面去，那样有危险。”我敬了个礼，赶忙离开了那里。我

想：彭总对人很关心，态度也很亲切嘛。不久，我们在那里把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打败了。后来到贵州的班水，我正好到军团部去办事，又碰上了彭德怀同志。他一见我就说：“是你呀。你是哪里人？”我说：“瑞金人。”彭总问：“你原来在苏区的哪个部门工作？”我说：“原来在中央机关，后来到会昌的会安工作委员会工作。”彭总说：“噢，那个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只读过两年私塾。”彭总又问：“那你有什么专长？”我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会调查研究，懂得阶级分析。比如什么人是地主、富农、贫农、中农、雇农、工人，等等。”彭总说：“那好哇。我们许多同志都不懂这。你是跟谁学的？”我说：“跟毛主席，我给他当过巡视员。”彭总一听，说：“噢，是这样。来，坐下来谈。”这时，军团的供给部长端着一只煮好的鸡请彭总吃。我想告辞，彭总说：“坐，还没有谈完嘛。”接着，他非常严肃地对供给部长讲：“别说一只鸡，两只鸡我都能吃。如果我吃，那师长怎么办？团长怎么办？鸡你端到医院去，送给最重的伤病员吃。”后来我们又谈了很久。临行前，彭总对我说：“以后经常来，如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回去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前我们打土豪，如果东西少不够分配时，就都自己吃了。从彭总不吃鸡的这件事上，我明白了在物质缺乏时，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四月十七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一军团、三军团兵分两路，佯攻昆明。蒋介石又急忙赶到昆明督战，云南军阀龙云部队一片混乱。谁知我们却在昆明附近折向西北，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交界的深山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非常险要。五月八日，红军兵分三路，一军团在龙街，三军团在洪门渡，干部团在皎平渡同时发动强攻。当时因为龙街和洪门渡强攻未成，而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成功，于是，红军立即全部集结于皎平

渡，利用仅有的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部队除九军团外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九军团因追敌已到，只好沿金沙江向上游走。因罗炳辉同志是云南人，地形较熟，所以一直将部队带到上游的浅滩处涉水过江，后与我们汇合。从此，我军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过完金沙江后不久，我们便爬上了一座大山。这是个光秃秃的石头山。那时天气很热，水源离路又很远。这里的一些当地人用桶背来水，摆在路边卖。有的战士口渴得不行，花一块钱买一碗水喝。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的老板是谁？”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干人（即穷人）。”我问：“你们一共有几个人？”他们说八个。我说：“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路过这里是北上抗日打日本鬼子的。你们每人去背一桶水来，每桶水我给你们一块银元好不好？”这些人听我一说，马上就go背水了。水背来就放在路边，行军的红军都可以喝。

五月十一日，红军到达会理，在这里休息了五天，然后继续北上。五月二十一日到达冕宁，途经西昌、泸沽等地，并准备通过彝族地区。由于红军部队严格执行了毛主席制订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在我们到彝族区后，因为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欺骗、污辱及压迫，使得少数民族对汉人，特别是汉人的军队恨之入骨。我们刚到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躲到山上去了，并放冷枪打我们，使得部队有了一些伤亡。特别严重的是，他们把水源也破坏了，使我们的干部战士没有水喝，我们出去找水的战士则大多数被他们杀害了。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同志都要求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和他们的头人谈判，并与他们歃血为盟。我听说刘伯承同志在结盟时这样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与小叶丹结兄弟。”结盟后，我们还

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弹药。我们的行动和诚意感动了他们，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因此，头人传下令来，为红军放开一条北上抗日的道路。

通过了彝族区以后，五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安顺场这个地方名气很大，传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我到这里后，碰到一位胡子很长的老头，我问他，太平天国的时候你在这里吗？他说在。我又问，太平天国是怎样失败的，你知道吗？他说，原因不清楚，但有一点，和对面山上的少数民族关系没有搞好。我想，由于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深得少数民族的欢迎，我们一定不会像石达开那样失败的。

这里两旁全是高山，大渡河水汹涌澎湃，漩涡卷着泡沫，雷鸣般地一泻千里，站在岸边看了都令人心悸。在这样的山沟里，部队根本无回旋的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

在军情方面，蒋介石已命令薛岳、吴奇伟三个纵队日夜兼程追赶我军，同时命令刘湘、刘文辉、杨森等部队加强沿河防御，并将沿河的交通设施逐一破坏。在安顺场，我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的十七勇士，利用仅有的一只小船强渡成功，打开了第一条通道。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又宽，不能搭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用几十分钟。红军几万人马如靠这几只小船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此时传来消息，沿河两岸的敌人追兵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眼下要迅速渡过大渡河，看来非得火速夺取泸定桥，要不然，红军就有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师在安顺场渡河以后，作为右路军迅速沿河向泸定桥进军，策应我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渡河。另一方面，我红二师四团作为左路军的先锋团，在两天内强行军二百多里路，克服了重重困难，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桥面有五根碗口粗的铁链，铺上木板后便可行人，两边各有两根铁链作为扶手。我们趁敌人尚未完全破坏铁索桥，以红军勇士二十二人手攀铁索，冲过了泸定桥，并经过殊死的搏斗后占领了桥头阵地，以后便和赶来的右路军红一师会合，牢牢地控制了阵地。第四天，也就是五月三十日，我中央机关和红军的千军万马便全部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

十 过雪山草地

过了大渡河后，我们又相继占领了化留坪、天全、芦山和宝兴，于六月十四日到达夹金山。

在我们到达芦山县的时候，出了一件事。三军团地方工作部一个叫杨庆伟（瑞金黄柏人）的干部，带着八支驳壳枪逃跑了。这件事震动很大，三军团保卫局为此立案侦查。杨庆伟原来是十二团地方工作组的主任，为人很油滑，喜欢耍小聪明，搞吃吃喝喝那一套。他调地方工作部后，我接替了他原来的职务。由于我也是瑞金人，为此也成了怀疑对象，几次被叫去问情况。我说，我一直都是尽自己的力量在工作，从没搞过什么名堂。杨庆伟虽是瑞金人，是我的同乡，但我不惯他的那一套，从来和他没有过多的交往，他逃跑的事我更不知情。由于我是在遵义会议后才到三军团的，他们对我的历史不清楚，让我找证明人。我说，毛主席可以证明。他们问，除了毛主席就没人可以证明嘛？我说，能证明的人多得很，但只有毛主席最清楚。三军团保卫局的张局长也传讯过我，询问我和杨庆伟有什么关系。我批评张局长这种做法，我说，对一个人，要在他还没有出事的时候就看出来，就加以防范，出了事后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那怎么行。瑞金出来参加革命的同志，没有一万也有八九千，你都去怀疑吗？后来，彭总和

杨尚昆同志指示这件事不要再查了，这才作罢。全国解放后我回江西才知道，杨庆伟跑回了瑞金并当了特务，我们回来后听说他逃到山上去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夹金山是一座大山，位于懋功之南，山上终年积雪不化。在强渡大渡河的前后，天气非常热，但一到夹金山，我只觉得寒气逼人，由此可以想象山上的温度是多么低。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们便登上了夹金山。上山的时候天下着雨，我们感觉非常冷。当快要到山顶时，我们又累又饿，而这时山上却下起了雨夹雪。

当时我们穿的全是夏装，不能在山上休息，必须在一天之内翻过这座大雪山，否则，将有被冻死的危险。我们循着采药人和马粪的痕迹，非常艰难地往前走着，稍有不慎，不是从山上滚下去，便是落到一个什么沟缝里去。我则边走边吃干粮，因为体内的消耗得不到补充，那将很可能倒下去而起不来了。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不少人都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艰难地跋涉着。大家互相搀扶着，几乎是拼着全身的力气，同残酷的大自然搏斗。当天傍晚时分，我们顺利地翻过了夹金山，来到了大维。在大维休息一天后，来到了懋功。

在懋功，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于六月十八日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决定集中力量继续北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陕北苏区根据地。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会后继续北进，大约是六月二十七点左右，我们开始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

白雪皑皑的梦笔山似乎比夹金山还要高，由于我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加上当地的条件比那里好一些，而且我们准备得较充分，每人上山前除了喝一些辣椒水外，大部分人在身上披了毡子、毯子，大家都带足了干粮，还规定了联络信号。这样，我们比较顺利地在下

午便翻过了梦笔山，到达了卓克基。

在卓克基住了几天，我们中央红军便向北继续行军，并于七月二日翻过第三座雪山——长板山，然后在山下休整了几天，主要是进行纪律整顿。随即，我们于七月六日翻过了长征途中的第四座雪山——打鼓山。七月七日，接着便翻越第五座雪山——拖罗冈。这座山比较平坦，但有时还需从栈道上（也就是在石缝上插上木桩，然后绑上绳索或架上木板）行走。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团结互助，最后顺利地翻过了这座雪山。

七月十日，我们到达毛尔盖。

毛尔盖是松潘县的重镇，是藏族同胞的聚居地。往北，是荒凉的大草地；往南，经懋功便可入川；往西，经甘孜则可进入西康。当时，我三军团十二团住在毛尔盖附近的芦花，在这里住了大约三个星期，主要是休整队伍和筹备粮草。然后，我们便开进毛尔盖，在这里待命，准备过大草地。

在芦花和毛尔盖筹集粮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儿是藏族同胞的聚居地，人口又不多，虽然地里长着黄灿灿的青稞和部分小麦，但由于中革军委有明确的规定，筹粮对象主要是压榨藏族同胞、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土司，对他们的牛羊、粮食，可以没收充公，但对广大藏族同胞的粮食，则只能公买公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我们能买到的粮草非常有限，根本不够供应红军的需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及粮食。在芦花，我们找到了一座土司的宫殿，因为红军来后他惧怕我们，早就逃跑了，我们在土司宫内搞到了两三万斤粮食。后来，我们地方工作组又和二营打了一个土司的牛场。二营长邓克明同志亲自指挥，把重机枪架起来，一放枪，土司的武装便纷纷逃到山里去了。邓克明同志把缴来的十多头牛交给我，这样，才基本上缓和了部队的粮草供应。但是，在解运

牛的过程中，我们又遭到反动土司的袭击，我的脚被山上滚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击中而负了伤，后来伤口又感染而化脓，脚烂得能见到白白的骨头。好在我在云南的时候，碰到一个开药铺的老板，是江西樟树人，他知道我也是江西人后，就送给了我一瓶云南白药。就是靠着这瓶白药，才救了我的命，治好了我的脚伤，顺利地走出了大草地。

就在我们在毛尔盖附近休整和筹粮的时候，中央在毛尔盖开了会，主要是研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作出北上抗日和维护红军团结的决议。同时，中央还决定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编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中央机关为右路军，右路军的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参谋长为叶剑英。以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左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政委为张国焘，参谋长为刘伯承。

大约是八月十七日左右，我们踏入茫茫大草原。说是草地，其实是一片烂泥的沼泽，不过表面铺盖着一层茂密的青草罢了。草丛上面弥漫着阴冷的浓雾，草丛下面的水是黑色的，散发着腐烂的腥臭气。这儿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积累的腐草覆盖的泥潭，踩在上面软绵绵的，根本不敢用力，若是稍不注意踩进了泥潭或是踩穿了草丛，人就会陷下去，而且越陷越深，甚至于整个身子都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出发前，上级通知我们每人带十八斤干粮。因为我的脚负了伤，又加上枪支弹药和背包，这样太重，于是我只带了六斤炒面和两斤牛肉干。草地的水是腐水，颜色黑气味臭，这样的水有毒不能喝，挂了彩的伤口经这种水一泡，极易红肿溃烂。我的脚伤正好伤在踝关节上，基本上天天都泡在这种水里。于是，我每晚休息前都要用纸烧一茶缸盐水，洗净伤口后再抹上一点云南产的白药。非常幸运，我那已化脓

感染的脚伤并没有继续恶化。

在草地上行军，要看好前面大一点的草丛，然后赶快跨过去，再踩下一个草丛，停留的时间过久或踩偏了，都有可能陷入泥潭。第一天进入草地，我们碰上一条小河，我和大家一起涉水过河，在我上游方向的一个年纪很小的红军战士突然滑倒，并被水冲了下去，冲到我身边的时候，他突然本能地死死抱住我的两条腿。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死命地抱住我的腿，这样我们两人将一起完蛋。他放开我的腿，又紧紧地拉住我背在身上的挎包，我便拽着他往前走，快靠岸时，水越来越深了，我们站都站不住，很危险，这时团政委苏振华同志走过来，站稳后伸出一根棍子给我，说：“老朱，你拉好来。”我便紧紧地握住棍子，被慢慢地从河里拉了出来。随后，我又把那个小鬼用棍子拉了出来。人是得救了，但挎包丢了。最让我遗憾的是挎包里装着几封毛主席给我的亲笔信，还有一本记着我参加革命后的一些事情和经历的笔记本，都弄丢了。

我们进入草地后，基本上天天下着雨，身上经常都是湿的。晚上宿营的时候，由于没有防雨的用具，我们只能随便找一块干一些的硬地，背靠背地坐到天亮。像过草地这样艰难的行军，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有多少红军战士，被这茫茫大草地吞噬了生命。有的人走着走着便倒下去了，有人陷入那根本就拔不出来的泥潭，还有人是由于虚脱，休息的时候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战士背靠背地休息，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又开始行军，我一站起来就听见“扑”的一声，回头一看，是昨晚和我背靠背休息的那位战士倒下了。我用手一摸，人早已冰冷发硬了。

进入大草地之后，头两天是最苦的，以后的路稍微好一些，大草地中都没有前面那样多的水。大约在草地中艰苦跋涉了近六天的时间，我们终于征服了大草地，到了班右。

班右这个地方只有一些牛屎房，人口并不多，但是我们有了吃的东西，我们看见了大萝卜、红萝卜、豌豆、小麦，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亲切，感到欣慰。我们终于征服了大草地，从死亡的边界上走出来了。

在草地行军六天六夜，双脚天天泡在水里，身上基本上天天都是湿的，别提有多难受了，体力消耗又非常大，如不小心摔倒了，真不愿再动一下，总希望这样多躺一会儿。特别是我还要忍受剧烈疼痛的脚伤，每迈出一大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可是，如果此时虚弱的身体真的不能使人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那么人的意志和毅力会慢慢耗尽，人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们有多少同志就是这样倒在了大草地里。他们从苏区出来后，一路上冲锋陷阵，迎着枪林弹雨搏斗、前进。可是，在巍巍雪山和茫茫草地中，残酷的大自然却吞噬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蒋介石匪帮也曾企图让红军在雪山草地中慢慢消耗殆尽。可是，红军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她有着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有着一往无前敢于拼搏的精神。红军没有被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所消灭，更不会被残酷的大自然所征服。雪山我们翻过来了，草地我们走出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是，红军将士这种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我们左路军一出草地，胡宗南便十分恐慌，认为我们要经包座进入甘南，于是急派驻扎在松潘的敌四十九师赶至包座增援，但被我红军在包座的救济寺一举歼灭。

此时，左路军亦已到达阿坝，但张国焘突然决定南下川康，与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相对抗，并依仗人多枪多的优势，企图用武力解决。

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坚持南下的错误路线，并试图以武力要挟中央的事，当时我们已听到传闻。我记得在走出草地不久的一天晚上，

我们住在巴西，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上级通知我们晚上睡觉时不能脱衣服，不能把武器弹药、干粮袋及挎包等东西从身上解下来，要全副武装地休息。于是，我们便把背包当做枕头，抱着枪休息。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接到命令出发，向北行军。行军前没有往常那样的动员，只是吃了点干粮就出发。出发没多久，就看见四方面军的同志往南走，和我们擦肩而过。我看见四方面军的队伍里有抬着电台及发电机的，估计是他们的指挥机关，并听到他们的队伍里有人喊：“你们往北走是去投靠苏联，吃洋面包。”我还看见彭德怀同志站出来怒斥他们，由于离得较远，听不清彭总在说什么。后来，我们和四方面军的人就分开来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张国焘率部到阿坝后，密电陈昌浩，告诉他准备南下川康的计划。但此事被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获悉。于是叶参谋长连夜将此事告诉毛主席和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研究决定，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揭露张国焘南下逃跑，企图危害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并采取断然措施，决定率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继续北上。

九月十三日，我们渡过包座河，沿白龙江向北，直指腊子口。

十一 胜利到吴旗

九月十七日，我们来到了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被称之为天险，是毫不夸张的。所谓腊子口，即为腊子山的山口，是翻越腊子山的必经之路。这里的地形极为险峻，周围的高山峻岭无路可通，且都是陡壁。山口只有三十几米宽，仿佛是用一把大刀将一座山切成两半，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谷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虽不很深但绝不能徒涉。在腊子口的前沿有一架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必经之路。在桥的东头，敌人构置了工事，并设有重兵把守，火力配备据说也非常强。

敌军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的一个旅，正是凭借这里的天险，企图将红军阻止在腊子口下。但是，我红军将士是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的。我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四团的一个营，从敌人认为无处可攀，因而没有设防的峭壁上攀登了上去，并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地运动至敌人工事的上方，居高临下，用机枪和手榴弹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在腊子口正面，我突击部队在迂回部队的掩护下，趁机发动强攻，一举占领了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到鲁大昌的老巢岷州城下。大约是九月十八日，中央红军部队顺利通过了腊子口，翻过了岷山，经过两天行

军，来到了岷州之东的哈达铺。

当时，我们三军团作为后卫部队，驻扎在岷州的大草堂，离哈达铺只有几里路。驻扎下来后，我带地方工作组的二十多个同志外出搞调查，以便弄清当地的一些情况，好为筹粮筹款做准备。

大草堂这个地方很富裕，大约有五百来户人家，出产大米、小麦，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边有一些水磨，粮食都是用水磨加工的，既快又省力。在这里驻扎，给红军的休整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这天，我们来到一户大地主的门前，看见门外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我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啊？”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干人。”我知道干人就是穷人的意思。于是我又问：“你们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走河路的。”我想，这里的河这样小，里面又没看见一只船，怎么叫走河路呢？后来才明白，所谓走河路就是给别人当长工，是为别人干活的。这两个长工说：“红军先生，我们掌柜的交待，这房子里的东西要我们看好，不要给别人抢走了，红军来了交给红军先生，只要你们不杀人，不烧房子就行了。”原来，这家地主是怕我们来后会杀掉他，所以带着金银细软和大烟土逃走了。这两个长工又接着说：“红军先生，东西都在这里，你们要什么就自己去拿什么，大米和白面不够吃的话，我们给你们加工。”我仔细清点了一下仓库里的东西，大约有几十万斤粮食，主要是小麦，还有很多大米。此外还有两百多斤蜂蜜以及火腿、腊肉等食品。院子里和栏里还有十多头牛、四十多头猪、四百多只羊、二十多只鸡，非常丰富。我们十二团在大草堂住了一个星期，基本上都是吃这一家地主的東西。

前一段时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体力消耗非常大，加上行军路线又多在藏族同胞的居住地，吃得非常差。为了尽快恢复体力，我们尽量吃得好一些，所以，在这一星期内，我们天天都有肉吃，还有大米饭吃。这对我们这些以江西、湖南、福建籍为主的红军将士来说，

都非常高兴，简直就像是过年一样。

红军到哈达铺后，从当地邮局得到不少的报纸，我们在报纸中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在陕甘有一块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个消息使大家都非常高兴。自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以后，开始想在湘西建立根据地，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后来又决定与二、六军团会师，湘江大战后损失太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意愿。进入贵州后，曾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又改变了计划。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曾打算在川西和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又改变了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有一个落脚点，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啦！

在哈达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红一军团改编，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编为第三纵队。

当我们在哈达铺休整的时候，敌人拼凑了二三十万兵马，准备在渭水堵截我们。毛主席指挥红军佯作攻击天水之态，将敌军主力调至天水一带后，于九月二十五日迅速从武山、漳县之间渡过渭水，将敌人的二十几万人马远远甩开。

九月二十六日，红军占领通渭城的榜罗镇。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榜罗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将陕甘苏区作为落脚点，到陕甘去保卫与扩大苏区根据地。

我们在通渭城时，还亲眼看见以刘志丹的名义发出的布告，主要内容我记得是公布红军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胜利结束了，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我们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辗转征战，流离颠沛近一年，眼看就要有家了，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十月三日，我们胜利通过了会宁、静宁之间的陇海封锁线，紧接着，又通过了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并击溃敌军一个骑兵团，顺利地来到六盘山下。

六盘山地跨宁夏、陕西和甘肃三省，坐落在黄土高原上。这里的风光、气候和老百姓的衣着住房，都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很不相同。田野上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黄土，住房多是在靠山的地方挖上一排窑洞。树枝、房屋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老百姓的裤脚都用带子扎着，头上围着一条白毛巾。

六盘山不很高，山上也没有什么树，放眼看去，到处都是一片黄茫茫的，很是单调。这儿的山坡非常缓，红军将士蜿蜒行进在这黄土山上。红旗飘飘，单行的队伍看不到边。过了不多久，我们便听到毛主席的那首《清平乐·六盘山》的著名诗篇。

听到这首词我非常激动，特别是词的下阕，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对革命前途满怀希望。我跟随毛主席有很长时间，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对他的革命预见性很是信服与钦佩。当时毛主席曾预言的事情，事后都证明是对的。就拿这首词的下阕的最后两句来说，“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当时我内心想：是不是已派人打入到敌人内部，指日可待抓住敌酋蒋介石呢？后来我又想这样不可能。但我绝对相信毛主席的预见。别看我们现在只有万把人，但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新中国。果然，过了一年零两个月，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要不是我们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可以不释放他。又过了十四年，我们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最终走向胜利的。我们在长征中克服了那样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陕甘宁，眼看目的地就要到了，最终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过了六盘山，我们继续向北前进。红日高照，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部队的士气非常高。在这茫茫的黄土高原上，我们顺着那弯弯的道路前进着。经河连湾到洪德城，大约是十月十八日左右，我们翻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山——东老爷山，并在山上住了一晚。再往东走，地势明显开始降低，并进入陕西境内，长征的目的地就要到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沐浴着朝阳，进入了吴旗镇。

“到了！”“到了！”同志们欢呼着冲进了镇子，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途，一路上经历了多少穷山恶水，经过了无数残酷战斗，忍受了物质上的极度贫乏，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好战友，现在终于到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这怎能叫我不兴奋、不激动！

到达吴旗的第二天，中央红军就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一举消灭了马鸿逵、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击溃了两个骑兵团，拔掉了几个最反动的土围子，巩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随后，我们在吴旗镇休息了几天，接着便经永宁山、桥富雨到下寺湾后，我接到了中央的命令，奉命进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我亲身经历的长征到此便结束了。在这里，我援引毛主席的著名《长征》诗作为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回忆和纪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十二 在陕甘省及陕甘宁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旗镇后，我们休整了几天，便向甘泉县方向前进。当我们走到下寺湾的时候，我看见王观澜同志站在我们行军的道路旁张望着。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叫住我说：“喂，开铨同志，你不要走了。”我停下来问道：“为什么？”他说：“中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成立陕甘省，并决定调你参加陕甘省的筹备工作。”随后他又说：“是毛主席提议让你到陕甘省来工作的。你是省委的七个委员之一，并担任省政府的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考虑到要培养当地干部，所以省政府主席由本地人担任。希望你们要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我问他：“毛主席怎么知道我还在啊？”他回答：“主席对你一直很关心，一路都在问你，你的情况他知道。”

长征时我一直都是在红军中，和红军的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实在是不愿重回地方工作，于是我把我的想法讲了出来。王观澜同志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是服从吧。”

我当时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如此信任我，刚到陕北就让我担当如此重任；担心的是怕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搞不好工作。虽说我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政府工作，担任过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政府主席团的巡视员、粤

赣省的土地部长、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主任，但那是在我的家乡，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风土人情我都很熟悉。可这是北方，这里的情况及民俗我都不熟，我这个南方人来到这里，困难肯定会很多的。

后来我又想到，长征中碰到那样多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难道我还怕眼前的困难嘛？不懂就学，多做点调查研究，多掌握点情况，遇事多向上级请示。再说离党中央这样近，可以经常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嘛。想到这里，我精神为之一振，信心也增强了。

把在红军中的工作交接完之后，我回到十二团，向谢嵩团长和苏振华政委辞行。说心里话，我是舍不得离开红军的，同志们朝夕相处近一年，历尽艰险和磨难，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要不是毛主席要我重回地方工作，我是愿意和部队的将士们共同战斗的。我离开部队后便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同志布置了我到陕甘省的工作，宣布了命令。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左右，我便赶到当时陕甘省的驻地甘泉县下寺湾报到。

下寺湾是一个小集镇，大约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当时中央机关也驻扎在那里。我到省委报到时，比我先到的委员只有朱理治、郑自兴、揭俊勋三人，其余的都还没有到。我们在下寺湾住了四五天的时间，然后便迁往甘泉县的王家坪。

当时的陕甘省委由委员七人组成，他们是：朱理治、李富春、朱开铨、萧劲光、李一氓、郑自兴、揭俊勋。具体分工是：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李富春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开铨任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萧劲光任省委军事部长；李一氓任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郑自兴任保卫局长；揭俊勋任少共书记。

在政权方面，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开始由王生玉担任。到陕北后，我们中央红军中过来的干部，由于长征时体力消耗非常大，身体很虚弱，再加上我们平常的伙食底子又分了一些钱，大约每人都有个十来

八块钱，所以我们经常买些肉、鸡之类的东西来吃，以恢复体力。陕北的东西很便宜，猪肉一毛钱一斤，鸡一毛钱一只。这样一件非常小而又正当的事，王生玉也看不惯，经常追问我们哪里来的钱。我把上述原因告诉了他，可他还是那样不理解，经常用怀疑的口气来问我们。我很生气，就说：“钱是贪污来的，你去查。”可惜，王生玉连贪污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明白。此人由于工作能力有限，只担任了职务二十来天便被解职。解职后他自己根据本人的特长，到硝皮厂去工作了（王生玉原来便是硝皮子的工人）。接替王生玉工作的叫李生华，此人很腐化（在王家坪有一个地主婆子是他的姘头，他正经工作没做多少，担任主席后不久便一头钻进这个姘头的家里，才二十几天就用了二十多块银元，还抽了不少大烟土）。李生华还指示王家坪区政府把这一家的地主成分改过来。王家坪区政府不敢做主，把此事报到了甘泉县委，县委又报到省委。鉴于如此，省委决定调查这一情况，并决定让我去。我当时就提出不合适，我在行政职务上是副主席，怎么可以调查主席呢？朱理治问我，你不去谁去合适？我说，从工作角度出发，组织部长去最合适。因为李富春同志在红军中的工作尚未交接完毕，组织部长暂由欧阳钦代替。这样，欧阳钦就带人去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在省委会上汇报。陕甘省委研究了调查的事实，决定免去李生华的职务，并把这一研究结果上报中央，请中央再派一个省主席来。后来中央回电，两个月派了两个省主席，现决定不派了，由省委研究解决。后来省委研究决定，由我担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时陕甘省的机构是这样设置的：

裁判部、土地部：部长均由我兼任；

工农检察部：部长任泽宜；

财政部：部长张幕尧；

内务部：部长马仰西；

教育部：部长王之匀；

粮食部：部长杨玉亭；

国民经济部：部长马锡五；

办公室：主任杨培源。

省委书记朱理治，是红军尚未到达陕北时，由当时的北方局派到陕北去视察工作的，大家都称他是中央代表。此人三十岁左右，能说会写，但思想一贯“左”倾，认为似乎只有他才是革命的，别人都是不革命的。我记得我们在王家坪的时候，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开铨同志，请你把粮食部长杨玉亭、军事部所属的供给部长席仲琪抓起来。”我感到很惊讶，这都是高级干部，都是刘志丹同志二十六军的老红军啊，杨玉亭还是个跛脚的残疾人，为什么要抓他们呢？于是我便问：“为什么抓他们？”他说：“他们都是右派。”我又问：“你说他们是右派，有什么材料没有？”朱理治支吾了一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几页，说：“材料在这里，我是书记，我说了算，我已经作了决定，叫你抓你就要抓。”我见他态度蛮横不讲道理，非常生气，于是立即予以反击。我说：“书记又怎么样，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逮捕这样的高级干部，一定要省委开会研究，如果省委同意逮捕，还要报中央批准。现在李富春、萧劲光、李一氓同志都没有到，这样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擅自决定呢？这样做违反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朱理治当时挺难堪，他说：“我征求了郑自兴、揭俊勋同志的意见，他们也都同意我的决定。”我立即找到郑自兴，问他：“你是保卫局长，知道逮捕人要有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郑自兴当时没有做声。我又对揭俊勋同志讲：“你是少共书记，我们来的时候中央再三交待，要和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现在一来就要逮捕这么高级的干部，又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还同意？”揭俊勋说：“他是书记，他已经作了决定，你叫我怎么办？”

我听了非常生气，说：“如果朱理治叫你当反革命你也当吗？”由于我有道理，朱理治不好发作，他只好以嘲讽的口气说：“你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啊。”我文化低，当时还不懂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于是我就说：“我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我知道党的民主集中制，知道处理人要实事求是，要有证据。”后来，这两位同志都没有被逮捕。

陕甘省委成立后，我们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决定把发展游击战争，加紧组织地方暴动，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作为中心任务，配合红军的直罗镇战役。

当时，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在陕北刚刚会师，国民党企图趁我们尚未站稳脚跟，即实施新的部署，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方针，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向南作战，争取在初冬解决敌人的“围剿”。

我们陕甘省所辖郿县的直罗镇是一个战略枢纽，红军部队秘密而迅速地向这一带集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师，击毙其师长牛元峰，俘虏五千多人。这一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苏区，为党中央把红军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直罗镇战役中，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蔽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后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时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

直罗镇战役后，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我们陕甘省委和省政府从王家坪搬到矾乐，后又迁到道德镇，最后又搬回王家坪。李富

春、萧劲光、李一氓同志是我们迁到砚乐时才来的。陕甘省委七个委员到齐后，我们立即开了一次省委全体会议。省委认真研究了目前的情况，针对本省党员数量少、力量薄弱的实际状况，强调建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胆地、猛烈地发展党员，普遍建立支部”。与此同时，省委还颁发了《党支部及区委暂行组织大纲》等文件，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的组织，创建模范支部，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同时，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结合陕甘的特殊情况，作出了分田的决定，组织群众打土豪，分配房屋、农具和土地，划分阶级成分。对当时的工作，我们强调要坚持政策，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消灭富农，基本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结合分配土地，进一步建立健全区、乡政权，努力改进苏维埃的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陕甘农村，地广人稀，农村实行广种薄收。一部分农户分散在陕甘黄土高原的山坡上，挖上一排窑洞，在山坡上开一些地，今年在这里种，明年又重新开地种庄稼，十年一轮换。这里土地贫瘠，自种自收，靠天吃饭，为此，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农成分。大多数人住在地势平坦和靠近河川的地方，这里离城镇近，土地比较肥沃，人口集中，村落也比较大。在这种地方，土地则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陕甘省委、省政府决定的分田和划分阶级成分，主要是针对各种阶级的现状实行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由于我们能够按政策办事，所以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各级政权建设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红色政权在陕甘的广大区域里，稳固地扎下来了。

政权工作千头万绪，我感觉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大难度的，就是粮食的供应问题。人不可一日无粮。当时陕甘的驻军有一万多人，再加

上各级组织、团体和政权的机关，这么多的人要吃饭，牲口要草料，全得由我们来供应。陕甘省的区域很大，但人口并不多，特别是我们管辖区域的土豪基本上都打光了，买粮又没有钱，中央也没有钱拨给我们，怎么办？经我们分析研究，眼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白区去打土豪，并加强运输队的力量。为此，我们省政府组织了 two 支运输队，每队有近两百匹牲口，近百名队员。队员每人都配有枪支弹药，相当于一支准军事武装。两支运输队轮番到白区去打土豪，筹粮筹款，这样，才基本上保证了粮食的供应。在粮食的分配上，我们是先部队，后团体，再是省委，最后是我们省政府，如果出现粮食暂时接济不上的事，饿肚子的大概是我们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好在这种事也并不常有。

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还要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形象，那就是这个政权是自己的，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我强调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部门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要依法办事。有一次，陕甘省下属的肤施县（即现在的延安市），派人赶来近四百头羊，陕甘省委收到后打算把它分掉，正在这单位多少、那单位多少地统计。我正好外出回来碰到这件事，就问那个管分配的干部，这羊是哪里来的？他说是肤施县送的；我又问他是谁叫他分的？他说是朱书记。我便找到朱理治，跟他讲：“这批羊赶来后应该由省政府接下来，这样的事你不经过我们就处理啊？”朱理治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们刚到这里，群众基础还不深，我们不是提倡打土豪分田地，关心群众，搞好经济工作吗？这么多的羊就这样吃掉啊？我的意见是群众都很苦，应该分给群众。”朱理治不好说什么。我就派人把羊全部圈起来，后来在李富春、萧劲光等同志的支持下，把这批羊都分给群众了。同时，我还写信批评了肤施县的县主席，希望他的头脑中今后要多装着群众，要发展根

据地的生产建设。

我们在工作上还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缺乏干部。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当时的干部，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红军中调出来的；二是当地的刘志丹同志、谢子长同志开辟根据地后培养的干部；三是从当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培养的。前两类干部毕竟有限，但我们的需要量又比较大，所以，从当地选拔培养干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陕甘省有不少地方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那里群众的思想还远远不够解放，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出来当干部，存在害怕的思想，怕我们会撤离该地区，国民党回来找他们算账。还有一部分人满足于现状，觉得眼下的日子还过得去，不愿出来担风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要靠宣传教育，靠政权的稳定 and 政策的深入人心。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随着政权的稳定 and 政策的深入人心，这个矛盾逐步得到了缓解。

当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是有的，特别是在干部的使用上，有时还存在简单粗暴的作风，对一些同志采取强迫的措施，逼他们参加革命。比如酈县主席郝建墙，原来是给资本家赶脚的工人，有一次他运三十几驮布到三边去，路过陕甘边区时被扣住了，骡子和货物被没收充公，人留下来参加革命。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时该县曾一度被国民党占领，他便撤到王家坪来了。一天他来找我，让我还给他两匹骡子，他还想去赶脚做生意。我问他当初是如何参加革命的，他把上述经历告诉了我。我见他人还聪明，文化不高但见识还多，个人出身又好，再说经过一段时期革命的考验，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我想挽留他。我就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是。”我便开导他说，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本来货物和骡子没收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做了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今后吸取教训了。你是赶脚的，又不是

商业资本家，也是被剥削者，既然已经参加了革命就不要轻易放弃。我还给他讲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以及我们革命的目的，郝建墙表示以后要坚定信念，革命到底。类似郝建墙情况的还有省运输队的副队长米裕德，但是米裕德没有提出来要回去，以后就根据他的特长把他安排到边区政府办的骡马店当经理去了。

当我们还在矾乐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毛主席在酃县东村开完红军总结直罗镇战役的干部会议后，来到了矾乐。毛主席一到矾乐就先到省政府来找我。我看见主席这么晚来，忙问他吃过饭没有，主席说没有，我说现在就给你弄，主席忙说：“我要先到省委去听个汇报，你给我找个向导，我听完汇报就要回瓦窑堡去。”

东村离我们这里只有十里路，可我们这离瓦窑堡却有三天的路程。我见天色已经快黑了，就对毛主席说：“现在天都要黑了，我给你弄饭吃，然后住下来，明天再走吧。”毛主席说：“不行，那里肃反很厉害，把刘志丹同志都抓起来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要赶回去处理这个问题。”随后，毛主席又问：“你从红军转到这里来工作，是不是王观澜同志告诉你的啊？”我说是。主席说，你把观澜同志是如何对你讲的再讲给我听一遍。我就把那天王观澜同志的话复述了一遍，主席听完就笑了，说：“对，这都是我的意思，让你兼两个部长，一是要搞土地革命，划分阶级，一是要继续肃反。这两项工作政策性都很强，不能出偏差。”接着主席又问我：“你们这里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我说：“对地主、富农有些过分了。有些不够划地主富农的也划了。”我还告诉毛主席，我们省政府就纠正了两家错划的地主。比如，下寺湾的一户小土地出租者，本人已弃农经商，我们给他取消了地主的成分，还取消了王家坪一个中农错划为富农的成分。毛主席听完之后又问我：“群众影响怎么样？”我说：“影响蛮好。”毛主席又鼓励我说：“阶级成分划分，你是知道的，主要是要掌握政策，

我也发现这里有将小土地出租者划成地主的，你既然已经纠正了，那就好。”

我派罗培兰找的向导来了，这是我们省政府运输队的副队长，人可靠，地方也熟。我向他交代：“给你一个任务，你给毛主席当向导，带他到瓦窑堡去，马上就出发。你带上两匹骡子，带上一些谷子，估计今天走到富村就要休息。你到那里不管多晚，都要给主席加工一些大米，做米饭吃。”安排完之后，毛主席到省委去听了汇报，然后就上路了。

毛主席走后，我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搞肃反扩大化，杀“AB团”和“社会民主党”，多少党的好干部、红军的好指挥员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把刘志丹同志为首的红军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领导干部都抓起来了，已经错杀了几百名无辜的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有许多红军干部是被麻袋套住活埋的。毛主席刚指挥打完直罗镇战役，就连夜赶来纠正错误路线，制止错杀，保住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使他们幸免于难。刘志丹同志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在三交锁战斗中壮烈牺牲。习仲勋、张策同志被中央派往关中特委，在上任途中经过王家坪。我们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习仲勋同志任主席的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使用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他在职时使用的。对这些干部，我认为绝大多数都很好，既有一定的工作水平，又比较忠厚诚实，我接任陕甘省主席后感觉工作很顺手。为了对这些干部加深了解，我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习仲勋、张策同志留了几天，请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地区的情况和这里干部的情况，他

们很详尽地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此后，不管是去中央开会还是从中央回关中，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要留他们住个两三天，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陕甘省的时候，我还接待过一些辗转来陕北找党组织的同志。这些同志中有的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有的则是满腔热情的进步青年。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身穿旧长衫，头戴旧礼帽，手提一只藤箱，架着一副眼镜，头发胡子都很长的人，像是一个落魄的教书先生。他一进门就问：“请问哪位是朱主席？”我问他：“你找朱主席有什么事？你是从哪里来的？”他马上反问：“你就是朱主席吧？”我很奇怪，他显然并不认识我，但怎么又认定我是呢？我警觉起来了，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朱主席？”他说：“我在来的路上就听说陕甘省的省主席是江西人，姓朱，一听你讲话的口音我就知道了。”我马上请他坐下，问他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叫周建屏，是江西东乡人，我们还是老乡呢。红军长征的时候，我留下来打游击，后来失败了。一天晚上我从山上逃出来，在一家人的院子里收了一套衣服穿上，然后理了发，就经广州到香港去了。后来在报纸上知道党中央到了陕北，我就化装成这个样子，经天津、西安找到这里来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一个党员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我知道周建屏同志肯定吃了不少苦，就留他在省政府住了五六天，然后派人送他到中央去。和中央接上关系后，他被安排到陕西省当了军事部长，我们为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由马锡五同志介绍，和省政府内务部的干部罗培兰同志结为夫妻。罗培兰同志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陕甘的南梁根据地参加革命，陕西乾县人，是南梁政府当时第一位女同志，在那里认识了刘志丹同志和同桂荣大姐，并得到他们在政治上的爱护、生活中的无私援助，这种在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一九三五

年她任酈甘县妇女主任。陕甘错误肃反时，在游击队工作，所以才幸免一死。红军到达陕北后，她又从游击队回到了省政府。我与罗培兰同志结婚后，由于我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所有的家务事和孩子都是由她负责，并且还不能影响工作，这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不仅是夫妻，而且是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我们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人生的道路上并肩前进，一直走到今天。

一九三六年春天，我红军主力东征，提出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向山西进军，并在一夜之间东渡了黄河。这时，陕甘根据地内部兵力减少，国民党东北军乘机大举进攻陕甘省，相继侵占中宜、甘泉、酈县以及关中特区的大部，使上述地区重新变成了游击区。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电令撤销陕甘省委，并将原陕甘省委所辖的特委、县委及同级政权组织，归陕甘工作委员会管辖，委员会主任为朱理治。并于同日电令成立陕甘宁省。

撤销陕甘省和成立陕甘宁省，是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而作出的决策。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事实上是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大我党和红军的影响，并更为直接地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以造成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的局面。但是在山西受到阎锡山和汤恩伯的阻拦。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命令红军班师回陕甘，并开始对统一战线政策作适当调整，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事宜。但国民党政府无视我党的一再倡议，对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置若罔闻，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顾，仍妄图以武力消灭红军。他们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出任总指挥，调集了十六个师零三个旅的兵力，再次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

当时在西北，我红军的活动区域狭小，向东、向南发展都受到扼制，处境十分不利。在西南，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南下计划已告失

败。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令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迅速北上陕甘。

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确定党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作战。据此，要求红军向西挺进，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争取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与四方面军的联系，从而达到开辟新苏区、扩大根据地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所以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将力量向西发展。（见附录一）

我红一方面军坚决地实施了这一战略意图，向西挺进。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激烈的战斗，相继解放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宁条梁、元城、阜城、曲子、豫旺、盐池、金积、定边、同心城、海原、固北、环县、华池、固原、镇原、灵武等地区。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又创造出纵横两百余公里的新苏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成立是在吴旗县的刘家渠子。随着红军西征的胜利，省委省政府后来迁到甘肃环县的河连湾，后来又迁到元城子、曲子镇。陕甘宁省委由委员七人组成，他们是：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罗梓铭，省政府党团书记朱开铨，军事部长萧劲光，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蔡畅（西安事变后白区工作部改为统战部），保卫局长郑自兴。

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部门是这样安排的：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

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朱开铨

土地部、裁判部部长：朱开铨

办公室主任：杨培源

内务部部长：王子宜

财政部部长：张幕尧

粮食部部长：杨玉亭

教育部部长：王之匀

我们陕甘宁省委成立，从陕西的刘家渠迁到甘肃环县的河连湾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县委书记和县政府主席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布置新苏区的建设工作。会后，各县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赶做军鞋、军服，筹集粮食三万三千多石，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为迎接全国的主力红军会师于西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时，陕甘宁省政府支前工作的负担是很重的。红军的粮食供给全靠我们，每天都需要几万斤，从征粮、运输到加工，这里面的困难非常多。由于这里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所以粮食的来源主要是从土豪地主那里没收和从富农处征收来的。粮食的运输主要靠骡马驮。粮食的加工则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情。这里和南方不一样，老百姓家一般都不存加过工的粮食，都是吃多少加工多少。可我们又不能把没加工的粮食送给红军吃。当地加工粮食，都是用磨、碾加工，一次加工不了多少。后来，我们省政府开会研究，还是要依靠群众，决定和当地的群众商量，把粮食分散到群众家里，请他们加工好以后给我们送来，我们给他们留一定比例的粮食做加工费。这样，才勉强算是解决了粮食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宁省境内的会宁、静宁一带会师，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革命力量日益壮大。陕甘宁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杀猪宰羊犒劳自己的军队。十一月初，中央放弃夺取宁夏的战略

计划，红军三大主力东移，在环县的山城堡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一个团，使红军士气大振，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山城堡战役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

山城堡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被迫后撤三百余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稳固，红军三大主力均后撤休整。我们省委省政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为了加强地方工作，于一九三六年冬派出由我、蔡畅、郑自兴、张慕尧、赖传珠、刘国升等人组成的支前工作团，深入工作薄弱地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建党建政工作，发展革命武装。经过我们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在原有的三边特委、赤安、定边、盐池、华池、曲子、环县、安边、豫旺、固北、静宁、豫海县委和固原工委的基础上，又相继建立了合水、定环、庆阳、镇原、驿马关五个县委，共下辖定边、盐池、赤安、固北、定环、豫旺、豫海、华池、曲子、环县、静安等县苏维埃政府。

在红军西征时，我们抓紧根据地的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这里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认为我的看法和做法是对的，那就是对待活跃在陕甘宁一带的帮会——哥老会。

哥老会的成员大部分是无业游民，其中还有不少流氓地痞和一些土豪劣绅，基本上是以破产的剥削阶级为主。哥老会在革命初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的口号是杀富济贫，为人民群众做过一些好事，但也有不少人经常骚扰百姓，到老百姓家中吃吃喝喝。红军西征时，哥老会为了迎合形势，提出组织“江湖抗日游击队”，当时可能是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红军还给了他们一些武器。我对农村的帮会和流氓地痞是有些了解的，在瑞金，族姓之间的械斗，往往都是这部分人挑起来的。所以，我对哥老会始终都是警惕的。

记得有一次我正好从外地检查工作回来，看见街上有一幢门口挂着“江湖招待所”的大房子，找人一问，原来是专门招待哥老会成员的。我把财政部长张幕尧同志找来了解情况，才知道是我在外检查工作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同志决定成立的，每天都要供应很多银元和烟土，还有香烟、酒肉等。对哥老会大吃大喝那一套，我是非常反感的，听到这些情况后，我很生气，就对张幕尧同志说：“这都是红军的钱，怎么能给这些人吃喝？”张幕尧说：“这都是马主席批的。”为了搞清情况，我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调查，发现很多人都对哥老会的那一套很反感。于是，我便作出决定，把江湖招待所改为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招待所，把那些住在里面的哥老会成员都赶走了。我的这一做法，在领导层中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广大基层干部还都是拥护的。

当时，在哥老会组织中，有一个叫赵思忠（外号叫赵老五）的人，是哥老会的大爷。此人原来是地主，后来入了会，在环县一带占山为王，有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在哥老会中很有势力，是一帮政治土匪。这个人非常反动，可是省委却有人提出来和他搞什么统一战线。有一回，赵老五派人到省委来，要请省委派人去他那里作报告，省委就派了朱自休（军事部副部长）带了六人去（军事部两人、保卫局两人、统战部一人）。赵老五同时还派人到我红军七十八师，也是请他们派人去作报告，后来七十八师派了一个民运部长去。当时我正好在豫旺县检查工作，赵老五又派人来找我，请我也去给他们讲话。我对赵老五这个人很警惕，同时也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他请我们这么多人去作报告呢？我就对来说：“我现在工作很忙，到你们那里去有困难，如果一定要我讲话，请你把队伍带到豫旺来，我来讲。”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派去作报告的人都被赵老五扣住缴了械，并押送到宁夏国民党那里去。路过豫旺的时候，军事部的张参谋趁天

黑跑了出来。他告诉我，他们一到赵老五那儿，就被他们把马和枪都缴了，人也绑起来了，准备送到宁夏去，他是趁天黑跑出来的。在这前后，赵老五共杀害了我们的干部战士近一百人。后来我们派部队去剿灭他，他就带着队伍逃到山上去了。

还有一次，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准备在固北建立县政权，我正好开会经过此地，就在那里停下来。我看见那里所谓的江湖游击队有七十多条枪，还有不少梭镖和鸟铳，说话满口的流氓腔调，我就感觉有问题。他们还要我去讲话，要留下来招待我。我先应付他们，把他们稳住后，就把县委书记和县主席找来，我对他们说，江湖游击队的这些人看来都不正派，估计他们迟早会闹事，也不要和他们硬顶，因为你们只有二十来条枪，那样会吃亏，如果情况紧急就赶快撤回省里来。随后，我答复江湖游击队，说我这几天工作忙，等过几天再去讲话。半小时后，我便悄悄地走了。两天后，这些人果然起来闹事，想缴掉我们县保卫队的那二十多支枪。好在我们的人都有准备，及时撤走了。

我认为，搞统一战线要看对象，不是什么人都能统的，搞不好，还会给革命造成损失。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中央派人来打招呼，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要来这里采访红军长征以及红军到陕北后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们斯诺先生非常友好，要我们除军事秘密外，可以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斯诺先生是和马海德医生一起来的，当时非常热，我们就用西瓜来招待他们。斯诺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他就红军长征以及陕甘宁的财政经济及供给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同时还向我了解毛主席的一些情况，我非常坦率地回答了她的提问。他对毛主席和红军将士非常钦佩，在采访中经常称赞道：“毛泽东了不起，红军了不起！”后来，他又到部队中去采访了一个星期。采访结束后他来省政府向我辞行，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西人。他就问我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比如给你的家乡写一封信，我带到西安去发。”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去发。后来斯诺先生根据采访的材料写了一本叫《西行漫记》的书，用详细、生动的事实歌颂了党和毛主席，歌颂了红军，并预言将来共产党和红军必将夺取全国胜利。这本书在国统区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白区的进步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来延安参加革命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我记得是十二月中旬，也就是事变后没几天，那时，我和李富春同志带了一些人在陇东一带筹粮。陇东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一些大地主在我们来之前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多半都藏在地窖里，而且隐蔽伪装得很好，不容易被发现，人却逃跑了。这样的粮窖一般找到一个，就可以弄到万把斤粮食，有时甚至还更多。那天早上，萧劲光同志手中举着一封电报，兴冲冲地从外面跑来，人还没见到就听他激动得直喊：“老朱，老朱，好消息！”当时萧劲光同志也带一部分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筹粮，我开始还以为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藏粮的大地窖。我见他高兴成那个样子，就问：“什么好消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萧劲光同志又重复了一遍，并给我看了电报。我们马上叫醒了李富春同志，大家都高兴极了。

自我参加革命以来，耳闻目睹，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眼下，我们把抗日作为最大的政治目标，并向蒋介石多次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均遭到他的拒绝，而且蒋介石还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继续举起他的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到处制造摩擦。现在终于抓住蒋介石了，要是杀了才消恨解气。这时，我又想起毛主席的那首《清平乐·六盘山》的词，其中就有这样两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现在把蒋介石抓住了，毛主席的预见真是英明。

我们陕甘宁省委在收到西安事变的电报后，马上就开了会，决定

组织工作队随红军南下，往西安方向走，去开辟更多的地区。队伍走到甘肃庆阳，李富春同志传达了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要放蒋介石。

听到要放蒋介石，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想不通，跟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革命战士谁不恨他？

后来，毛主席及时在全党做了思想工作。毛主席说：如果杀了蒋介石，何应钦就会上台，汪精卫就会从国外回来，这两个人都是亲日派，内战就有得打了，民族统一战线就建不成了。

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从抗日大计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容易想通了。

西安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开始形成。驻防陇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陆续撤离，对陕甘宁的威胁也逐步松动。这时，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经与驻扎在西峰镇的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协商，红军在西峰镇设了一个红军办事处，并让我担任办事处主任。

我以主任的身份来到了国统区的西峰镇。红军办事处的内岗是我们自己人，外岗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我到西峰镇后，先到保安司令部进行了例行的拜访，一个姓刘的副司令（东北人）接待了我。第二天早上，专员公署来了个人，说是戎专员要请我去吃饭，并请我先到澡堂洗澡，然后又请我理发。这样一折腾，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我在专署来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

戎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那个刘副司令陪我一起吃晚饭。戎专员一见我便问：“朱主任是哪个大学的啊？”我说：“农业大学。”戎说：“那朱主任对农业很有研究啰？”我说：“对，对小麦、水稻有一些研究。”就没有再问什么了。我们边吃边扯了一些闲话，之后我便告辞了。

在西峰镇期间，国民党的庆阳县县长经常到办事处来看我。由于

那时我们和国民党刚开始接触，彼此间都很提防，说话也很谨慎。我们只不过是了解对方，为了抗日大业和人民的利益，才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所以，我们在彼此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多是扯闲话，什么江西出产什么，东北有什么特产，等等。

在西峰镇吃饭，都是由我们红军办事处出钱，由专署的人送来，而我却很想和这里的群众见见面。有一天中午，我就特意到街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这里的群众听说红军在饭馆吃饭，就围了好多人在外边等着看我。我吃完饭后，整了一下装，就慢慢地走出去了，还和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我听到群众的议论声：“有人说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看就不是这样。”“看，红军也很神气嘛，哪里像土匪的样子？”

正当我对西峰镇的情况开始熟悉，与国民党的各级要人有了接触和了解的时候，我的身份被这里的哥老会认出来了，他们向国民党行署报告，说我是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从此，他们对我明显冷淡起来，统战工作也难以开展。正好，省委派到三边去工作的罗梓铭同志向省委点名要我到他那里去，以便加强那里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离开了西峰镇，在省政府过完旧历新年后，便到三边去了。

三边是我陕甘宁省下辖的一个地区，是指安边、盐池、靖边三个县，位于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四省交界地带，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北方要塞。同时，三边与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开展统战工作亦非常重要。在我们到三边以前，三边特委书记是毛泽民同志，后来毛泽民同志被中央调到新疆搞统一战线工作，罗梓铭同志便接替了三边的工作，后来我也到了三边。但我们仍保留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的原职务。

三边特委的具体分工是：罗梓铭任特委书记，我任省苏维埃政府驻三边代表，高岗是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协辉（后名朱辉）任组

织部长，程理生任宣传部长。由我们五人组成三边特委，并都是特委委员。

在三边，当时还驻扎着我红二十九军，军长李重英，政委甘渭汉。甘渭汉同志列席三边特委会议。

因为三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一到这里，便到红军二十九军去了解情况，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没有，以期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守卫住这个北方要塞。政委甘渭汉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并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烧柴的问题。

我了解了一下，就因为这个烧柴问题，部队与地方的纠纷很大。三边的柴火非常紧张，那里山上光光的没有树，又不出产煤，不管是部队还是老百姓，烧火全靠挖草根和树根。二十九军的同志们挖了不少，但都摆在山上运不回来，地方政府又没有专门的运输队伍。

我详细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地方。于是，我把定边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找来，我问他们当地群众的烧柴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他们说是在山上打好后用大车运回来的，我又问他们这里的大车多不多，他们说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还有好几挂，主要是用来跑运输赚钱的。我说：“现在二十九军很困难，他们自己筹备了一些柴，但没有运输力量拉不回去，希望我们地方给予支持。假如这里没有二十九军，这样的矛盾就不存在。但如果这里真的没有二十九军驻防，又哪里有你们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就是有你们怎么又能当得成？可能连觉你们都睡不着，我们整个陕甘宁省又怎么会有安全？所以，二十九军的烧柴问题，你们要关心，要积极想办法解决，要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帮助红军。”后来，在地方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另外我们在三边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由于这里驻军多，红军的给养和政府的经费都成问题。按就地筹集的原则，我在当地的商会做

了一些工作，希望他们能捐款捐物支援我们，当地的商界反映还挺积极，不多久我们就筹到了一笔款子。但要长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还得另辟蹊径，在征税问题上动脑筋。因为三边的贸易集市以前是很热闹的，传统的骡马交易很有名气，这里又出产盐，盐的买卖也很大，只不过是目前有些萧条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这里通用的货币是陕甘宁省发行的苏币（即苏维埃货币），但是商店和一些做买卖的人都不愿收，说是苏币到外面办不到货，因而商店纷纷关门，传统的骡马交易和盐的买卖都基本上停了下来，街上冷冷清清的，我们的税务部门也收不到税。于是我和罗梓铭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恢复以旧货币交易买卖。罗梓铭说，你是省苏维埃代表，这件事由你负责。于是，我找来几家大商店的老板，对他们说，经我们研究，决定恢复以旧货币进行交易，你们把已收下的苏币全部交到银行里，等我们有钱的时候再还给你们。

这个决定一实行，三边昔日的热闹又恢复了，买卖十分兴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收到了一大笔税款，比那些商人放在银行等待兑换的苏币多得多。后来，这一做法还得到了中央的表扬。

我在三边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便接到中央的命令，结束了在陕甘宁省的工作，到延安去了。

十三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整风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我接到中央的命令，作为陕甘宁省的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苏区和红军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并宣布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宣布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而代之为减租减息；宣布把陕甘宁省和陕西省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党委书记是郭洪涛（大约半年多以后高岗接替了郭洪涛的职务）。

当毛主席在作报告，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说明了要换帽子。这时，一位从部队来的代表大声说：“要我换帽子，我就要有所表示。”意思是对改编不满，不理解。还有一位从白区来的干部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毛主席给这些人做工作，毛主席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不是为了戴什么样的帽子。帽子是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实质才是核心。接着，又向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共同抗日的重要性。总之，这次会议开始有一部分人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打土豪分田地这两个问题想不通，通过学习，最终都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

大会之后，我的胸部感到非常痛，咳嗽，痰中带血。我记得在长征的时候，我们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刚出中央苏区的时候，我们

带的东西又很多，走也走不快，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有时停很长时间，人站在那儿就睡着了，后面的人还以为是休息，都停在那里，前面的人走了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也是站着睡着了，后面的人催我走，我迷迷糊糊地一脚踏空了，人掉在山坡下的一块大石头上，胸部非常痛。长征的时候也没空去管他，可现在怎么又犯了昵？

后来，我找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为我看病，他诊断我为三期肺病。当时由于药品缺乏，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如果真的是三期肺病的话，多半就只能等死。于是，我去找卫生部长傅连璋同志，把马海德医生的诊断结果告诉他。我和傅连璋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熟，他又重新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告诉我说：“现在先不说什么几期肺病，我给你拨出一间房子，你先住下来不要去工作了，休养两到三个月再说。”

说到傅连璋同志，还是一九三二年我在瑞金云集区任区主席的时候，就和当时任红军总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同志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他经常到区政府来，就伤病员的住房和供应问题和我商量。我也知道傅连璋同志是福建长汀人，家里比较贫困，小的时候被教堂收留，后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学医，以后又在教会办的医院里当院长。红军解放闽西以后，傅连璋同志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我任主席团巡视员后，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生病都是由他治疗的，他也经常到毛主席这里来，所以就更熟了。傅连璋同志很喜欢和我接近，说我为人坦率，对革命忠诚，工作不怕困难。长征时我打摆子，毛主席就是请他给我看的病。到延安后我也经常去看他，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全国解放前夕，在西柏坡的时候，傅连璋同志劝我不要南下，想留我和他一起到卫生部去工作，因中央已决定我南下江西，再加上我本人也很想回家乡去工作，所以我谢绝了他的邀请。

延安的住房非常紧张，卫生部为我专门拨出一间房子养病，边区

政府每月增加十几元钱的养病费，另外供应四十五斤大米，这在当时的延安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可见卫生部和边区政府对我是多么关心。后来，陈正人同志、罗梓铭同志、陈时夫同志到延安来接受新工作时，都因住房紧张而由李富春同志介绍到我这里来住，我的住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客栈”。老战友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生活过得也很愉快，吃得也很好，我感觉身体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贵重的药，只是每天服用一些鱼肝油。三个月后检查，我的“三期肺病”竟奇迹般的好了。

说到边区政府对我的关心，我要特别提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还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和林老就非常熟悉，当时林老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由于机关和部队的粮款由财政部划拨，而我当时又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担负着供给任务，所以与林老在工作上来往很多，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做好有效的供给。那时由于经费紧张，财政部用来购粮的款就更少了，林老为此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伤了很多脑筋，才基本上保证了粮食的供应。林老待人谦和，礼贤下士，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面前无拘无束，说话也比较随便。比如筹粮的问题，我是本地人，对当地的情况熟，给他出了不少主意，林老非常高兴。后来到了陕北，我是他的下级，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那样随和融洽。林老对我的病也很重视，除了在供应上照顾外，他还将自己用的药和针剂送了很多给我用。林老对我还非常信任，很多重要的事都和我商量，对我反映的情况和问题都非常重视。后来我报名南下时，林老非常舍不得我走，一再留我。全国解放后，林老来江西视察工作，还特意找我去叙旧，这些都是后话。

在我养病期间，罗梓铭同志接到命令，调他回湖南去搞统一战线工作。我和罗梓铭同志在中央苏区就很熟，他那时任中华全国店员工会的主任，长征时我们又都在红章纵队的地方工作部、遵义县革命委

员会共事。到陕北后，我们又都在陕甘宁省工作，都是省委委员，所以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是很深的。他在临行前找我谈话，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现在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要讲的没有？”我说：

“有。你回去搞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你还要提高警惕，不要住在城市里，要住在靠山靠游击队的地方……”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打断说：“开铨同志，你这个人思想太落后了，你要知道，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和国民党一起办公。”我说：“不错。但那时候我们和他们一起对付封建军阀，一九二七年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们又杀了多少土豪劣绅反革命？我们还打了十年仗，双方的仇恨都是很深的。”可是，这些话显然他都没有听进去。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九三八年秋，在平江家宜岭，罗梓铭同志夫妇双双被国民党活埋了，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平江惨案”。消息传到延安，我非常难过。中央在延安还为罗梓铭同志召开了追悼会，毛主席在追悼会上还讲了话。

我的身体康复之后，便向组织上要求工作，这已是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事了。这时的陕甘宁省和陕西省都已经撤销，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原陕甘宁省和陕西省的大多数干部都已任新职，还剩下的一部分干部和一些从外地来延安的干部，当时还没有分配工作。这些人大多数是县委书记、县长及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部长。于是，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政府巡视团。巡视团的工作主要是检查督促基层落实政府法令、政策的执行情况，了解基层和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并决定我任巡视团主任。这样，我便在边区政府巡视团工作了将近九个月。

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还兼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长期住在西安，所以边区政府的工作由张国焘代理。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高高胖胖的，虽说他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可是说起话来，作起报告来，咕咕噜噜的没有什么水平。在这期间，

我与他工作上的交往还比较多。由于长征时他坚持搞分裂，另立中央，曾使红军、特别是四方面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因此我对他是非常痛恨的。但我也知道让他担任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是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所以我仍把他当做上级来对待，经常找他汇报工作。他知道我也是江西人，以前又曾给毛主席当过巡视员，和毛主席很接近，因而对我特别客气，有时还显得很亲近，可我对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我记得当时边区政府成立不久，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还没有摘下来，张国焘非常着急，派我到陇东和三边去，成立陇东和三边两个专署，同时授权我组建两个专署的班子。因我在延安养病时把牲口都交掉了，张国焘特意关照边区政府总务处为我派两匹好牲口。我当时随意说了一句：“以前在和平时期，我外出办事总是带三匹牲口。”不知怎么张国焘听到了我的话，马上命令总务处给我派了三匹好牲口。在我外出期间，张国焘还两次派人到我家里，问我家是否需要什么。我从陇东、三边回来后，边区政府召开专员、县长会议，在会上张国焘宣布：“开铨同志是你们专员、县长的头，以后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向我汇报，找他就行。”对张国焘的这一套，我早就有所耳闻，他惯用收买人心的伎俩，在四方面军的时候，他的这一套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对此，我的警惕始终是很高的。

在专员、县长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提出一个建议，请来边区考察的国民党政府考察团主任王某某（原苏北的一个专员，是国民党CC派成员）来讲话。我听了张国焘的建议后感到惊诧，因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承认我们边区政府，我们怎么可以请他们来讲话呢？这不明显是讨好国民党嘛？于是，我站出来说：“我们这个会，虽说是专员、县长会，可到会的都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请这种人来讲话呢？”到会的同志都纷纷支持我的意见，张国焘一时下不了台，表情非常难堪。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已经十二点多钟了，我找张国焘汇报工作，走到他住的房子前，发现房间里没有灯，我问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张副主席在家吗？”“在，在房间里。”于是我便推门进去，却发现张国焘正和那个国民党考察团的主任王某某在谈话，我心里顿起疑团，两个人待在房间里不说，还熄着灯，肯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张见我没打招呼便推门而入很恼火，也很紧张，那个王某某很尴尬地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我亦把工作汇报完毕便赶快离开了。事后，张国焘还训斥他的警卫员，说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谁让你们放人进来的？警卫员辩解说，朱主任经常来，你又吩咐过不管朱主任什么时间来，都不必通报，直接放进来就是了，所以我们才没有通报。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焘非常恨我，并采取手段对我进行报复。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张国焘找我谈话，让我到民政厅二科去当科长。我一听便知这是张国焘的报复行为，便回答说：“我不想去民政厅工作，我想去中央党校学习。”张国焘说：“民政厅二科的工作很重要，以前一直开展得不好，你是老同志，非你去不可。”我知道，跟张国焘说是没有用的，于是便到中央组织部去找李富春同志。我把和张国焘作斗争的情况和他的一些反常表现都告诉了李富春同志，并明确指出现在要我到民政厅二科去工作是打击报复，我不愿去，想请李富春同志来解决这个问题。李富春同志想了想，说：“张国焘现在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我不便改正他的决定，你还是先去上任吧，做个样子也行，以后再想办法。”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好勉强上任了。

说是到民政厅工作，由于当时的边区政府没有什么经费，且民政厅又是个用钱的单位，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外出时正好碰上边区政府总务处长黄彩芹，只见他手中拿着一顶二尺来高的大礼帽。我很奇怪，就问他：“你买这样大的

礼帽干啥？”黄彩芹说：“张主席清明要到黄帝陵去扫墓，这是给他买的。”我马上想起一个多月前国民党政府考察团来边区考察时张国焘的种种表现，我怀疑张国焘一定有什么动作了，于是赶快找到李富春同志，对他说：“张国焘这样的人要去黄帝陵扫墓，你们都同意？”李富春同志说：“他是政治局委员，我又没权管他，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边区政府来人通知，科以上干部要在张国焘临行前集体去送他。张国焘走的那一天，我抱着女儿站在我的住房前，看着他在一群人的围绕下走着。我爱人说：“大家都去送了，你还不回去啊？”当时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于是便说：“你还怕张国焘不给我科长当吗？”我始终有个感觉，张国焘这一去，恐怕要出事。

果然，过了几天，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张闻天同志主持会议，宣布张国焘逃跑了。听了传达以后，我的心直往下沉，我感到有些后悔，要是我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就对了，毛主席可能会阻止张国焘的叛逃行为。

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这时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到处鼓吹“三个一切”。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自西安事变后，我们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目的是共同抗日。但在很多同志的思想中，却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权。这根弦一放松，将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已经有了血的教训。这种企图把党和军队的权力拱手让给国民党的投降言论，如在党内漫延开来，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如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蒋介石曾许愿每月供给银元六十五万元。可是，他从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拒不给我们八路军发粮饷。我当时在延安听说，绥德警备司令部的八路军指战员，模范执行

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打土豪，但国民党又不供应粮饷，弄得我们的指战员连饭都没有吃。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震率领部队到绥德。国民党绥德专员公署的专员何绍南来迎接他，王震一见到何绍南非常生气，挥手打了他几个耳光。这个专员后来跑到西安的省政府去告状，正巧彭德怀同志也在西安，西安的国民党官员请彭总吃饭，何绍南也在场作陪，他见到彭总后想伸出手去握手，彭总在他伸出来的手上打了一拳，怒斥何绍南：“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却在后方捣鬼！”说完，离席而去。

王震同志后来在绥德摆了几十桌酒席，把这里的绅士、商人和社会名流都请来，向他们宣传我党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号召他们抗日救国，大家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这些人见王震说得有道理，又听说王震怒打何绍南的事情，所以纷纷捐款捐物捐粮。我们就是靠了这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最终解决了部队的粮饷问题。

针对“三个一切”的错误和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给予了坚决抵制和批判。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迅速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我党应持的立场和观点，向全体党员、部队指战员和各级政权组织作传达。因我在民政厅二科没有什么工作做，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当时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便委派我到陇东、庆环两个地委去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纠正“三个一切”的错误，回到延安已经是六月下旬了。

这一年的“七·一”，我们在延安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庆祝会，党的领导人包括王明在内，都参加了这次庆祝会。我来到会场后，看见毛主席已经坐在前面，我就走过去向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当时很高兴，叫我坐在他身边。这时庆祝会尚未开始，王明却先跳上主席台，哇啦哇啦地讲了一大通，主要是讲我们党成立十七年来，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如像毛泽东这样的优秀干部，等等。

对王明这种喧宾夺主，依然把自己摆在党的领导位置上，竟然对毛主席作评价的无耻行为，我既气愤又惊诧。我看了看主席，只见他紧锁眉头，脸板得紧紧的。听见王明讲我们党培养了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好干部的时候，主席使劲“嗯”了一声，看得出他是在压抑胸中的怒火。王明讲完之后，没有人鼓掌，这时会议主持人走上台，宣布庆祝会开始，毛主席在庆祝会上讲了话。

这一年的七月底，我又受边区政府的派遣，到三边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检查基层对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回到延安已经是将近年底了。后来边区政府找我谈话，认为我的工作安排不适当，并解释说现在延安的干部很多，有不少人的工作都难安排，我也把张国焘打击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陈述。后来，边区政府决定派我到建设厅任副厅长，厅长是刘志丹同志的弟弟刘景范同志。这样，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又调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并任建设厅机关党支部书记，主管农业；刘景范同志主管工业和商业。建设厅下设公路局、农业科和工业科，公路局局长为谢怀德同志，农业科由我分管，工业科由刘景范同志分管。

那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开展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建设，但由于经验不多，过于追求正规，在一些问题上要求过严，有些制度施行得过早，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很可能要伤害一部分干部。比如，有一次边区政府召开大会，主要内容是财务制度走向正规。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辰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在我们财会的单据中，有不少是白条子，而白条子是不算数的，不合法的。我们要把以前的白条子清出来，查一查。我们还要挖上三个窑洞，每个关十个人，把那些违法的人都关起来审查。讲完之后，下面的人都鸦雀无声。这时，我站起来说，我来讲几句。这个白条子以前是为革命立了功的，以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红军在地方吃饭要给养，我们干部外出开会工作吃饭，

都是凭一张白条子。我们写白条子都是凭党性，凭觉悟。再说当时我们也不懂什么两联单的，待大家都弄懂了，都会自觉遵守的，怎么可以把以前的白条子说成是有问题不合法呢？事情的发展都有个历史过程嘛。要走正规化的道路，首先要使大家明白如何才叫正规，要和以前画清界线。我的话讲完之后，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还听见有人在问：“这个人是谁啊？”有人讲：“这是中央红军里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噢，怪不得他敢讲。”后来，对以前的白条子事件，再没有人提起过了，那些准备关人的窑洞也一个都没有挖。

事后不久，边区政府又组织了一个检查团，检查边区政府的教育工作，检查团的团长是徐特立同志，徐老特意叫我陪他一起深入基层。我和徐老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很熟悉。那时他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那时的政权建设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我们云集区也是一样，在大一点的村子里都办有列宁小学，学龄儿童大多进了学校。学校还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云集区儿童团的革命歌曲唱得很好。每逢中央和政府有大型活动，我们区都组织少年儿童去祝贺，他们的歌声使整个会场都活跃起来。由于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比较好，教育部评我区为教育模范区，徐老也经常到我区来检查工作。徐老生活朴素，待人谦和，和我很谈得来。后来到延安时，徐老又任边区政府的教育部长，我们来往很多。徐老除了生活艰苦朴素外，对同志也非常关心。这次我陪他外出检查工作，他的牲口经常都给随员骑，而自己走路。我劝他还是骑上吧，都这样大的年龄啦，他笑着说：“还是走走好。”徐老在外面吃饭，总是要求不要浪费，力求简朴，一般都吃小米饭，外出带的行李则只有一床被子，睡觉时从中间折一下，一边垫另一边则盖。我见徐老这样大的年龄，生活如此简朴，非常过意不去，就问他的警卫员：“徐老连垫被都没有吗？”警卫员说：“有，

但徐老见别人有困难，就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人家，垫被、被子、衣服都不知送给别人多少，他的津贴也是经常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志。”徐老对自己这样马虎，对同志却如此体贴关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他的行为是我要永远学习的楷模。

由于陕甘宁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这里成了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再加上由于和国民党政府搞了统一战线，国民党一九三八年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还不严，所以，每天都有人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当时，对有一些文化的同志，基本上都分在抗大或女子大学学习，七八个月后分配工作。其中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因没有文化，就不太好分配了，但他们都有农业方面的实践经验。还有一小部分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还在那里等待分配，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着急的。

我们陕甘宁边区有这样一个特点，地域不小，可开垦的耕地不多。就拿延安来说吧，出城三十里就是荒山，当地的耕作也比较落后。可当时陕甘宁驻扎的军队和各级政权那样多人，物资和粮食供应都十分紧张。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向边区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当时我们建设厅还有一部分从广东、山西、浙江、山东、四川、河南、陕西等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二十多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学的都是农林方面的专业，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要求把这些知识分子和那些目前暂不好分配的工农同志都安排到农业学校来。报告很快得到了边区政府的批准，并决定由我兼校长。农业学校坐落在延安城南三十里铺，在那里我们开垦荒山，栽种了很多农作物和果树，有粮食、蔬菜瓜果，还养了很多猪和牛；除了自己吃以外，还有不少富余，我们就把它交到边区政府，谷草则卖给当地的骡马大店，这项收入比谷子还多。就这样，除了解决我们自己的衣食以外，还解决了一部分边区政府的给养。有一次我到毛主席

那里，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做法。主席听了以后很高兴，表扬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就写了“手拿锄头，面向荒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国民党对我们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我们都非常困难，毛主席也曾讲过这样的话，国民党封锁我们，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解散，大家不赞成，饿死，也不愿意，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毛主席就题写了上述题词。

一九三九年秋天，边区政府派我到陇东征收这一年的公粮。这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我们要一个县一个县地核对征收公粮的数字，并组织调运，一搞就是两个来月。到了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又收到了边区政府的来电，要我暂缓回延安。这样，我留在陇东过了一个春节。春节后不久，我接到命令，让我担任新成立的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兼任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三八五旅的旅长王维舟同志任专员，下辖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

陇东这个地方是个比较富庶的，沃野千里，地势平坦，盛产小麦，群众称之为“八百里秦川顶不上董志原边”，是个屯粮养兵的好地方。陇东行署成立后驻庆阳城，和庆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的职能机构即是行署的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上任后，我按老习惯，先了解这里驻军的情况，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有个经验，那就是要关心部队的同志，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因为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都要依靠他们。我到三八五旅后，他们向我反映吃不饱，这个问题几年都没有得到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通过进一步了解后才发现症结所在。

原来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对部队和机关的粮食供应，都制定了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以西北的特产小米为基础制定的。陇东产小麦，不产小米，所以部队的粮食是供应面粉。面粉是细粮，不经吃，如一个

人一个月吃四十五斤小米够的话，那供应同样数量的面粉就不够吃了。后来我深入到连队，想找出如按面粉供应的话，到底供应多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我找到了这个比例数：1:1.4，即一斗小米折算成一斗四升小麦。怎么办呢？标准是上级制定的，我们无权更改，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部队的同志还要继续饿肚子。我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标准既然是人制定出来的，那么完全可以视情况的不同而改变，这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吃饱。我打定主意要按我所掌握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我的想法写成报告上报边区政府，等了一段时间上级也没来电答复。于是我果断决定，按一斗小米折算一斗四升小麦的标准来解决这个困扰大家几年的难题。同时我们征粮也按这个新标准执行。新标准实行后，部队和地方的同志都很高兴，并沿袭下来。

一九四〇年八月，庆环行署与陇东行署合并，成立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我没有任职。当时边区政府的电报是留我以边区代表的身份驻陇东地区征粮。这样，我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二月，把征粮任务全部完成之后才回到延安。

回延安后，当时的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找我谈话，说我的身体不太好，目前暂不分配工作，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而我则非常想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因为我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都很低，通过前一段的工作，我更体会到文化低的人担任领导工作，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为此，我经常连觉也睡不着。现在有了这样的条件和机会，我不能放过。于是，我便对高自立同志讲：“只要你同意，我还是有地方去的，我可以到党校去学习嘛。”

然后，我又到毛主席的住处去见毛主席。我对主席说我从陇东回来了，主席笑着回答说回来了就好嘛。我提出我想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主席听了很高兴，说学习好哇，这个想法好得很嘛。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把见到毛主席和与主席谈话的内容都告诉

了高自立代主席，便回家做学习前的准备。过了几天，我正巧碰到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同志，他一见到我就说：“瑞金佬，你现在没有工作了，我也没有工作了，你打算干啥啊？”我说：“我准备到党校去学习。”邓发说：“现在不行。这期的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正在做总结，要学习也要等下一期开学后才行。”我说：“那好嘛，我先在家里自己学习一点东西吧，做个准备。”邓发说：“这样也好。”那时候，邓发同志也正好接到命令，已调离中央党校另行分配工作。由于我也没有分配工作，便在家等待党校开学。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正式编为党校的学员。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整顿党的风气。这次整风主要是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我们还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审查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就讲清楚，不是肃反，等等。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知识分子还不如大师傅，大师傅会杀猪，而这些人则只会吃肉。对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听得非常认真，由于文化水平太低，我不会做笔记，但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比如主席讲的那些关于知识分子不如大师傅的话，我当时不理解，后来通过学习，才知道那是指王明及其他的那些追随者的，并不是指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我走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毛主席问我，你也在党校学习了？我说是。毛主席又问，我刚才讲的话你听了没有？我说，听了，只是我文化水平低，用笔记不下来，但我尽量用脑子记住。毛主席说，以后开始学习就好了。

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是毛主席兼任，彭真任教育长（后为副校长兼教育长），下设校务部（主要管行政事务和生活），教务部（主要管学习），在教务部下面还设有总支委员会，下面有十多个支部，每

个支部有书记、学习干事、生活干事各一人，所有的学员都编在支部里，每个支部下面还有七到八个学习小组。学习开始时我编在第十一支部。当时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所有的学员都住在党校里，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但要经过支部批准。

那时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党校如此，延安也是一样。我记得当时贺龙同志担任延安联防司令部的司令员，他宣布了一条规定：所有的军队指战员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外出时都要扎皮带和绑腿。有一次我在家度周末，星期一回党校去，因为我没有皮带绑腿，所以没有按规定着装。回党校的路还没有走到一半，就被几个执勤的同志拦住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扎皮带和打绑腿？”我说：“皮带没有了，绑腿也早就坏了，以后没发过。”他们又问：“你是哪个部门的？”我说：“我是党校一部的。”其中有个同志讲：“算了，让他走吧。”其余的人不同意，就把我带到联防司令部去。到了联防司令部，正好碰到贺龙同志。那几个人就把刚才的情况向贺龙同志进行了汇报。贺龙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中央党校。”“听口音你是江西人吧。”“是，我是江西瑞金人。”贺龙同志一听我是瑞金人，就叫我坐下，问我以前是搞什么工作的，我把自己以前的经历告诉了贺龙。贺龙同志很高兴，吩咐警卫员煮大米饭，弄腊肉、香肠、鸡蛋，留我在那里吃饭。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后带部队走到瑞金，在瑞金加入共产党的，所以对我这个瑞金籍的人非常热情。我在贺龙同志处吃完饭后坐了一会儿，就回党校去了。

不久，总支委通知我去一趟，说是有要事。我去以后，总支负责人对我说，按毛主席的指示，经总支委同意，发给你一张中央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以便出入驻延安的各级党、政、军机关。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要知道，这是党对你完全的信任，望你要妥加保管，严防丢失。我当时感到重任在肩，因为在延安，能持有这种特别通行证的人

是非常少的。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学习和工作搞好，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在党校学习，一九四二年主要是以学习为主，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我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不要说思想上进步了，理论上提高了，我最感到高兴的，是自己可以做笔记了，尽管记得还很慢，但和以前相比，这已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到了一九四三年，就开始审查干部了，当时称之为“抢救”。我记得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次审查干部，有什么问题自己谈清楚，不是肃反，不能搞逼供讯那一套。毛主席以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也讲过，最无能的人才搞逼供讯那一套，有问题的人你打他有什么用？没有问题的人你打他还不是乱讲一气。当时中央还有这样一条规定，领导作的结论不算，一定要在小组会通过后的结论才算数。审查的顺序是：先个人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然后小组成员集体讨论，对有疑问或交代不清的地方进行询问，最后由小组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后上报总支。

当时有这样一件事，我正好在十一支部任小组长。一九四二年的上半年，陈正人同志在中央西北局任组织部长，当时西北局书记高岗规定不准他自由行动，让他交待问题。陈正人同志的爱人彭儒同志正好编在我们小组学习，我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星期六下午，她请假回家度周末，我又不知道陈正人同志的事，于是就准了她的假。高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怕他们“串供”，打电话给彭真，在电话里哇哇叫，说我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后来这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当时没吭声。没几天，也没有宣布撤销我的组长，就又派了一个组长来。没过多久，支部又要叫我当组长，我坚决不同意，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还是你当吧。我问他：“我这个组长不是撤掉了吗？”他说：“没有哇，谁宣布撤了？只不过是另派了一个组

长来。”我说：“有组长就行嘛。”于是坚决推辞。

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我们开始学习路线斗争的有关文件，并正式开始审查干部，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五年“七大”前才正式结束。

这时，我由十一支部调到六支部，仍担任组长。由于组长的担子比较重，要给被审查的人作结论，所以，我担负此项工作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搞不好，特别是我们组有很多资深位高的干部。如：原七军团政委乐绍华；原一军团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陈光；原五军团政委、后任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刘志丹、谢子长一起革命的老同志、后任陕甘宁边区常驻议员崔田夫；河南省的一个地委书记王国华，石家庄地区来的两位七大代表；还有一位是陕北的老同志。连我一共是九个人为一组。朱瑞是我们六支部的支部书记，编在我们小组参加学习。那个时候，我经常为这些事愁得连觉都睡不好。但既然已经担负了这项工作，就要尽力把工作干好，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当时审查干部，毛主席在作动员时就已经讲过，不是肃反，不搞逼供讯，大部分人不抓，一个人不杀，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过“左”的行为还是时有出现的。比方说，整风刚开始的时候，就传说河南的省委是假的，对那些被审查的人，所采取的方法就是逼供讯那一套。他们把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郭晓棠、宣传部长郭一清都抓了起来，吊在党校戏台的两侧。郭晓棠还被别人打了几个嘴巴，把眼镜都打掉了，很长时间没有配上，走路都非常困难。

但是，我对这次整风中的审查干部工作，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进行的。我还在十一支部当组长时，曾对一个干部进行审查，我采取的方式方法得到校部和毛主席的称赞。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小组有一位学员是湘鄂赣省的保卫局长，叫王生，学习时的名字叫李明秋，别人都称他为“屠夫”，在肃反时曾有过极“左”的

表现。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有一次，这个人到某地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化装回来，身上穿着一件长衫，提着草篮，拿着把雨伞，走到敌人的岗哨前被检查时，让敌人从草篮中查出了两发子弹。于是，李明秋被当成特级要犯突击审查。因为受刑不过，最后终于变节，并答应给敌人提供情报。这次他作为七大代表来延安，编在我们小组参加整风，我们对他的交待材料有疑问，因他交待曾被敌人拘留过几个小时，作为要犯特级审查，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敌人轻易放掉的。因此，我就向其他湘鄂赣来的同志调查，才知道他在根据地时被人称之为“屠夫”，是个很有经验很厉害的人物。于是，支部进行研究，认为这个人对审查有经验，会对付审问，我们只能采取攻心政策，对他启发教育，让他自己把问题讲出来。组织上和他谈了一个多月，他还是没有讲。我想，对这样的人要有耐心，不能逼得太急了。后来，我就经常晚上约他出来，到河畔谈心，谈了很多次，反复向他交待党的政策。李明秋终于被感动了。一天下午，他主动约我到河畔去，要向我交待一些事情。我应约去了，一见面他就哭了一顿，然后交待：那次是到郴州去执行任务，回来时被查出了子弹，由于敌人采用了残酷的刑罚拷打他，因为受刑不过，终于向敌人变节了，并且答应给国民党提供情报。我问他：“环境那样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带子弹在身上？”他说：“因为子弹太缺了，所以外出时买了两颗。”我又问：“你答应给国民党当特务，提供过什么情报没有？”他说：“以前没有，这次来延安开会，国民党派了两个人来，把我的学习资料抄了两份走。”我讲了一些鼓励他的话之后，回来便向支部汇报了上述情况。因为查出了问题，李明秋调到临时支部去了。临时支部负责人是耿飏同志，调到那里去的人多半是被查出了问题的。由于李明秋主动交待了问题，根据问题的实质和他的态度，最后对李明秋的处理只是取消了他的“七大”代表资格。李明秋后来在东北战场上牺牲

了，用他的鲜血洗净了这一历史污点。这种不搞逼供讯，而是通过交待政策，耐心帮助，用启发教育来使人觉悟的方法，得到了校部的表扬和毛主席的称赞。

自我调到六支部后，我感觉工作比较难开展了。我身为组长，本身的工作难度就大，另外在组员中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干部，他们无论资历、水平、职务都比我高，对他们的历史如何审查呢？怎样才能做到既审查清历史，又团结好同志呢？为此事我日夜焦虑，愁得我真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比如对朱瑞同志的审查，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朱瑞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宁都暴动的领导者之一，红军时期任五军团政委，后调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他的资历深、名望大、地位高，口才也很好。他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侃侃而谈，说了几天，可就是没有谈到这次整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坚持王明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整风的目的，是总结和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清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同志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使全党同志能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上来，以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可是，身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个六支部的支部书记，几天来却闭口不谈对党内斗争的认识，不谈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认为这样不正常。于是，在朱瑞同志讲了几天历史后，我开始说话了：“我现在以一个小组的普通成员身份发言。朱瑞同志说了几天，总的讲，谈得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谈到，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朱瑞听我这么一说，顿时暴跳起来，说：“唉，你这个同志怎么可以这样提问题啊？”我说：“我就

是要这样提问题，因为你始终都在回避这个问题。”朱瑞没想到我这个文化这样低的人会提如此尖锐的问题，他非常生气，不假思索便回答说：“我认毛主席不到，我只同恩来同志熟。”听他这样一讲，我很生气。但我强按住火气，说：“行了，你的思想观点已经暴露了嘛。”

这时，陈光同志“砰”的一声用拳头猛捶桌子，大声说：“胡说八道！你身为五军团政委，后来又当过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你能认不到毛主席？明摆着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乐绍华同志接着说：“撒谎！你说你不认识毛主席，这显然是撒谎！你是高级干部，是红军高级指挥员，那时毛主席是红军的前委书记，难道你从来不给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吗？你从不参加党内和军内的高级会议吗？”崔田夫、王国华和其他同志都你一言、我一语，批评朱瑞同志的这种错误态度，强烈要求他作出深刻检查。我们同一支部其他小组的同志，都纷纷来到我们小组，旁听我们的会议，大家都要求撤掉朱瑞同志的支部书记职务。可能是考虑挽救他吧，党校没有撤掉朱瑞同志的职务，最后，他不得不重新检讨，较为深刻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和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并表明自己拥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态度还算诚恳。最后，他的历史也终于通过了。

当时的延安整风，很多高级干部都讲了自己的历史。我记得周恩来同志讲的那天，上午他坐飞机从重庆来，下午就到中央大礼堂去讲话，当时在坐的只有约两百多名党内高级干部，我也去旁听了。周恩来同志一开始就讲：“延安整风搞得很好，挽救了许多同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说到这，稍停顿了一下。）我过去对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又停顿了一会）是彻头彻尾的错了。”然后又讲了一个多钟头，态度诚恳，历史交待得清清楚楚，认识也非常深刻，在场的同志都非常安静。周恩来同志讲完之后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他的发言就被一致

通过了。

延安整风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它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通过这次整风，我认识到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认识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的危害，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办事，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十四 迎接胜利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延安整风结束。

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情绪格外高昂，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原定是一九三九年召开的，因为那时党内的思想斗争还很激烈，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在党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所以，决定先在党内进行整风，在全党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再召开“七大”。

我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习之后，便回到边区政府参加党代会。这次党代会还选举了参加“七大”的代表，我也被选为出席“七大”的候补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

任弼时同志主持开幕式，毛主席致开幕词。在以后的大会里，毛主席以及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都作了报告。这次大会前后共开了一个月。大会以后，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因为我是候补代表，没有表决权，所以只参加选举大会，没有参加大会投票。

“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通过整风，党员的素质提高了，是非问题辨清了。“七大”是我党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这一胜利的到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军民共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在街道两旁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平时是分厘都要计较的，而那天却格外大方，纷纷招呼来往行人，请他们随便吃，不收钱。

不久，我接到边区政府的命令，让我重回陇东，任陇东专署副专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原专员马锡五同志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高级法院院长，我被任命为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就在我从延安到陇东上任的路上，毛主席正好启程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看见毛主席乘坐的飞机由北向南飞去。到陇东后，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后来，毛主席平安回到延安，我非常高兴，在专署还开了一个庆祝会，庆祝毛主席平安归来。

当时在陇东，由于经费紧张，我们专署的国民经济部下设了百货店、饭馆和旅社。日本人投降后，各种货物价格纷纷下降。这时，从西安来了个大商人，此人是个花花公子，原定到三边去做买卖的，可是到了庆阳就不走了，把所有的货物都托我们的百货商店给卖掉，并定了价，随后，他便到西峰镇去玩去了。接到这些货后，商店经理来请示我，说是要把这些货赶快出手。由于前段时间物价降得过快，我分析过不了多久还要回升的，而我们专署的经费又不多，工作人员已有几年都没有领过津贴了。于是我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处理这些货。不久，物价果然开始回升，等升到一定程度，我们赶快把那批货卖掉，结果一下子居然赚了近万元，比那个商人赚得还多。我们专署就是靠

这笔钱，将近维持了两年。

一九四六年，中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并把我们陇东的庆阳作为试点。中央派了康生、陈伯达、浦安修三人带领工作组，来到陇东主持试点工作。试点选在庆阳的白马铺，把当地两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并培养了一些土改干部。

这时，形势又开始紧张了。蒋介石已经挑起了内战，驻扎在西北的胡宗南部队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陇东地区就驻扎着胡宗南的十几个旅。一九四七年五月，我被调回边区政府做战争动员工作。这年夏天，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我和边区政府、西北局一道撒往山西省临县的汲口。

这次撤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没有和我们一起撤，仍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在青阳岔一带打游击。我非常担心毛主席的安全，但我也坚信，毛主席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继续留在陕北，那我们就一定能打回陕甘宁去。

果然，这年的秋冬之际，我们收复了延安。这时，边区政府正准备迁回延安。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已经转入战略反攻了。

在陕北乃至全国，我们之所以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和全面进攻，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消灭敌人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我记得毛主席在说明这个问题时，伸出五个指头比划着说：“这五个指头，你弄伤了它，还可以治疗、休整、恢复。如果一个个斩掉它，斩一个就会少一个。”这次胡宗南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来作战的。我们在青化砭消灭他一个旅，在羊马河消灭他一个旅，在蟠龙消灭他一个旅，在沙家店消灭他三个旅，在清涧消灭他一个旅，在宜川消灭他三个旅，重创了胡宗南匪帮。胡宗南损失惨重，带着余部逃回了西安。

这时的形势已经开始转为对我们有利，战略反攻、解放全国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号召，要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同志作好思想准备，积极配合大军作战，并希望我们主动要求到南方去工作。

看到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便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要求，让他批准我回南方去。林伯渠同志给我做了许多工作，说这里也非常需要人，而我对边区政府的情况又比较熟，但看到我态度异常坚决，最后只好同意我离开边区政府，并把我的要求报告了中央。

当时是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因为毛主席没有东渡黄河，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刘少奇同志批准了我的要求。这样，在一九四七年初冬，我调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总部又在一起了。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被临时分配在中央办的土改训练班。训练班住在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四五个月后，中央迁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我在训练班的学习结束后，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亦迁往平山县小米峪村，住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准备南下江西。这里离西柏坡非常近，只有几里路。有一天，我正在休息，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来看望我们。那时天气很热，我只穿着一件内衣。我见朱总司令一行人进了我的房间，就赶紧穿上衣服。朱老总忙说：“用不着，用不着。”接着，他又说是来看我们的，了解一下生活怎么样。我说：“还好，伙食很好。”

当时，汪雨湘老先生一家、张暑时一家及不少老同志都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待命了半年多，等待形势发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们又迁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然后，我就随着大军，踏上了南去的征途。

走到郑州，我们停下来了，在郑州附近的小豫州过了春节，便向

中原人民政府驻地开封进发。在中原政府我正巧又碰到了当时任中原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同志。我和邓子恢同志从前在中央苏区就很熟，他见我就问：“开铨同志，你来了，你到哪里去啊？”我说：“我回江西工作。”他说：“你是否暂时不要去了，留下来帮我安置淮海战役受伤的五万多伤残军人。”

我当时感到挺为难，因为中央派我回江西工作，没想到半途中出了这件事。邓子恢见我面有难色，就给我讲了留下我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军急于过江，解放全中国，但各个部队的领导都对这五万多伤残军人很不放心。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同志得不到妥善安排，一方面影响党和政府的声誉，另一方面还会严重影响军心。但要安排这样的人，我们的条件又很差，的确也是一件棘手的事，需要一个有经验有影响的老同志。听邓子恢同志这样讲，我也作了一番思考。我想，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全面失败已成定局。我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像秋风扫落叶般的由北到南横扫国民党军队，只要渡过长江，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但是，如果这五万多伤残军人得不到妥善安排，势必拖住大军渡江南下的步伐，全国的解放也可能为此而推迟。这是一项艰巨而又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任务，我绝不能推辞。于是，我决定留下任中原人民政府荣誉军人管理处的处长。

当时的工作多么难做啊，主要是条件太差，粮食、运输工具和住宿条件都得不到保证，而伤残军人又需要相应地吃好、住好一点。那时吃的主要是小米稀饭，睡觉不要说床铺，就连床板和麦秸都少得可怜。原来我有一个计划，每天安排五百人，主要是送他们返回原籍，但交通工具根本就不够用。有不少伤残军人因为太痛苦了，有的骂，有的哭，那种场面实在是令人难受，我都禁不住流泪。怎么办？除了积极想办法外，稳定这些伤残军人的思想也很重要。于是，一方面我

经常深入伤残军人当中，给他们讲传统，讲红军长征时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另一方面，我多次找邓子恢同志，希望他协助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紧急调运大米，保证伤残军人吃好；第二，尽可能地改善住宿条件；第三，增加交通工具。邓子恢同志动员了中原政府的各种力量，再加上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我也记不清有多少餐饭没有吃过，那时经常是上午九点钟送一批人坐火车走，十点钟又要接一火车人来，天刚亮就要安排车辆、医护人员、担架员，把伤残军人从各个地方集中送到火车站上车，接着就要安排来的人吃住，等一切差不多就绪了，都已经是下午了。就这样，每天我都早起晚睡，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妥善地安排了这些伤残军人。

安置工作完成之后，我了解到江西已经解放了，并且还了解到从北方南下江西的火车多半是经京沪线走的，于是，我赶紧向邓子恢同志辞行，先赶到徐州，后到蚌埠，终于赶上了南下江西的火车。就这样，我登上这趟火车，向我的故乡江西前进了。

在南下的列车上，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全国解放眼看就要实现了，我们浴血奋战二十多年的夙愿，眼看就要实现了，这叫我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我参加革命二十余年，跟随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经历过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眼看见我们的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和斗争经历，并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革命要取得胜利，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的指引。而总结到具体问题上，则是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延安时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我在延安时期多次学过。延安整风期间，这篇文章还作为必学的整风文件，曾反复地学习讨论过，所以对毛主席的上述论断，我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以后的实践

也充分证明：正是凭着这三大法宝，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打败了由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并已经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全面失败已成定局，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即将被彻底推翻，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就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十五 回江西工作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到达了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故乡。

虽然我是江西人，但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南昌。参加革命以前，由于家庭贫困，我没有那样的条件和机会，参加革命以后，南昌是国统区，不可能前来，后来又在北方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江西解放了，我以主人的身份回来了，回到了江西省的首府、打响八一起义的英雄城，我的心情是难以述说的。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南征北战，戎马半生，现在革命终于胜利了，我也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我要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七月，省委派我接管上饶。那时，江西的北部和中部都解放了，赣南尚未解放。杨勇、苏振华同志率五兵团在上饶一带，陈赓同志率四兵团在吉安一带。我到上饶后，杨勇和苏振华同志请我在那里吃了一餐饭。长征时苏振华同志是我们十二团的政委，过草地的时候还救过我的命。现在全国解放在即，我们能在江西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在上饶工作了一个星期，组织上又找我谈话，准备派我到景德镇去工作。这时，赣南已经解放了，中央知道我是瑞金人，决定派我到瑞金专署去当专员。对这一任命我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家乡工

作了。

接到任命后，我便取道吉安前往赣州。在吉安，我又见到陈赓同志。我和陈赓同志是在延安时认识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便听到过他的一些传说。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编在一个桌上吃饭。他这人非常风趣、诙谐，常和周围的同志开玩笑，吃饭时总把好菜放在自己跟前，同桌的其他同志都不和他争，到别的桌上去吃，我则留下了，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走啊？”我说：“我才不走呢，六个人的菜你也吃不完，我就和你做伴，一起吃。”就这样，我们便熟悉了。“七大”以后，我们再没见过，没想到四年后我们又在江西见面了。他还是那个老样子，风风火火的。得知我分配来江西工作后，他说：“你们是怎么搞的，给我的部队奖励这样少？”我了解了一下，其他兵团多半都是十六七万人，每当解放一个地方，当地都要准备慰问品，来慰问解放军将士。江西是按其他兵团的人数给四兵团送的慰问品，但没料到四兵团有二十五万人，所以陈赓同志不满意。我把情况转告了省委后，因公务在身，我告别了陈赓同志，赶到瑞金。

任命我为专员的布告已先于我到瑞金就贴出去了，瑞金的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官僚都怕得要死，他们纷纷说道：“朱阎王回来了，这下可不得了啦！”

离我的家乡合龙松山村一里来路，有个村庄叫溪头村，在苏区开展查田运动时，是由罗竞瑞同志率中央工作团在那里主持搞运动的，后来杀了这个村庄上的十八个地主和赌棍。红军长征后，这笔账算到了我的身上。有一天，这个村庄上的一些人准备报复，要上我家来闹事。这个村庄上有个叫杨世遇的人，是个富农，在杨姓家族中辈分很高，红军长征时把他征为挑夫，后来我在红章纵队处理挑夫问题，在贵州放他回来了。这时，他就站出来讲话了：“不要去了，仇是报不完的，那个人在红军中还很有权，将来回来了不得了。”那些人说：

“准备他回来杀掉我们全村人？”杨世遇说：“全村人是不会杀的，但你们这些人是要处理的。”后来，这些人被他们的家里人拉回去了。这次，我的任命布告贴出来后，杨世遇对村里人讲：“你看，他果然回来了，还当了大官。当初要不是我阻止你们，你们现在就要倒霉了！”

到瑞金后，我先回到我的故乡松山村。一九三六年我还在陕甘省的时候，曾托斯诺发过一封给家里的信，这封信家里收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和家里又恢复了通信，大约是一九四七年通信关系才中断了。现在我终于回来了。青山不老，绿水常流。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自我长征以后，我家被国民党、反动民团三次抢掠，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几乎弄得一贫如洗，我的母亲也因贫病交加于一九四七年去世了。但现在的我不会是以前那个当农民的朱开铨了，决不会挟私愤而公报私仇，我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管好这一方。

由于瑞金县城较小，可供机关用的房子又不多，把地委和行署放在这里，在百废待兴的瑞金城，瑞金地委和行署、军分区以及驻防部队，加上瑞金县委和县政府，共有工作人员五千多人，困难不少。为了让瑞金人民更好地休养生息，我们经研究后向省委报告，要求把地委和行署转移到宁都县。因为宁都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州府所在地，辖宁都、石城、瑞金。国民党统治时期宁都也是专署所在地，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些。省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报中南局批准，中南局又报到了中央，后来中央批准我们的要求。三个月后瑞金专区便更名为宁都专区，我任专员兼地区法院院长。

宁都地区原属中央苏区，是老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牺牲也很大。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但我却首先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被当地群众称为大快人心的事。

首先，依法公审了集反动官僚、恶霸地主、土匪头子为一身的黄镇中，并将其正法。

黄镇中是宁都长胜人，以前曾参加红军，并当了连级干部，后来叛变投敌。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想剿灭他，从一九三〇年便开始进攻他的老巢——翠微峰，但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攻下来，因为那个地方地势十分险要，红军又没有大炮等先进武器。红军长征后，黄镇中被国民党任命为专员，驻宁都，辖宁都、石城、瑞金、广昌、于都、会昌，在那一方鱼肉百姓。他的老家长胜，则成了他黄家的天下。黄镇中反动透顶，残忍成性，对革命刻骨仇恨，我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就是黄镇中带人去破坏的。江西解放后，他是蒋介石留下来的钉子，被封为豫章山游击司令，带着两千多人，又逃入翠微峰，并把势力扩充到南城、抚州一带，经常派人出来骚扰侵袭，暗害我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拔掉这一顽固的反动堡垒，我四野四十八军的一四四师和一个重炮营，对翠微峰发动了强攻，最后终于摧毁了这一反动堡垒，并活捉了黄镇中。公审的那天，我任审判长，周围七个县都派代表团来参加公审。最后黄镇中被判处死刑，处以枪决。枪决是我的警卫员执行的。枪决黄犯后，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把他的头都砸烂了。

其次，宣布把一九三〇年肃反扩大化错杀的“AB团”、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错杀的“社会民主党”追认为烈士，其家属都作烈属优待。

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都曾对我讲过，什么样的错误都能改正，但人被杀了就没法改了，因为人都不在了。我以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亲身经历过肃反，亲眼看到有多少出生入死的好同志，竟被错杀于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这一教训是惨痛的。怎么办？只有恢复他们的名誉，给他们的遗属以优待和照顾，给他们以温暖和安慰，这样，才可以反映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表明我们有勇气纠正自身的错误，

从而对广大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决定在当时反映非常强烈。

第三，创办烈士子弟学校。

我们这个地区是革命老区，为革命而捐躯的革命烈士为数不少。当年，这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为创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献身的。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但他们却长眠地下，再也不能和我们一道分享胜利的喜悦。那么，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应该更有权力享受这一胜利的果实。他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理应受到更好的教育。宁都烈士子弟学校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开办，由我担任校长，学校共接收了六百余名烈士子弟。

一九四九年冬天，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当时为了防止镇反扩大化，上级文件规定最多只能按总人口计算每百人逮捕三人，最多只能每百人杀一人。如没有血债的，则一人都不能杀。那时判处死刑地区法院就能批，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就要申报省里批了。

当时瑞金县有三十多万人口，按比例可以杀三千人，瑞金县报是报了不少要处死刑的，但我在审查材料时发现有的证据不足，有的不够判死刑的条件，我就要求法院的同志要严格控制，从严掌握，防止错杀和打击面过大。由于控制严格，瑞金县在镇反中最多杀了三百多名反革命分子。

结合镇反运动的成果，土改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接着又是“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七月份，“三反”结束，我被调回南昌，任省委委员（当时没有常委）、省民政厅厅长。

在民政厅工作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统计了全省的户口和人数，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充实的资料。

第二，统计了全省的烈军属人数，为更好地开展优抚工作打下了

基础。

第三，把各地区办的烈士子弟学校撤销，集中起来办了一所工农中学，所有烈士子弟学校的学生都转入工农中学。

第四，筹建革命烈士纪念堂和民政招待所，为缅怀革命先烈提供场所，为烈士军属和优抚对象提供食宿条件。

一九五四年，全国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灾害，我们民政部门的工作也非常忙，部署救灾措施和安排灾民的生活，我也经常乘船前往灾害最严重的地方视察。这时，中央内务部要求每个省派四至五人到北京去，开民政工作务虚会。在会上，内务部的领导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开得也很及时，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主监政，等等。”会议开了九天，不少人都说民主监政如何好，简报也都是一个调子，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会议第十天，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宣布会议开始，我就站起来第一个发言。我说：“这次会议很重要，我赞成，是很重要，但是不及时，要是早三四个月开就好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如何救灾的问题。说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主监政，我反对，这是错误的。宪法才公布多久，我们就搞什么民主监政。以前在延安我们搞民主监政，是监国民党的政，是监蒋介石独裁的政。现在我们监谁的政？难道监共产党的政？”我发言后，大家都不做声了。我的发言由江西省民政厅秘书李绍斌同志整理后，很快就被印成了简报，报到中央去了。谁知毛主席看过之后却说：好啦，这一下有对立面了，就派陈毅同志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天，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当时内务部归一办管）通知党员厅长到国务院开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当时陈毅同志任副总理兼一办主任。陈毅同志一进会场就问：“谁是朱开铨同志？”我站起来回答：“我。”“好，你坐下。”陈毅接着就说：“会开了九天，到第十天出来了不同的意见，好嘛。有人说，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主监

政，错了，你监谁的政？监共产党的政？监毛泽东的政？”接着，他狠狠地批评了内务部的领导。当时有两位从东北来的女同志表示支持内务部的意见，陈毅同志非常生气，说：“谁支持这种意见，就撤谁的职，在北京撤，不要回去再撤！”

当时，我们才取得全国政权不久，“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剿匪和土改都刚刚结束，抗美援朝也只取得初步的胜利。社会上，暗藏的敌特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妄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也虎视眈眈，一方面积极扶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一方面在太平洋上企图建立一个敌对新中国的包围圈，并最终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我们的经济建设才开始起步，面临的各种困难都很多，所以我们应该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这个民主监政，在那种时候提出来，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会造成不安定的局面，因此我才坚决反对。

一九五五年，江西省政法委员会要我协助省法院进行整顿，因为那里的工作秩序比较乱，工作也开展得不好。他们对我说，你是老同志，有工作经验，帮他们把工作搞上去。

我先后共去了两次，整顿都没有成功，但问题的症结搞清楚了。这就是院长没有担任实际的中心领导，领导权被一个副院长和一个刑事庭的庭长把持，所以工作很难开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省委找我谈话，决定让我去担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我表示不愿意接受。后来省人大开会，选举我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这样，我是不便于推辞的，我决定担任此项职务。我想，包公是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人，但至今老百姓都念念不忘，称他为“包青天”，他的传说还被编成戏剧和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只要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体察民情，法院的工作是能搞好的，我有这样的信心。

谁知我刚到法院上任，就被检查到患有糖尿病，于是我到上海就医，三个月后便好了。回来后我才知道，我在上海治病期间，法院只发我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要等我上班以后再发。而这一年天又热，小孩又有病，我家里的孩子又多，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但法院不理睬。我在上海治病三个月，法院不要说来人看我，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想，这个法院这样厉害，怪不得以前的两任院长都无法开展工作。

九月份我正式上班后，就开了一个党组扩大会，在会上我是这样讲的：法院的工作以前开展得不好，主要是院长的中心地位没有发挥，所以上下不团结，工作难以开展。我们的工作要走上正轨，就需要整顿。现在我宣布，我们法院以后的工作，主要由两个会议来决定，一是党组会，党组是法院的领导核心，党组书记是核心的核心，今后法院工作的方针大计和重要工作，都由党组会研究决定。党组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对重大问题如发生分歧要付表决。二是院务会，院务会处理日常工作，不付表决，由院长决定，各部门经办。鉴于以前的情况和教训，我提议那个副院长和那个刑事庭的庭长都不担任党组成员。在人事方面，把那些闹派性厉害的人调出法院。因为法院是审判机关，是代表人民执行法律的，对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俗话说人命关天，如果机构不纯，怎么能公正明察地审理案件呢？

在机构设置方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共设了民事和刑事两个审判庭。考虑到死刑案件事关重大，我们制定了一个规则：凡是报批判处死刑的案件，不管案子发生在什么地方，不管有多偏僻、多远，都要派一个三人组成的合议庭，到实地和犯人见面，还要了解犯人挨打没有，是不是受了逼供，此外，对受害人的家属也要进行调查，还要去察看受害人死后埋葬的地方。如果被告挨了打，或是受了逼供，我都不同意判处死刑，一般只判死缓。毛主席多次讲过：犯人犯了法你

打他有什么用？他不交待，只要证据确凿，也要算他的，挨了打以后交待的口供不可信。我们的这一规定宣布后，打骂犯人和对犯人实行逼供的情况，都明显减少了。

另外，我还在党组会上提出几条纪律，经党组会研究后作为规定实施。第一，和案件所涉及的人有亲属朋友关系的，都不能参加办案，要回避，这样才能使群众服气。第二，所有法院的同志都不能收别人送来的礼物，不准吃别人的东西，要实事求是地办案。如果做到了这些，就算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偏差，我们还可以换人重新搞过。如果收了礼，吃了东西，案子又搞错了，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待。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特别注意，并告诫家里人，不论什么人来送礼，一律不许接，正人先正己，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去管别人。第三，对判处死刑的权限，任何人都无权批准，一定要带回来报省政法领导小组研究后才能决定。对因反革命身份判处死刑的，我们也有个规定，即联保主任以上官职的才能杀，个别表现好的可以不杀，保长则一般都不杀。

说到判案子，以前我也有过教训。还是我在宁都地区当专员兼法院院长时，石城县报来一个案子，要求批死刑。案情大致是这样的：瑞金的一个原告到石城告状，说是石城的某人是反动地主，解放前杀了人，有血债。石城县县长是刚从部队下来的干部，简单地审判后便报到地区来，由于从材料上看判死刑的原因和依据都充分，我批准了执行死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起诬告。责任在谁呢？追究起责任显然已经晚了，人都已经处决了。为了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我们开会仔细地分析了办案的程序，为了分清责任，我们规定：今后的案子要是材料不准确而产生错案，由县法院和县长负责；如是量刑不准确，则由地区法院和我负责。另外，我还派人把那两个诬告的人逮捕法办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上庐山疗养。这时正好在山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的领导都到山上来了。我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大多数都有过接触，但与周总理却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周总理指挥红军作战，经常都不在瑞金。到陕北后，他又负责统一战线工作，长年都不在延安。一九三二年的宁都会议，将原来由毛主席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夺掉了，给了周总理。当时我非常想不通，而且本能的对那些夺毛主席权的人非常反感。后来在长征途中和到陕北以后，我都发现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接近，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总理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和政治路线。在这以后，我逐渐认识到周总理和王明路线上的那些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和毛主席一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党的领导人，中国革命正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才最终取得成功的。我一直都在盼望能有机会和总理接触一下，把我的思想和看法谈谈才好。

全会开了一段时间后休会，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拜访周总理。正巧总理外出不在，邓颖超同志接待了我。陪我坐了一会，周总理就回来了。见到总理后我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总理说：“你就是朱开铨同志啊！我早就听说过你，一直都想和你见个面，在一起谈谈。但由于工作忙，所以老是耽误。你今天来了这很好很好嘛。”我说：“您和毛主席一道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不断夺取胜利，并最后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我对您是很敬仰的，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到陕北后，我都见过您，但没有接触。”总理说：“大家都忙，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说：“总理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来延安，您带一百多武装红军从瓦窑堡到延安城和他见面，把蒋介石安排在东北军中的特务都吓得逃跑了。”总理说：“噢，这件事当时是很机密的，你都知道了，你

那时干什么工作啊？”我说：“我全都知道。我当时任陕甘宁省省委委员、省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并促成西安事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总理的功劳大得很啊！全国和世界人民都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予以很高的评价。当时我还以为会杀蒋介石呢，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些想不通，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处理是对的，我也逐渐想通了。”总理笑着说：“你对统一战线工作有认识嘛！”我说：“我以前对国民党的上、中、下层的统战工作都做过。”总理说：“我听毛主席谈过你，说你在中央苏区和到陕北后，都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这种作风好，要保持下去。”我说：“我一定按主席和总理要求的去做。”总理又问：“统一战线的局面形成后，工作是否要好做一点？”我说：“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央决定不再打土豪了，我们红军和各级组织的粮食供应都得不到保障。”总理说：“那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我说：“逼得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各个阶层都做深入的工作，发出号召：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后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总理说：“你做得对。一个负责干部，在关键时刻要能拿出主张和办法来。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我在总理那坐了两个多钟头才告辞，走的时候总理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并嘱咐我以后有机会再来。

一九六一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那时蒋介石又叫嚣要反攻大陆，上海等地监狱关押的一些犯人都疏散到内地，我们江西也接收了几万人。那一年，在劳改局所属的恒湖农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站岗的犯人被谋杀了，当时我们法院派了一个领导去处理这件事，结果因为主观武断，相信了农场的片面推测，把那个所谓的“杀人犯”处决了。后来，真正的凶手出来投案，这才知道是杀错了。事情汇报到我这里来，我一方面派人去上海，向那个被错杀的

人的家属赔礼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我召开全院大会，分析这次错杀的原因，并把那位同志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再三强调：办案要按规定呈报，要实事求是，要按法律的程序和要求办。正好，不久街上演《十五贯》的昆剧，我就让总务上安排包场，让大家都去看，受点教育，增加一点判案的知识。同志们反映挺好。

在以后的几年里，法院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办案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上级和我都比较满意。能使法院的工作走上正轨，走上制度化的路子真是不容易。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十六 十年动乱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和很多老同志一样，我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何在。我记得五月份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后来就发了个“五·一六”通知。江西省传达中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的是黄知真同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评《海瑞罢官》，好像是在文化领域中争论什么问题。然后就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使人感觉到我们党内有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机会主义路线了。大约在八、九月间，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毛主席还在北京检阅了几次红卫兵。那一年的“十·一”，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里，刘少奇等一批老同志的位置，是越排越后了。往常搞什么运动，都是中央先来文件在高级干部中传达，然后再逐级传达下去。这样，我们对中央的意图和目的都是清楚的。但这一次，内部没打招呼就在报纸和广播中大造舆论，并且调子越来越高，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公开，矛头所指已是非常清楚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江西也是一样。一夜之间，“炮打”“火烧”

“砸烂”省委省政府，打倒“走资派”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一直到基层生产队、学校、工厂的主要领导人，大多被扣上了一顶共同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由此受到了批斗和打击。

当时我是非常想不通的。我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有幸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能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在长征途中和到陕北以后，也经常得到毛主席的关心和教育。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毛主席的教导分不开的。我也一直以毛主席为楷模，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每一件事情，对毛主席的指示和毛泽东思想，我是坚信不疑的。可是现在，怎么连我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这些老同志，当年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置家人与自己的性命于不顾，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的是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为的是给亿万被压迫的人们争取一条解放的道路。我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怎么还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不懂，根本就弄不懂。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政府被造反派夺权了，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风暴”。以此为样板，全国又迅速掀起了一场夺权的浪潮。省法院的造反派们不甘落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社会上造反派的支持下，把法院的权力夺走了。党组和法院的印章，以及武器弹药都被抢劫一空。我被这些人剥夺了权力，只好待在家里。假如这样倒好了，尽管思想上不通，清闲自在的倒也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可我做梦都想不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呢。

造反派夺了权之后，就开始对付我们这些老同志了。这完全是和在中央窃取了权力的康生、陈伯达及“四人帮”等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看成是他们篡夺权力途中的最大障碍，定要置我们于死地。一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以前由于犯错

误而受到过组织处理的人，这时都异常活跃，纷纷跳出来猖獗地进行报复。他们组织什么“造反派”“战斗团”，“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却专门搞一些“打、砸、抢”和见不得人的勾当。对老同志和一些主持正义的同志实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我那时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也逃不掉厄运。不仅是我，连我的家里人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那是一九六七年初，我被造反派勒令交待“走资本主义道路”、“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家出身贫农，解放前受尽摧残，后来参加了革命，一直跟着毛主席走，从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对阶级敌人是镇压过，但从未镇压过革命群众，你们可以去查。”我的交待把他们惹火了，那个造反派头头叫道：“朱开铨，你不要再摆老资格了！”我说：“那就该你们摆了？”他们气急败坏，用拳头猛捶桌子，叫道：“朱开铨，老实告诉你，你的老本已经吃完了。”我反唇相讥道：“好嘛，那该你们吃了。”又把他们气得嗷嗷叫。然后，他们让我写交待材料。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写是不行的，那个时候到哪里说理去啊。于是，我把自己参加革命后的履历写了一遍，其中在中央苏区时任中央苏维埃主席团巡视员的那段历史，证明人我写的是毛主席。这一下把他们搞得难堪了，又把我叫去批判，问我为什么写毛主席是证明人。我说：“毛主席最清楚这段历史，不信你去调查。”法院的“造反派”在我的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串通勾结起来，企图借他们的手置我于死地。一九六七年二月，那时我的糖尿病很重，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造反派”不顾我的死活，把江西省团校的红卫兵引进省法院，对我实行武斗。我的两个女儿上前阻拦，法院的“造反派”和他们引进来的学生红卫兵即大打出手，把我的大女儿打昏在地，接着又把她拖出门外，导致她早产，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他们对我也是一样，拳打脚踢。

约四、五月间，“造反派”又逼我搬家，我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他们说住车库，我不同意。他们就动手往门外丢我的东西，强行逼我搬家。我的三儿子当时只有十三岁，上前制止那些人往外丢东西，他们便动手打我的孩子，我爱人罗培兰同志（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上前制止他们打孩子，他们就打她，朝她胸部猛打，直到现在都经常疼痛、咯血，把她右手一手指打断致残。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驻昌的省、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联合组织了全省有名的“五·三”大游斗，有一百多辆汽车，从省委书记、省长到下面的各级领导，都被押去游斗。这是一幕历史悲剧，是一场大劫难。那些“造反派”丧心病狂，不顾人的人格和尊严，硬逼着被参加游斗的人穿上各种服饰，有国民党军服，有花旗袍，有戏装等。有的人被剃成阴阳头，有的女同志被剃成光头，有的手拿铜锣，有的肩扛铁棍，有的腰挎日本指挥刀，有的头戴乌纱帽、日本军帽或几尺高的纸帽，还有拿破鞋的、端尿壶的、抱公鸡的等等。凡是能污辱人的东西和花样应有尽有。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吧。近千名“走资派”及其他坚持正义而被称之为“保皇党”的同志分乘这一百多辆汽车，环绕市区一圈，以体现“造反派”们的“丰功伟绩”。我早上六点多钟就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造反派”拉上了汽车，在上车之前还被他们拳打脚踢地打了一顿。看到这种场面，我的心在流血，我暗暗地想着：“毛主席知道这些事情吗？”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我的家被那些“造反派”抄了三十多次，先后抄走现金两千余元，凡是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洗劫一空。

更有甚者，这些人的目的是想把我整死。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在省高院的审判庭，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批斗会。除了省高院的“造反派”外，市中级人民法院、省政法干校、省团校、省农学院都

来人参加，其中省农学院的一个学生还带了枪来；我听见省高院的人叫他小肖，批斗会上，他们要我在写有“三反分子”的结论后面签名，我就加上了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三反分子”，然后签名。他们气得把纸条撕掉了。于是，三个农学院的学生和省高院的“造反派”，把我拉到办公室二楼会议室对面的小房间。我刚进门他们就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不知是谁在后面猛地推了我一掌，我跌倒在地上，有人在我后边丢下几条铁棍，在我身子右边丢下几根皮带，我还听见了子弹上膛的声音。这时，他们又把黑布解掉，仍要我在“三反分子”后签名，我依然在“三反分子”前面加上“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这几个字，然后再签上名字。于是，他们就又把我的眼睛蒙上黑布，只听见一梭子子弹从我的耳边擦过去。这时，省高院的“造反派”还很生气地叫：“再打！瞄准来打！瞄准来打！”我听见农学院那个姓肖的学生说：“不行，打死人要坐班房，我怕坐班房。”他说完之后，不知是谁又打了一梭子子弹。接着，他们又把我拳打脚踢了一顿，还恶狠狠地说：“这次没打死你也要把你整死。”又把我从楼上拉回审判庭批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的糖尿病越发严重了。对我的病情，那些“造反派”是很清楚的，但他们为达到把我整死的目的，组织人死死盯住我，常常借故不准我去看病拿药。有一次，我到省公费医疗门诊部去看病，刚要挂号，省高院的“造反派”带着四个省团校的红卫兵来抓我。他们首先动手把我抓住，并咬牙切齿地警告说：“今天就够你受了。”接着就把我揪到江西省政府办公大楼门口，并抬来上课用的大黑板，用一根很细的铁丝吊着挂在我的脖子上。他们还嫌黑板不够重，就用脚使劲踩黑板的边，结果把细铁丝都踩断了。后来，他们又把我推上汽车拉到省团校二楼进行拷打。

在那段时间，我白天受刑批斗，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着

那四壁空空、被抄得一片狼藉的家，我的心里很不平静，也很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难道也算是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变化，我是很注意的，每天晚上我都要收听广播。还是我在“集训队”的时候，有一次收听到了中央专案小组对刘少奇同志的审查结论，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听到这条消息，我的眼泪都禁不住流了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那时王明路线在党内占领导地位，他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实行残酷打击，在召开五中全会时，对毛主席进行围攻。毛主席非常憎恨王明路线，于是干脆不参加会议。这时，刘少奇同志挺身而出，与那些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毛主席，捍卫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到延安后，那时“左”倾机会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为了使全党紧密团结，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又是刘少奇同志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专用词，明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工作的指导方针，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破坏，又是刘少奇同志出来主持国家的恢复和调整大计，并使国民经济在短时期内迅速得以复苏。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刘少奇同志不仅不反对毛主席，而是处处维护毛主席，支持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我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们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劳都是很大的，怎么现在倒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像刘少奇同志这样的人都不能幸免，那我们不更像是被捆好了的牛羊任人宰割吗？这是怎么回事？我个人受点委屈并不要紧，我担心这样搞下去，我们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将要被断送。

在十年动乱期间，我的遭遇可以代表很多老同志的遭遇。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搞肉刑逼

供，结果多少忠诚的同志倒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延安整风期间也一度出现“左”的偏差，由于毛主席及时纠正，这些“左”的错误都很快改正过来了，虽给党带来一定的损失，可是时间都不长。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是我党的一次劫难，我国人民的一次劫难。别的不说，光说那时的一些教条主义的形式吧，“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是任何会议和活动的开场和结束都要敬祝的，早上是天天读、早敬，然后是午敬、晚敬，毛主席语录和画像无处不有，还有语录歌和忠字舞。对搞个人崇拜这一套，毛主席其实是很反感的，这在以前我和毛主席的接触中，曾听主席说过。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那套形式主义，其实是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成了教条。此外，对经济建设也是一场灾难，绝大部分工厂都停产或减产，人们都跑去“闹革命”去了。看到这种情况真是令人担忧啊，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还有在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所造成的灾难也是非常大的。每当我回忆起这十年的历史，我的心都在流血。个人的委曲算不了什么，可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还有这十年动乱留下的后遗症，却是难以估量的。

一九六八年，那些夺了权的“造反派”都忙于争名夺利打派仗，对我们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和激烈了。我和许多老同志都被赶到“集训队”去劳动了。劳动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参加革命以前，我就是农民，在农村种了多年田，说干农活，我还是在行的。“集训队”的劳动主要是种菜和管理果树。这个地方在新建县城以北，原是关押犯人的场所，离南昌市也不远，但是我们没有自由，别说回家，就是家里人来看我们，都要得到批准才能见面，和劳改犯人差不多。

在“集训队”劳动了半年多，一九六九年春天，我被宣布“解放”。此时此刻的心情，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时我参加革命已有四十多年，跟着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将整个中国都从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桎梏下解放了，可现在莫名其妙地还要被这些人来“解放”一次，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可能正是针对我们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心情吧，我们这批被宣布“解放”了的人，都集中在江西省团校办“学习班”，解决“三气”问题。这“三气”我记得是“怒气、怨气、不服气”，学习班办了半年便结束了，我才真正以自由身回到了家中。就在我们回家之前，“学习班”还找我们训话，说以前抓我们是对的，现在“解放”我们也是对的，我实在不懂这是什么逻辑。

还是在办“三气”学习班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我特意买了两只鸡，坐公共汽车到新建县的望城岗去看望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被下放来江西的事我早已知道，也很想去看他，但以前我也同样被“专了政”，没有活动的自由。我很清楚这样做是犯了“忌”，但从我的亲身体会中，我深知一个人在困境中，除了有坚定的信念之外，最想得到的就是精神上的安慰和理解。到了小平同志的住处后，小平同志让了座。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还好。接着他问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正在“解决三气学习班”学习。小平同志问我“三气”消了没有，我说不消也得消。这时，我发现在小平同志处的两个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我估计可能是监视小平同志的，于是很多话想说也不能说，只是扯了一些闲话，约一个小时后我就告辞了。

一九七一年秋天，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余积德同志的秘书来我家，让我收拾一下东西跟他走。我问：“我们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到向塘机场，到那里坐飞机去福建，韩司令员请你到那里去休养一段时间。”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就和我爱人、小儿子一起坐汽车到了向塘机场。韩先楚同志的爱人刘芝同志已经在那等我。她问了我一些目前的情况，我就把我受迫害的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吃了一餐饭就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到了福州。我们被安排下榻在一幢有温泉的别墅里，我们整理了一下行李，洗了一个温泉澡后准备休息，韩先楚同志就来看望我了。

我和韩先楚同志认识，是在陕甘宁，那时我任陕甘宁省省委委员、省政府党团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韩先楚同志是红七十八师师长，部队驻扎在我省所辖的豫旺县。我曾代表省委省政府去看他，慰问他的部队，以后彼此来往也比较多。延安整风期间，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们都同在第六支部参加学习和整风，朝夕相处。“七大”以后，我们便再也不曾见过面了。全国解放以后，他任福州部队司令员，只要来江西，一般都会抽时间来看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中断了，听说他也受到了冲击。真没想到在这种时候，他还想着我，接我出来散散心，并安排得如此周到细致，对这种诚挚的革命友情，我非常感激。

我和韩先楚同志谈了半个多钟头，主要是谈延安整风期间和在陕甘宁期间的事，其他问题都避而不谈。第二天，他又给我派了一辆专车，并指定专人负责我的食、宿、行，并每隔几天来看我一次。在那里我生活得非常愉快。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两年，我的身心都受到巨大的摧残，现在有这样好的休息条件，我的心情也开始好起来。

住了一个多月后，我的腹部开始隐隐作痛，经检查患了阑尾炎，于是住进了医院。由于我年龄大了，又患有多种疾病，医院决定实行药物治疗的保守疗法。那年的年底，新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省政法办公室主任陈昌奉同志来福州军区开会，特地到医院来看我。我说我已在福州住了两个来月，准备回去了。陈昌奉同志派人安排好了接送的问题，我便和韩先楚同志告别，坐火车回到了南昌。

回南昌后，我被安排到省政法办公室任副主任。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左”得很，工作很不好做。我记得当时有一件蛮难办的事情，就是省政法干校要恢复，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校址。后

来没有办法，准备把学校办到离南昌三十多公里远的石岗。消息传出来，大家都很不满意，要求把学校选在离市区较近的地方。这种要求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学校的教员和工作人员的家都在市区，学校远了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给这些同志增加了困难，但合适的地点又找不到，怎么办？政法办公室把这个难题交给我处理。我找到省建筑工程局的范飞局长，跟他谈，想把他们在青云谱的一处房产连地皮全买下来。我对他说，恢复政法干校非常要紧，但上级只拨给我们六十万元钱，这件事要请你们大力支持。他非常痛快，很快就答复了我。就这样，将这件棘手的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春节期间，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组成春节拥军慰问团，并决定让我担任鹰潭分团的分团长。春节前夕，我率慰问团来到鹰潭市，住在市革委会招待所。一天，我们刚从一个单位慰问完后回到招待所，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停了两辆省革委会的小车。我问工作人员是谁来了，他们都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我一走进接待室，就看见邓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以及他们的家人坐在那里，省里、上饶地区和鹰潭市连一个陪同人员都没有，场面十分冷淡。我赶快走过去向小平和卓琳同志打招呼，我说：“老首长，您好！”小平同志忙说：“你好。”卓琳同志插话说：“叫你老首长哇，你听到了没有。”小平同志说：“听到了。你现在干什么啊？”我说：“我是省春节拥军慰问团的分团长，到这里来慰问解放军的。”小平同志风趣地问：“那慰不慰问我啊？”我说：“当然要慰问，还要特别慰问呢。”小平同志笑了。看得出，此时小平同志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我又问道：“老首长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小平同志说：“中央决定我回中央去工作，到这里来是转车的。”我问他：“住下来了没有？”旁边招待所的人说：“我们没接到通知，再说这里都住满了，没有床位了。”我听后十分生气，就说：“我住的那间房空出来，慰问团的房子也空出两间

来。”这样，才算解决了他们的住宿问题。我见小平同志受到这样的对待，很为他抱不平，可在那种年代又有什么法子呢？省里、地区、市里对此事都视而不见，我绝不能不管，尽管我自己也刚“解放”不久，但小平同志的革命经历我是清楚的，我自己不是也曾蒙上许多的不白之冤吗？我把慰问团的慰问品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有山东的大枣、苹果、梨，上海的糖果，还有花生和瓜子，请小平同志一行人品尝。随后我又把招待所的负责人叫来，让他们把最好的菜预备好，我要办两桌酒席，款待邓小平同志。招待所的负责人和慰问团的其他人都很为难，说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我说：“你们都不用害怕，一切都由我来负责。邓小平同志一九三一年就是我的领导了，我还不应该招待吗？就用慰问团的名义招待好了。”

晚上，在招待所我为小平同志送行，搞了两桌很好的饭菜，我和慰问团的其他负责人作陪，可他们都勉强得很，也不说话，只管吃，显得很尴尬。我和小平同志却谈笑风生，他显得非常高兴，心情很好，话也很多。后来我问小平同志的火车票都办好了没有，他说他们一共九个人，只给了八张票。散席后，我又亲自到车站找负责人，增加了一张车票。第二天早上，我又准备了两桌饭，请他们吃完后亲自送他们上火车。小平同志在临行前对我说：“开铨同志，这次要谢谢你了。”我说：“以我现在的身份，也只能做这么多了，望老首长多多保重！”

到了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和我一起参加那次慰问团的两位副团长（都是江西名重一时的“造反派”，还是省革委会的委员）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说还乡团的总头目上台，江西的走资派是如何如何的高兴，并大办酒席为他送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如何称呼他，江西的走资派却亲密地称之为老首长，等等。后来，省政法办的某些投机者也趁机大做文章，开会时围攻我，

让我交待搞派性的“罪行”。我知道这些人是想邀功请赏，就质问他们我和谁是一派的，他们都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后来，上级还是把我省政法办副主任的职务撤掉了，我再次闲居家中。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我也从毛主席逝世的巨大悲痛中振作起来。我想，“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这场浩劫，给党和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啊。果然，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党中央就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然后，各项工作逐步开始走上正轨。

“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是要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要拨乱反正，还是一件比较艰巨的任务。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理论和思想上澄清了多年困惑人们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在农村实行改革。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又迅速把对内改革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方针推向全国并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的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形下，我又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前程。前途是光明的，但还要继续艰苦奋斗。

一九八二年，省委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到江西省政协当副主席，我接受了这一安排。

这时，我已是八十二岁的人了，这样大的年龄，身体状况又不怎么好，我能干些什么呢？以前，我做工作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跟着党和毛主席，勇往直前。但现在年龄这样大了，身体又不好，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趁目前还走得动，到赣南去一趟，到我踏上革命征途，并培养和哺育我成长的土地上去看看。这样，我到政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以前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老区去视察。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回到瑞金，看望了家乡的人民，了解了一下这里的工作，便来到会昌、安远的高排。长征前夕，我还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在苏区的南大门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险恶的形势，艰苦的环境，都没有动摇我的革命意志，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曾在这险恶的环境下坚持着斗争，并取得一系列胜利。长征以后，我已有近五十年没有回来了，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了？群众受到过国民党的摧残没有？这一直都是我牵肠挂肚的事。

来到高排，这里已是今非昔比了。首先，有公路直通，我坐汽车就一直坐到我当年打游击的地方。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的啊。我在这里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中有少数人是我当年在这里工作时就在的，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论年龄，这些人都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一位老婆婆说：“朱主任，当年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正好是八月初一（农历）。”我说：“你还记得这样清楚啊？”她说：“记得。朱主任来后，高排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你走后没几天，国民党就占领了这里。”我说：“革命老区的人民受苦了。你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他们说：“托共产党的福，现在生活很好。”

我在高排住了一天，便取道会昌、安远、宁都回南昌了。

一九八四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我办了离休手续，开始过离休生活了。

回忆我参加革命的经历，我有着很深刻的感受。我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文化水平又很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我曾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为此，我也曾日夜焦虑，生怕由于自己水平低，影响革命工作，给党带来损失。但是，有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为了党的事业，我不惜流血牺牲。正是由于这样，我才能克服种种困难，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直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十月和一九九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

院总理李鹏先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医院来看我，我看到两位革命先烈的后代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我就更放心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九九一年二月定稿

后记

这是一部开铨同志回忆参加革命六十六年亲身经历的书。一九八四年经中央批准离休后，他就着手这项工作，他用以往那种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四易其稿，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完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见这部回忆录的出版就与世长辞了。

在开铨同志的这部回忆录中，寄托了他对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寄托了他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也寄托了曾经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所有同志的革命战斗情谊。

此书的出版，得到中共江西省委的重视和支持，得到江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党史部门及遵义市、陇东地委党史办的支持和关注，得到许多曾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支持，也得到各级领导和曾为开铨同志回忆撰写本书的一些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罗培兰

一九九三年三月于南昌

再版后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在九十周年的光辉奋斗历程中，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带领全国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跨越式地大踏步前进。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在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拥有八千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的父亲朱开铨就是名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七卷，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江西瑞金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今年九月十八日是父亲朱开铨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八个年头了。在这十八年中，我们追寻着父亲的足迹，走遍了父亲战斗过的江西中央苏区和陕甘边区的山山水水；我们见到这些地方的

干部和乡亲们，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希望能得到《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一书，他们像谈论自己的亲人一样谈论着我们的父亲。每当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共同战斗的火热岁月，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父亲那慈爱而又严肃的面容。父亲的革命风范以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终身难忘。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次革命高潮转入低潮的严酷考验，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父亲在家乡瑞金参加农民协会，在激烈斗争中冲锋在前，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任区农民协会宣传委员，一九二六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地主和土豪劣绅组织反动武装靖卫团，父亲遭到敌人的追杀，被迫转移到山区。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由于党组织被破坏，父亲的党员身份无法得到证实，于是他又重新办理入党手续，投身创建以瑞金为红都的中央苏区的革命洪流，先后任瑞金云集区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父亲调到中革军委五局任特派员，坚定地跟随毛主席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终于到达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唯一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西北办事处，辖陕甘省、陕西省。此后，父亲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在担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宁省委常委、省苏党团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为保存和扩大这片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坚决排除“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在习仲勋同志任主席的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迅速筹建了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并率领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承担直罗镇战役的后勤保障，

先后完成了直罗镇战役和山城堡战役参战支前的艰巨任务。陕甘宁边区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挑起两次摩擦事件，形势万分紧急，父亲又受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派遣，任边区政府派驻陇东分区的代表，与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耿飏等同志一道，在陇东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了这块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父亲任陇东分区副专员、专员，领导军民开展土地改革和战争动员工作，为边区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父亲对毛主席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有亲身的感受，他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亲自培育成长起来的江西瑞金籍干部，当毛主席受“左”倾教条主义排斥打击最严重的时候，毛主席选调父亲到中央政府巡视团任巡视员，随同毛主席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言传身教，提高了政治、理论、军事水平；这就使父亲身上体现着求实朴实、艰苦奋斗的精神。无论是在中央苏区，或是在陕甘苏区，父亲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因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父亲从思想方法、领导艺术到工作实践都受到毛主席细心的指导和培育。在毛主席的亲自教导和培养下，父亲养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充分民主，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父亲一生经历过六次生命危险，竟有五次是革命队伍中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因此，父亲对于极“左”错误疾恶如仇，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没有犯过“左”倾错误。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毛主席得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陕甘边区开展错误“肃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大批忠诚干部错误关押，并已经杀害了不少优秀干部的情况下，立即派遣父亲到受“左”倾错误危害最为严重的陕甘边区主持陕甘省的工作，他命令张贴布告进行反“围剿”战争动员，制止违法错捕错杀、侵犯土地革命成果行为，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委派原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女干部罗培兰同志联络召集在外避难的干部归建，依法保护了受到错误肃反迫害的一批同志，及时稳定了党员、干部队伍，在理顺陕甘苏区干部群众的情绪后，排除左的干扰，亲自介绍马锡五同志入党，将原陕甘边区的党政军干部成建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的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陕甘苏区军民高唱着“千里雷声万里闪，中央红军到陕甘，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千家万户把门开，把咱亲人迎进来”的歌曲，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投身配合红一方面军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参战支前工作，为毛主席在陕甘省境内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在总结这一战役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这一阶段陕甘省的工作，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父亲圆满完成了接管、经营陕甘边区，供给中央党政机关、陕甘省境内驻军的任务，但他累得旧伤复发口吐鲜血，伏在马背上昏过去，警卫队从战场上用担架将他抬回省政府。他醒后说：“这一年在长征路上，多少同志负伤了，因为没有接应我们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几次创建新苏区都没有站住脚，所以没有救治条件和养伤的后方，缺医少药，就牺牲在长征途中。到了陕甘苏区，我是幸存者，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再苦再难，都要努力为党工作，尽党员义务。”父亲就是这样在六十六年革命生涯中，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瑞金中央苏区时，父亲是毛主席身边的三个巡视员之一。他经常跟随毛主席视察中央苏区各级政府。父亲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期间，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关心群众，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父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许多革命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父亲在六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尤其是江西老区和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毕生

的精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父亲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认真回忆撰写了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并于一九九三年九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五日，该书被列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永久收藏的党史研究资料。

为了感谢老区干部群众对父亲的真挚怀念，根据二〇〇八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厅）字二十一号文件的精神，发掘和整理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加强革命历史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应原陕甘宁边区庆阳市华池县、庆城县、环县及陕西吴起县、志丹县党史研究部门的要求，在部分老革命前辈后代的积极倡导下，我们决定再版父亲的这部回忆录。

在父亲的《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再版之际，感谢江西省政协多年来给予的一贯支持，感谢中共甘肃省华池县委、华池县人民政府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向关心支持帮助再版工作的各界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朱开铨子女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